

出版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主编《真理报》。列宁逝世后，他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之一，1988年被苏联当局处决。

布哈林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列宁对他评价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在理论上有不少创见，同时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列宁指出：要把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关于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和“布哈林案件”，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为了配合研究，特出版一期《布哈林专辑》。本专辑收录了有关研究布哈林理论观点的四篇论文，以及有关布哈林生平、案件、评价等资料。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是初步收录了一部分文章和资料，提供参考。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增 刊

（布哈林专辑）

目 录

- 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宋洪训（1）
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蔡恺民（37）
1918年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家
 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夏道源（51）
试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郑异凡（69）

文 献 和 资 料

- 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纪要(摘录)(1928年
 7月11日)严 伦译（90）
对布哈林的审讯(1938年3月5日和7日)张海滨 夏道源译（92）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1938年3月12日)杨彦君译（124）

外 论 选 载

-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摘录)〔南〕普·弗兰尼茨基胡文建译（141）
尼古拉也夫斯基谈布哈林杨彦君译（157）

让历史来裁判(摘录)(苏)罗·麦德维杰夫张启荣译 (183)

历史事件评介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逮捕和杀害

列宁的问题杨彦君 (189)

传记资料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布哈林自传郑异凡译 (201)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布哈林”条杨 蓬译 (206)

1930—1975年苏联几种《百科全书》有关

布哈林词条选译郑 简译 (223)

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那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永久使用，把银行、铁路、外贸、商船以及大工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是用“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办法，即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列宁后来把1917年10月—1918年3月这个时期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不幸的”和约。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喘息时机，并有可能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因此，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又遭连年战争破坏的国家里，怎样着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列宁在和约签订后立即着手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经中央讨论后在报纸上发表，并用小册子形式出版。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

列宁当时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长期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幻想，而经济建设任务也不可能解决得象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那样容易、那样迅速。列宁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思想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

列宁认为到1918年3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解决，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也已大体上解决，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大力发展国家

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那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永久使用，把银行、铁路、外贸、商船以及大工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是用“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办法，即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列宁后来把1917年10月—1918年3月这个时期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不幸的”和约。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喘息时机，并有可能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因此，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又遭连年战争破坏的国家里，怎样着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列宁在和约签订后立即着手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经中央讨论后在报纸上发表，并用小册子形式出版。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

列宁当时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长期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幻想，而经济建设任务也不可能解决得象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那样容易、那样迅速。列宁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思想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

列宁认为到1918年3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解决，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也已大体上解决，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大力发展国家

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那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永久使用，把银行、铁路、外贸、商船以及大工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是用“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办法，即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列宁后来把1917年10月—1918年3月这个时期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不幸的”和约。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喘息时机，并有可能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因此，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又遭连年战争破坏的国家里，怎样着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列宁在和约签订后立即着手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经中央讨论后在报纸上发表，并用小册子形式出版。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

列宁当时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长期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幻想，而经济建设任务也不可能解决得象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那样容易、那样迅速。列宁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思想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

列宁认为到1918年3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解决，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也已大体上解决，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大力发展国家

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那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永久使用，把银行、铁路、外贸、商船以及大工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是用“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办法，即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列宁后来把1917年10月—1918年3月这个时期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不幸的”和约。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喘息时机，并有可能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因此，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又遭连年战争破坏的国家里，怎样着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列宁在和约签订后立即着手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经中央讨论后在报纸上发表，并用小册子形式出版。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

列宁当时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长期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幻想，而经济建设任务也不可能解决得象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那样容易、那样迅速。列宁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思想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

列宁认为到1918年3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解决，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也已大体上解决，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大力发展国家

的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为此，必须相应地改变向资本进攻的方法，放慢剥夺资本的速度，甚至“停止一下进攻”。根据列宁的设想，必须在企业中组织对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并在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的同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即把国内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同时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自觉的劳动纪律、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等措施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当时还提出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向德国人学习国家资本主义的口号。

列宁认为，德国当时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得最好的国家，而俄国无论在文化程度方面，在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和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要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列宁认为，当时的德国和俄国正好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就好象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因此，俄国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

到1918年春，列宁明确得出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而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因此在国家资本主义里面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农政权已经得到保障的国家。

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以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是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引进国内十分缺乏的资本和外国先进技术，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俄国也只有通过迅速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道路，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如列宁说的：“没有建筑在现代科

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①

列宁关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套战略思想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二 1918年春布哈林的错误

布哈林由于对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而坚持一套“左”的主张，特别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反对列宁的意见。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布哈林提出来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考察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有组织的阶段。在那里，工业、金融和政治已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托拉斯。但是布哈林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坚持无产阶级要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办法，用“最坚决的社会化”的方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在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的条件下，才能最经济、最有计划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料。

与列宁起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大致同时，布哈林、奥新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也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②，并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提纲》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意见。

布哈林认为，列宁所代表的多数派的主张，是要在“不进一步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②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229—242页。

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部分地恢复这种关系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去巩固和发展生产力，去进行‘有机的国内建设’，这样会走上“危险的道路”，会“加强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从而也“加强反革命势力以及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力量”。在布哈林看来，在世界性的生产力低落的情况下，这种向资产阶级的让步是“不能创造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的。他在《提纲》中说：“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断地避免战斗，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总之，布哈林认为，采取列宁的那条政策路线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会走上执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毁灭道路，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会使苏维埃国家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危险。

布哈林还在“利用专家”、“实行计件工资制”、“加强劳动纪律”等具体政策方面反对列宁的意见。例如，布哈林在《提纲》中写道：“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会激起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以及先锋队的不满。”

根据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采取另一条政策路线，即不是“依靠让步”，不是“同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相勾结”，而是“只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在国际上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在国内政策上则实行“彻底的社会化”、“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对有学识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实施义务劳动”、“不给专家以高额薪金”、“不实行计件工资制”等等。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对布哈林的“左”倾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布哈林等人不了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不了解俄国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而乱叫“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等革命空谈，这完全表现了在“左”的口号下面拥护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行为的全部幼稚性。

布哈林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与其说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着眼，不如说更多地是从“改变生产关系”的角度着眼。如同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一样，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

当然，布哈林在《提纲》中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提纲》指出：“企业的管理应转交给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的混合委员会。全部经济生活都应当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组织，这些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不要‘有资格的人士’参加，但要企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工会参加。”另外，还提出要“给地方苏维埃以广泛的主动性，不让中央政权派出的委员去限制它们的活动。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阶级的主动性中寻求依靠，应当竭尽全力去发挥这种主动性。”这些意见对于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扩大地方的主动性、防止集权的官僚主义无疑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虽然极其严厉，但是对布哈林本人一直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认为布哈林等人“是些比较好的人，虽然他们不了解形势，但是在知识和忠实方面，却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①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页。

列宁也从来不把同布哈林的意见分歧无限夸大，而总认为布哈林等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列宁在1918年4月，即和约签订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刚刚发生的时候，在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同他（指布哈林——本文作者）的见解有十分之九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同他的见解有十分之一的分歧，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①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列宁的批评和教育下，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并赞同列宁的主张。此后，他们就解散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组织。

布哈林对于列宁的批评是心悦诚服的。在以后的年代里，布哈林曾一再承认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和1918年春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错误。他在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1925年）写的自传中说：“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别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里，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我有幸能在他的身边来说也是这样。”他在临死前口授给他妻子的《遗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让后人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严厉地对我作出评论吧。我们是第一次沿着一条还没有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一个目标的。”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1页。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列宁在1918年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几乎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就被1918年夏天由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发动的内战打断了。

列宁和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展开,在实践上也被战争一笔勾销了。

三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的经济思想

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曾一再告诫说:国际帝国主义不会放下武器,还会尽一切可能来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约的签订不能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喘息时期可能是十分短暂的。

到1918年夏天,外国武装干涉者勾结国内白卫分子发动了内战。苏维埃国家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元气,就又陷入内战烽火的包围之中。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重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基地被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占领了,战争带来的国民经济的破坏以及国内经济的多成分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相对软弱,给苏维埃国家在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方面造成了很大困难。苏维埃国家不得不相应地改变整个经济生活。

为了更加充分地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9月初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1918年11月30日,由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签署了《关于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历史性决定,规定工农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1)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国家;(2)将国家全部生活纳入战争轨道,在粮食、运输业和军事工业方面建立战时体制;(3)进一步加

强集中制和纪律。

这种特殊的战时形势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放弃原来预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改变原先的经济政策和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而采取一些非常的共产主义措施。当时，有些做法甚至超出了需要的范围。正如后来列宁追述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在采取非常共产主义措施方面跑得太远了，超越了需要的范围；我们不得不这样作。”^①

这些非常措施历史上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它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工业方面加速国有化和集中制领导，几乎将中、小工业全部收归国有，工业生产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2）在农业中实行余粮收集制，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有时甚至不仅是余粮，而是一部分必要的粮食；（3）禁止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并建立了一套实物配给制度，连工资也实物化；（4）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了对劳动的物质鼓励的措施。

今天，历史地来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在战争和破坏、物质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采取的临时政策，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把这些措施当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套有效的办法，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倾向：过分强调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即超经济的手段来管理经济，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特别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在分配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这里还应该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这些错误不是偶然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1页。

的,而是在没有消除“左派共产主义者”错误观点的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保证了军事上的成就,这仿佛又证明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原先一些思想和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左”的思潮流行泛滥。例如,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的拉林,狂热鼓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认为这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措施,他还竭力主张取消货币,认为在1919年就可以立即取消货币。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初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可以说也从理论上论证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观点。

布哈林的这部书是专门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经济规律的。布哈林在这本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应该说很出色,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任务也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例如,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阶级联系的解体和生产力衰退的必然性,以及在过渡时期这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城乡关系的根本改变和生产力必然高涨的趋势。他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总前提》一章中谈到:“社会主义必须建设。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首先看到工人组织作用的辩证改变。非常清楚,随着统治关系的重新配置,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一种生产组织者的作用。”列宁在以上两处页边的空白处都作了评注,写着:“非常对!”“非常好!”^①

布哈林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生产过程已“成为有计划地满足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20页。

社会需要的手段”，“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这里，布哈林已经多少表述了后来被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布哈林在该书中阐述的经济思想许多地方明显地带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阐述今天看来有许多是错误的。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经济范畴已经消失，商品、价值、利润、工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变成一些“虚构的值”，以至于在社会主义下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也没有存在的余地。

布哈林在该书第一章中写道：“**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则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就都消失了。**”布哈林由此得出结论：“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列宁对此批道：“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m$ 和 IIc 的关系吗？”^①

布哈林在书中还写道：“**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存在着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社会联系，商品才会是一个普遍的范畴。因此，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而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了产品而失去了自己的商品性质。”“由此可见，价值这一商品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平衡状态时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过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商品生产和那里已经没有平衡状态。”“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人’取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利润范畴以及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2—3页。

剩余价值范畴也同样消失了。”^①

布哈林在书中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可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纯历史的范畴，是在资本的统治表现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生产过程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合理化。他在书中说：“既然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合体，那么，在原则上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就根本谈不上任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很明显的。”列宁对此批评说，这是“糟糕的定义”，并认为这种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可能的”。^②

根据布哈林的意见，在社会主义下客观经济规律已经不起作用，只有在有组织的自发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才有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余地。在社会主义下，“超经济的”强制代替了客观规律。

布哈林专门写了《过渡时期“超经济的”强制》一章，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中的暴力”部分也适用于内部，是使劳动人民进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的因素……。这种过分强调“暴力”的观点，强调无产阶级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看来是片面的。

当然，这里应当指出，列宁对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命运的上述观点的评论，也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只是在后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才改变了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列宁在评述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已经消失了商品生产”和“工人取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时，在页边空白处写道：“对！而且说得很好，不矫揉造作。”^③ 列宁还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49、50页。

② 同上，第35页。

③ 同上，第50页。

把布哈林《过渡时期“超经济的”强制》这一章认为是“很出色”的一章。^①

的确，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一般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列宁在1921年以前的不少著作中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说的：“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③恩格斯在早期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还曾指出过，在社会主义下货币将消灭。他写道：“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消灭，金钱（即货币——本文作者）将变成无用之物。”^④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里，一直是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命运的观点的。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生产不相容的。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③ 同上，第323页。

④ 同上，第1卷第221页。

列宁在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写道：“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①列宁在1908年《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说得更明确：“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②

列宁在1918年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虽然预计到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银行、信贷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认为“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情况下，不用货币，或者在短期内换成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③但是，在列宁的计划中，把贸易作为城乡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重要形式，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到1919年3月，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党纲草案》时，仍然认为“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④

直到1920年11月，列宁在《给取消货币税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从货币到没有货币的产品交换的过渡是毫无疑问的。为了顺利完成这一过渡，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⑤

经典作家们的以上论述清楚说明，社会主义似乎与商品货币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② 同上，第15卷第112页。

③ 《列宁文稿》第3卷第5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9、750页。

⑤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第384页。

关系不相容的观点当时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忽视商品货币关系、禁止贸易自由等做法被看作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就不是为奇了。而到1920年夏，虽然国内战争已基本结束，国家已转上和平建设的轨道，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观点反而在1920年底—1921年初达到顶峰，也不是偶然的。

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时，承认当时犯了错误。他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①

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曾经回忆说：“看来，在军事战线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那么在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中也会取得成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种速度弄得陶醉了……事情进展得这样迅速，以致使我们觉得，我们离共产主义，离这种以自己的资源建立的、不必期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共产主义，已经很近了。”^②

经济学家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1922年在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俄文版序言中在回顾当时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时写道：“前不久，即在一年半以前，我们曾经想在语言中取消象‘商品’、‘商品交换’、‘商品流通’这样一些词汇。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直接分配的领域将迅速扩大，市场关系的自发势力已经成为过去，同小资产阶级形式相适应的商品生产范畴将日益缩小，而且在这里提到首位的差不多将是直接的产品交换，对此，货币单位仅仅具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② 波克罗夫斯基《无产阶级专政的七年》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页。

有纯粹的计算意义。”^①

从上可见，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所阐述的某些经济思想，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经济思想的弱点，而是带着时代的痕迹的。因此，我们在评论布哈林的经济思想时，也不能不估计到这一历史特点。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四 新经济政策的宣传者和解释者

1920年下半年，国内战争胜利结束了，苏维埃国家有可能转入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时的经济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大工业的产值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七分之一，农业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居民生活十分困苦，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列宁把当时的俄国比作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人。

在战争时期，广大工农群众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情愿忍饥挨饿，作出了巨大牺牲，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农民对余粮收集制极端不满，工人对饥饿和物品匮乏等现象也开始不满。

列宁从实践中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和消极后果，认为必须立即改变经济政策，克服经济上政治上的困难，恢复国民经济各部门，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1921年春，列宁写了《论粮食税》一文，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在文中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192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页。

务的政策。”^①“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②列宁当时提出必须以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认为粮食税是从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以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贸易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预计到要通过市场、货币周转、商品关系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同时也相应地预计到社会主义企业要转到经济核算，提高利润作为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志的作用，并实行按劳分配和使工人关心物质利益的原则等措施。

当然，贸易自由、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让步，一种退却。但是，列宁认为这样做完全不至于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不至于复辟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在国家掌握大工业、运输业和外贸等经济命脉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得到某些发展并不可怕，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在国家控制和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

列宁当时在谈到私人资本主义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时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么，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

^② 同上，第516页。

进社会主义。”^①

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贸易自由是逐步开放的，开始是产品交换，后来开放了地方贸易自由，以后又允许全国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不断有所发展，最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工人和农民的结合，即国营经济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时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革命家了。”^②

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商品货币关系同社会主义不仅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完全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根据革命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创造性贡献，特别是为在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小农还占着优势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宝贵的历史经验。

布哈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同列宁和俄共(布)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一致的。在这个时期里，列宁的思想对他起了重大影响，列宁和布哈林之间的私人友谊也促进了这种影响。布哈林本人是一个善于分析经济现象、勇于承认错误并改变自己观点的经济学家。他以自己渊博的经济学知识对新经济政策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5页。

1921年8月,《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的道理阐述了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主要任务及其意义,并对当时出现的两种错误论点进行了驳斥。

布哈林在文中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政策按实质说来不可能是旨在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当时的主要口号不是稳定地恢复国民经济,而是不惜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来立即“获得”产品。所以,他认为当时的做法不是从“生产”着眼,而是从“获得”着眼,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军队和工人的需要。在这种条件下,“计划的合理化”必然表现为不是在合理分配基础上的发展生产的计划,而是把生产放在次要地位的节约消费的计划。

布哈林认为,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农业上。当时采取的余粮收集制使个体农民丧失扩大生产的任何兴趣和刺激。不管你种多少、收多少,除了一部分口粮以外,反正都被人家拿走了。这样就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个体生产发展的需要之间造成了冲突。而由于当时俄国的农民主要是个体农民,国家的经济政策客观上就同发展整个农业处于矛盾的地步,农业危机必然加剧。布哈林认为,由于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前提,这样也就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

布哈林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阶级之间的平衡关系不是建立在“正常的”经济过程上,而只是建立在对战争获胜的利害关系上,一旦战争结束,经济矛盾必然尖锐起来,因此,经济问题,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找到一种使生产力得到广泛发展的相互关系就提到了日程上来。

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时,布哈林认为,增加产品是当

时经济生活的最高准则。布哈林是从工农业的相互关系来分析这个问题的。他说，当然，大工业是整个技术发展的出发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支柱，遵循发展生产力路线的经济政策无疑要加强大工业。但是，要发展大工业，需要粮食、原料和辅助设施等等。因此，为了发展大工业，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产品。光凭劳动热情而没有原料、没有粮食是走不远的，而取得产品的来源除大工业外，不外乎几个方面，即农业、小工业、租让企业、外贸，而租让企业和外贸不可能是主要的渠道。因此，不大力发展、不提高农业经济，是寸步难行的。由于农业和小工业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体经济，发展农业和小工业就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关系，不过只有这种发展才能取得补充的产品。

布哈林认为，当然在新经济政策中包含着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两种经济形式的竞争上。这就要求在国营企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贯彻工人对个人和集体利益关心的原则，以便通过竞争、通过经济斗争的办法来逐步排挤私人资本主义。

布哈林在这个时期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虽然他仍然坚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说问题不在于术语，而在于实质。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两点是完全不同的：（1）在西欧和美国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力万能达到了极点的资本主义，那时，以国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支配者。当无产阶级国家把企业租让给租让者时，企业的占有者仍然是工人阶级，因此，这里性质完全改变了。（2）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全部剩余价值由资产阶级国家支配，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

主义,剩余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利润落到资本家(租让者)的腰包里,另一部分作为提成或租让支付交归苏维埃国家。因此,布哈林认为:“我们越发展,我们签订合同的条件就越有利,无产阶级得到的份额就越大,最后吞噬掉资本家的那部分。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①布哈林认为,在这里,外国资本不管愿意与否,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帮助把苏维埃经济这辆马车从泥潭中拖出来的“专家”的角色。

布哈林还认为,欧美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应当通过革命加以摧毁的,而苏维埃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将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逐渐消亡,只要苏维埃国家正确执行自己的战略计划。

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又从理论的角度,即从“经济合理化”的角度阐述了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都面临着如何组织经济的问题,即必须在它能够有计划地进行管理的那些生产形式同一开始它还不能有计划地进行管理的那些生产形式之间建立一定的相互关系。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正确地确立这个相互关系,那么生产就不会发展,而只会衰落。无产阶级不可能把一切都组织起来,它不能用暴力排挤小商品生产者和个体农民,如果无产阶级坚持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只会造成经济上的“心肌梗塞”。

此外,如果无产阶级希望包揽一切,那就需要一个拥有无数服务人员和官吏的庞大机构,来代替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履行的经济

^① 布哈林《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真理报》1921年8月6日。

职能。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开支将大大超过无政府状态下小生产的全部费用。结果可能是这样：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是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形式，而是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布哈林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国际意义时也从经济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目前一方面足纯粹俄国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具有普遍意义。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策略上的退却，而且也是解决巨大经济问题的一个战略计划，即解决各个部门和各种生产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必要措施。他举例说，在俄国，农民和小生产者很多，固然需要这种政策，就是德国、美国，那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也会立即出现这样的问题，无产阶级也必须非常审慎地权衡“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自由的”、不能加以控制的个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布哈林的上述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二十年代初起已经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和解释者了。

五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意见分歧

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仅没有使苏维埃经济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复辟资本主义，相反，随着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增大了，私人资本不断地被排挤出生产和流通领域。到1925年，工农业生产力已接近战前水平，农业生产相当于战前水平的五分之四，大工业的产值约占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

当然，单单恢复经济和达到战前水平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党内就经济建设应遵循什么方向

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究竟如何、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

托洛茨基挑起了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争论。托洛茨基虽然承认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事实，但他认为，当时在农业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危险。他认为，二千五百万个农户为市场工作，势必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不仅有富裕户而且还有剥削户从农民群众的一极分化出来，而在另一极，则有部分中农变成贫农，贫农又变成雇农。一句话，托洛茨基认为，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而这种现象是党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在最初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认为党执行的政策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的计划；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从而造成了政治上的危险。^①托洛茨基认为，当时出现的商品匮乏等现象也都是由于工业落后于居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而造成的。因此，他提出要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工业发展的速度要足以制止农村两极分化的过程并为逐步发展农业集体化创造技术前提和经济条件。不然，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对立的阶层，那么这种过程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托洛茨基认为问题的解决正是靠工业化的速度，“要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决政策中寻找出路”。^②托洛茨基主张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中抽调到工业中来，以加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了高速度发展工业，他还要求从农村中征收一点五亿普特到二亿普特

①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1979年三联书店版下册第772、773页。

② 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881页。

粮食，把这个重担加在占农村百分之十的富裕农户身上。

托洛茨基的观点实质上涉及到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是否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他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作是向资本主义退却，因此，在他看来，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超工业化”就不能不放弃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这种“超工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早在1924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学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靠剥夺殖民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得不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他在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相反，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就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本国工业和本国农业的剩余产品。”^①

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积累只能靠剥夺小农个体经济的办法来进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发生作用时，工业品价格不仅应该包括再生产（即价值）的全部因素，而且应该依靠对小商品经济成分的商品加价而取得的积累来保证工业向

^① 《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24年第8期。

新的技术基础过渡。而这时产生的非等价交换不仅仅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非等价交换的那种比例的翻版，而且会进一步超过它。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就是靠“剪刀差”，这种“剪刀差”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也不是逐渐缩小，而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而且逐步扩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套理论是托洛茨基“超工业主义”的依据，这是一条剥夺农民来建立工业化的道路。

布哈林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认为不能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不能通过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与农民经济结合的办法，通过合作化的道路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布哈林于1925年1月写了《对反对派经济纲领批判》一文，论证了工业化依靠农业的发展来积累资金，提出了农轻重关系的辩证思想。他认为，工业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高涨，农民的市场容量是决定轻重工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是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相联系的，如果农民的需求缩减，出现销售危机，那么整个再生产速度也就会减慢。

布哈林认为，只要大生产还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即使进行商品等价交换，即使按“社会必要劳动”来进行商品交换，让价值规律发生作用，那么，国营企业对手工业、小生产始终占有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蜕化为资本主义。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出的“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的原理，提出在社会主义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的必要性就表现为“劳动消耗规律”。

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价值规律是通过市场自发波动、供求关系变动实现的，那里价值规律具有拜物教的外衣，而在社会主义下，社会分工的自发的形式被有计划的自觉的形式所代替，因此，在社会主义下，价值规律脱去了它的拜物教外衣，而转化为“劳动消耗规律”。

这里应当指出，布哈林提出的“劳动消耗规律”说明了他对社会主义下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的局限性和喜欢玩弄概念的学究气。实际上，布哈林的“劳动消耗规律”无非是“价值规律”的另一种说法。

布哈林认为，托洛茨基之辈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不懂得工业取决于农民市场的道理，这是最有害的。布哈林说，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由农业的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布哈林认为，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靠剥夺农民来进行工业化的办法是“杀鸡取卵”的办法，只能把农民经济扼杀，并损害工农联盟。

在同托洛茨基派的这场争论中，布哈林坚持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一种退却，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战略计划。

1925年4月，布哈林在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反驳了托洛茨基在工业化的速度和资金积累等问题上的谬论，认为实质上这是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后来他又写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的小册子，全面地阐述了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在报告中指出：有的同志把“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只归结为一点：农民们进攻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造反了，我们退却了，仅此而已”。布哈林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这一点，确切些说，不完

全在于这一点”。^①布哈林引用了列宁的话，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常的经济政策”，它的意义在于：“一系列经济成分从前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堵塞不能互相促进，现在能够互相促进，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②

布哈林认为，建立城市和农村的商业联系意味着“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同时使得农村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城市的繁荣”。这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③

城乡的经济联系首先表现在贸易上。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各个阶段的经验表明，苏联的经济发展是从一种“堵塞的”经济周转转到了越来越“开放的”经济周转的发展。从这里布哈林得出了一个结论：过去认为无产阶级一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会自然取得成就，这种陈腐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布哈林在报告中说：过去以为无产阶级一掌握政权，把一切东西抓到手里，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立即消灭市场，现在看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布哈林说：“我们现在的想法不同。我们抓住主要的经济命脉，安排**主要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国营经济以各种办法，有时甚至通过市场关系和私人资本的竞争，逐渐地越来越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威力，并且逐渐地用各种方法把落后的经济单位纳入自己的组织，而这照例要**通过市场**来实现。”^④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经济政策，应是利用一切经济

① 《布哈林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7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73页。

④ 同上，第176页。

力量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但是这只有通过越来越扩大经济周转的办法，才能成功。而如果在无产阶级手里集中了真正的经济实力，如果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真正的、强大的经济命脉，那么开放经济周转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需要这样来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形式，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排挤和削弱资本主义形式，然后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排挤和削弱资本主义形式不能用其他办法，只能用竞争、用经济斗争的办法。他说：“和私商作斗争的办法，不是用脚踩它和关闭他的店铺，而是自己努力生产，东西比他卖得更便宜、更好和质量更高。”^①

布哈林认为，当时在农村和手工业方面新经济政策还实行得不好。盛行的不是经济斗争，而是使用行政压制的手段，农民也害怕积累。布哈林在报告中呼吁：“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自由，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②“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③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采取的政策是可能消除贫穷的政策，应当用各种经济措施，首先是通过合作社，推动农民的基本群众前进。

总之，布哈林认为：必须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这样就有可能加速商品流转，进行快得多的积累，并更快地帮助贫农和中农合作社、集体农庄、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使它们“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甚至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可以通过银行等杠杆

① 《布哈林言论》第 181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184 页。

“长入”社会主义的体系中去，尽管它是社会主义机体上的“异类”，就象城市的租让企业一样。

在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表明，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的决议驳斥了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看不到富农的危险、看不到农村两极分化的危险、从而要求改变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言论。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指出，特别要同那种“企图剥夺富农的政策，破坏目前党在农村中的路线，即破坏已经保证获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路线，破坏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从而破坏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的倾向进行斗争。^①

从1925年到1927年期间，布哈林写了不少小册子和文章，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同托洛茨基派企图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左”倾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里应当指出，在1925年到1927年期间，布哈林和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在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和解释上也是存在着重大分歧的。这种分歧到1927年下半年以后，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从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问题上导致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六 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意见分歧

1927年下半年，苏联在粮食收购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困难，市场关系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当时农村的富裕农民，也有一部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81页。

分富农不愿按国家固定价格出售粮食，等待国家提高粮价。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第一次反对苏维埃政策的严重进攻”。因此，斯大林认为必须向富农展开进攻，要富农立即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同时认为要做到向农村资产阶级实行坚决的进攻并战胜它们，党的任务就首先要大大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

这样，以粮食收购问题为契机，联共（布）党内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意见分歧当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1）工业化发展的速度；（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3）对贸易自由的态度。

斯大林认为必须全力地发展工业，以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重新装备农民。他认为，迅速发展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如果不加速发展工业，就不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庄即集体农庄，只有这样才能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设农业。斯大林认为，这是当时城市和农村结合的新形式。而为了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农民征收“超额税”或“贡税”是必要的手段，同时必须保持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调节作用，限制私人贸易的自由，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采取非常措施。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做法，提出工业和农业均衡发展的主张，尤其是要注意在农业迅速增长基础上达到工业高涨；布哈林还提出“市场常态化”，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扩大商品流转的方针。对于粮食收购的困难，布哈林建议适当提高粮价，增加粮食进口来解决当前危机。布哈林还认为，不要在短期内迅速发展集体农庄，首先要通过合作社，使农民走向合作化，他认为集体农庄目前不是康

庄大道，而合作社是康庄大道，并认为对待农民必须坚持自愿原则。

布哈林认为，向农村征收“超额税”或“贡税”的东西来发展工业化，是对农民的剥夺，是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认为斯大林的做法实际上回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依靠殖民地，就是依靠借债，或者依靠对工人的剥削，我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不能借债，因此，我们主要靠农民的贡税。”^①

1928年9月，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

布哈林在文中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危机”问题。他认为，这种危机具有与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颠倒”的性质。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匮乏；那里是供过于求，这里是求过于供。布哈林认为，要解决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危机，就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他写道：“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人们应当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②

其次，布哈林指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是错误的，他认为，“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持续地保持最大的速度”，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③布哈林认为，当时工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无可比拟，“弦已经绷得太紧了”，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设现实的工厂。因

^① 《布哈林言论》第324页。

^② 同上，第273页。

^③ 同上，第275页。

此，应当降低速度。

布哈林还提出了积累的界限和投资的界限问题。他认为，必须考虑后备，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对某一部门的投资过多会产生许多弊病，使商品匮乏现象更加严重，对其他部门发生有害影响，最终会减低速度。布哈林认为，把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不注意轻工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是不对的，因为轻工业的周转较快，可以在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其资金来发展重工业。

布哈林在《札记》中指出，不要过高估计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他说“如果有人认为，计划经济的增长会造成……一种按我们意愿行事的可能性，那他就是不懂经济学的起码常识。”^①

布哈林还提出要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要把最新发明、重要的技术成果、发展和运用科学成为注意的中心。布哈林认为，当时苏维埃经济过分集中化了，他说：“由于许多领域过分集中化，我们使自己丧失了过多的力量、资金和潜力，而且由于许多官僚主义的障碍不能利用一整批这些潜力。”布哈林指出：“如果我们从个别的国营企业开始，能够使我们更适应实际的具体条件，而不干成千上万的大小蠢事，我们就会灵活得多，筹划得好得多，取得的成果大得多。”^② 总之，他认为“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文化，学会更好的管理，我们就会成长，就能够而且会挫折较小地成长。”^③

布哈林的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切中时弊的，是颇有见地的。但是，斯大林当时把布哈林关于“市场常态化”、“提高粮价”、反对“实行非常措施”等意见认为是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保护富

① 《布哈林言论》第 282 页。

② 同上，第 294 页。

③ 同上，第 295 页。

农、纵容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斯大林认为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布哈林只看到新经济政策的一面，而看不到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面，并认为这种来自“右面”的危险，即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想“解放市场”，想“开辟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的纪元”的危险是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不主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要求根本改变党的政策，指望降低工业化的速度来改变党的农村政策的路线。

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当时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而全盘否定了。

1929年4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在决议中指出：“对新经济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否定无产阶级国家对市场关系的调节作用），轻视社会主义工业同农业结合的新形式，轻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作用，同时又显然过高估计个体小农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切在客观上就是收缩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削弱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斗争中的阵地的路线。”^①

看来，布哈林和斯大林分歧的焦点归根结蒂还是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以及是否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对新经济政策既不能象托洛茨基那样看作仅仅是退却，也不能象布哈林那样看作是战略计划，而应当是：既是退却，又是进攻。斯大林在1928年四月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首先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其次得出的结论是：新经济政策预计到社会主义要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实行胜利的和有步骤的进攻。”^②应当说斯大林的解释在理论上似乎无懈可击，但是斯大林把“退却”和“进攻”截然分隔开来，认为过去是“退却”，现在应该是“进攻”了。这是形而上学的。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9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5页。

斯大林正是以这种解释来先反对托洛茨基认为的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左”倾观点，尔后又反对布哈林认为的必须在较长时期内坚持新经济政策而不主张实行“把非常措施作为党的政策”的“右”倾观点。

后来的实践证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取消。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2年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后，新经济政策被完全取消了。

苏联从1929年开始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后，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从1928年的百分之三点九剧增到1932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五，国民收入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社会主义成分从1928年的百分之四十二·三增加到1931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看起来，社会主义成分大大加强了，但是由于这种强制性的加速发展造成了经济上的许多弊病，产生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严重后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这里不再赘述。

从1931年起，苏联经济的发展完全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这种计划经济没有同市场机制的利用结合起来，忽视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即指令性计划成为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手段。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些方针、政策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代替了。

* * *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它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还只是走了很短的一段路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回顾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走过的曲折道路，分析和研究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四化大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

蔡恺民

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国内战争和四年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在二十年代中期揭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1929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加速工业化的建设。当时，在联共（布）党内发动了对以布哈林为首的“右倾集团”的批判，指责布哈林企图“降低工业化速度”，“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鼓吹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相对立的国民经济各种成分‘平衡’论”，妄图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等等。

现在，国际上不少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认为，苏联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追求高积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经济平衡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同当时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有很大关系。布哈林的一个基本经济观点是经济的动的平衡发展观点。本文准备对布哈林的这一经济思想作一些探索性的评介。

布哈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提出的经济平衡发展思想

布哈林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阐述过他的经济平衡发展的观点。他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指出：“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

只不过是対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① 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不同生产领域不平衡状态是如何产生，而这种状态又是如何通过市场的盲目作用而克服的。但是布哈林把这段话机械地搬用来分析过渡时期的经济情况，得出了只有破坏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建立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结论。他认为，在过渡时期，一方面存在着集体和自觉的主体——无产阶级国家，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体系，但后者受到社会自觉性的中央调节的影响。因此，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建立平衡，在建立平衡的情况下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相反的情况下又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起什么样的变化，运动的规律如何？当时布哈林认为，价值这一商品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平衡状态时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那里已经没有平衡状态。他的结论是：“一般说来，过渡时期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冲破商品拜物教的外壳。相应的意识形态范畴随着社会自然经济关系体系的发展而消失。既然如此，经济过程的理论有必要转向自然经济思维，也就是说，把社会及其各个部分当作自然形态中的各种因素的体系来观察。”^②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上来论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代表作。布哈林的基本观点是，在过渡时期，只有通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页。

②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198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7页。

强制征收粮食，实行义务劳动，发给社会劳动份额，实行货币贬值等等违反价值规律的不平衡状态，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自然经济体系的平衡状态。

大家知道，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作了许多精辟的评述，虽然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受到传统的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观的影响，但是，列宁对布哈林那种脱离实际，从抽象概念出发的学究气作了中肯的批评，同时针对布哈林所说的商品社会的末日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的错误论点深刻地指出：“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m$ 和 IIc 的关系吗？”^①由此可见，列宁总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列宁对布哈林的中肯批评对以后布哈林经济平衡发展思想的演变是有影响的。

布哈林经济平衡发展思想的演变

布哈林的观点的变化首先来源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一重大转变，并随着执行列宁新经济政策后城乡经济活跃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同时，可以看出，他根据列宁的指示，认真研究了阐明 $Iv+m$ 和 IIc 关系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1928年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说：“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同时是某种统一体，虽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人们对于这个社会也能够……参照《资本论》第二卷来规定再生产的图式，即规定使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以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互相正确协调一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致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确定动的经济平衡的条件。”^①可以看出布哈林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原来认为在过渡时期只有破坏商品生产所反映的再生产过程因素的平衡状态,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自然经济的平衡,现在则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然要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建立动的经济平衡。

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派的论战中曾经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这个观点。托洛茨基派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贯穿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即无产阶级国家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不等价交换等非市场的强制方法把非国营成分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产品收归公有,以便尽可能快地积累资金)同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商品关系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关系的任何强化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加强。因此,必须用指令性的计划同市场进行斗争。其实,这种观点本来就是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顾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过去的观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布哈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布哈林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必须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这种“按比例消耗劳动的规律,即‘劳动消耗规律’是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生活必需的和万能的调节者。”^②在商品经济中,劳动消耗规律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因此是穿上了价值规律的拜物教外衣,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则将脱去这个外衣,通过计划来实现。过渡时期,正是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布哈林的论点包括两层意思:一、计划不能违背价值规律所反映的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的物质内容,而必须考虑各部门的平衡发展,因此不能去同价值规律作

^① 《布哈林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271页。

^② 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规律性的问题》,《真理报》1926年7月3日。

斗争，而应当利用价值规律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这个经济统一体中有可能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促使经济平衡地发展。二、过渡时期经济成分主要有国营工业和农民的简单商品经济，还有私人资本，但是，不论这些形式怎样多种多样，也可以归结成一个统一体，因此可以在满足群众需要越来越成为生产的计划活动的原则指导下，用价格自觉地形成的方式（不是市场晴雨表的波动价格的自发形式），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把非社会主义成分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在布哈林看来，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必须而且能够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平衡增长，以过渡到将来的纯粹计划经济。这种观点，同现在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含有市场机制，或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当然是不同的。但是，布哈林不是把计划和市场割裂开来，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通过合理的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结合，推动工农业平衡发展的经济模式。

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的模式

虽然布哈林并没有全面论述他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各个方面，但是，他在同托洛茨基派的论战中，在解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文章中，在对当时计划工作所作的各种批评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些方面。他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在过渡时期要做到经济的动的平衡发展，必须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布哈林模式的主要内容。

1. 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俄国是一个工业落后、小农经济占优

势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面临着工业化的迫切任务。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每年应最大限度地吧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另一种意见认为要“保护”农民经济，免除用于工业的一切赋税。布哈林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可取的。前者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后者则不懂得农业的发展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工业化速度比较快，于是不久就出现了粮食紧张，商品供应不足的严重问题，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托洛茨基派从分析这种现象得出了必须“超工业化”的结论，他们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农业落后，而要改变农业落后状态，必须加快工业化速度，为此又必需对粮食采取强制的收购措施。布哈林不同意这种分析，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工业化遇到了自己的极限，这表现在：(1)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不当；(2)工业生产增长和投资增长比例不当，如缺乏建筑材料；(3)工业缺乏棉花、皮革、羊毛等原料，加上缺乏粮食。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工农业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谷物业的停滞。因此，再生产过程的因素失去了平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粮食和原料价格低，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不利于谷物业，结果生产力从谷物业中转移。农村购买力增长，并不是因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增长，而是因为农村大批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工业和建筑业)。布哈林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他强调指出：“如果某个生产部门不能经常地收回生产费用并加上一个增加额(……)，那么这个部门就会停滞或后退。这个规律也‘适用于’谷物业。”^①总之，布哈林一再强调工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反复说明农业是工业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在工农业结合的

^① 《布哈林言论》第282页。

条件下，工业的发展才能打破纪录，而这又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的积累为前提，如果通过各种手段一味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使农业不能积累，那就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①。

此外，布哈林也注意到轻工业周转快，可以在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其资金来从事重工业的建设。

2. 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托洛茨基认为，为了保持工业高速度发展，必须把一切用于积累，布哈林认为，这是荒谬的。这里有一个积累的界限问题，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不能片面地追求积累，也不能片面地追求消费。既要注意供求平衡，又要注意投资方面的物质因素的平衡。为了使投资成为现实，为了使许多建设项目能按计划进行，不仅应保证对建筑材料的需求相应的资金，而且应保证对这种建筑材料的相应的物资供应。因为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②。如果忽视这种平衡，投资超过限度，就会造成不良后果：（1）使厂房等等的实际建设项目不能按计划进行；（2）一段时间将停止已经开始的工程；（3）会对其他生产部门发生非常有害的影响；（4）使各方面的商品荒更加严重；（5）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同时还会对货币制度产生不良影响，造成通货膨胀，使整个经济发生紊乱。布哈林认为工业化的速度应当有个限度，即要维持的这种速度必须留有后备，不致大大降低群众的消费水平和引起危机的发生。

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商店门前排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于是出现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过剩、商品过剩，这是危机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缺乏，商品荒，是否具有“颠

^① 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83页。

^② 《布哈林言论》第289页。

倒”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还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规律。布哈林所作的分析是，必须把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落后于更为迅速增长的群众需要，这将成为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另一种情况是商品的供应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前一种情况是正常现象，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发生危机的基础，后一种情况则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各种因素失去平衡，这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但是，商品荒决不是社会主义的绝对经济规律，而是由于积累超过了限度造成的。

布哈林认为，要保证工业发展高速度，又要保证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克服商品荒，关键在于大大提高建筑单位、生产单位和新的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利用最新技术。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消除俄国的闭塞性；我们必须注视欧美科学技术思想的每一动态并利用它的每一实际进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统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肃清我们经济管理制度中的混乱、烦琐等现象。我们必须在改造时期的复杂条件下学会文明的管理。”^①

3.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为了解决好工业和农业、生产和建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的动的平衡发展，布哈林已经注意到，关键在于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当时布哈林的出发点是，过渡时期经济具有相对无计划性或相对有计划性，这是“由于存在着小经济和市场联系的形式，也就是说，存在着大量无政府状态的成分”^②。所以他认为过渡时期的计划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有许多对无政府状态因素的预测成分（例如，对粮食产量、商品粮食额、全部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商品量以及价格等等的计算），这种

^① 《布哈林言论》第 293—294 页。

^② 同上，第 272 页。

预测又成为这种或那种指示的出发点。布哈林注意到，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占优势，计划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计划发生失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严重的损害，即“坏的‘计划’和坏的经济策略会把好事办糟”。总之，布哈林在计划问题上有两个观点：一是不可能有什么“理想的”包罗万象的计划，计划带有预测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错误，二是计划应当力求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协调，“基本比例的严重破坏（例如我国谷物业经济情况就是如此）和与此相应的错误计算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计划又带有指示性。

对苏联国民经济中发生的比例失调现象，托洛茨基派认为，毛病在于缺乏计划，因此要加强工业的计划。相反，布哈林认为，“毛病在于国营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主要在于流通领域……先要使流通领域运行，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医治国家的生产（迫使降低成本，使生产合理化等等）”^①。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离开同农民市场的联系制定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计划是一种“荒谬的概念”，必须看到计划的力量是相对的，而不是万能的。

布哈林反对过于集中化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对中央计划管理工作的批评中，他指出：由于许多领域过分集中化，我们使自己丧失了过多的力量、资金和潜力，而且由于许多官僚主义的障碍不能利用一整批这些潜力。布哈林多次把过分集中的计划工作同官僚主义现象联系在一起，而且提出了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干部制定这种超工业化计划，那么明天就会嘲弄我们自己，后天就会去帮助我们的敌人。

计划高度集中化的弊端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的活跃的强烈

^① 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5 年第 1 期第 32 页。

对比,使布哈林认识到市场的积极作用,也认识到苏联当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在回顾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文章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战时共产主义是“堵塞的”周转制度,新经济政策是“开放的”周转制度。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我们首先在贸易方面前进,……因为贸易恰恰是这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一种经济成分能够影响另一种成分,首先使得城市和农村能够互相影响。”^①

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给了布哈林新的启示,使他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观,认识到计划经济必须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他明确地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②他把贸易和市场的积极作用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通过市场,可以加快经济周转和资本周转的速度,从而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积累的速度,最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有利于解决商品荒的问题。

(2)通过市场,可以调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阶级的经济主动性,并且允许他们进行一定的积累,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在一个时期内给予各种经济力量自由,客观上能够使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3)通过市场,可以促使国家企业改善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通过实行计件工资制等等调动工人落后阶层为社会主义服务。

^① 《布哈林言论》第173页。

^② 《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哈林著作选)1967年纽约俄文版第288页。

布哈林并不是忽视在过渡时期市场存在某种盲目性，但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市场的自发性，而把那些为社会主义工作的经济成分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精神错综地结合起来。

4. 经济建设和政治的关系，即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布哈林指出，再生产过程因素的失调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密切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是因为再生产过程的因素失调，工人失业，或者在消费品的分配中所占份额少，出现经济危机，导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必须了解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和再生产过程理论之间的联系。在过渡时期，“经济领导如果犯了违反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①。

从这一点出发，布哈林得出结论说：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布哈林特别强调，在俄国这样一个大约有一亿农民，二千五百万农户的小农国家里，正确对待农民经济不仅是工农业平衡发展、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前提，而工农联盟又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国内安定的基本因素。因此，布哈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对待农民的政策，他在同托洛茨基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

^① 《布哈林言论》第 273 页。

中，驳斥了他提出的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去的主张，指出在经济上“剥削”、“排挤”、“吞没”小农经济并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工业的殖民地”^①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种政策无疑会造成农民经济衰竭，农民经济无法进行积累，农村市场缩小，需求缩减，出现工业品销售危机，工业凋敝，以致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缓慢，而在政治上则必然导致工农联盟破裂。他也不同意斯大林对农民实行一种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超额税（“贡税”）的办法。总之，他不同意采取征服农民的政策，而主张实行争取农民的政策：通过市场调动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大工业同小生产结合，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以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领导。布哈林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的时期，如果不为其政治领导权、为其政治领导奠定经济领导权的基础，它的政治领导权、政治领导是不可能持久的”^②。

布哈林承认过渡时期存在着多种成分，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如果能使国民经济平衡地发展，则有利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缓和。他不同意在农村发动“第二次革命”，即用暴力剥夺富农，揭富农的屋顶，没收富农的余粮。他主张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经济命脉的条件下，用经济的办法对付富农：既容许富农发展经济，容许富农积累，又限制和改造富农经济。他曾经设想，富农有了积累，一方面可以向他们征税，另一方面，富农会把钱存入银行，国家就可以把这笔钱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用于支援工业，支援

① 参看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新经济学》1926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1卷第1分册第86—163页；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63—97页。

② 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90页。

集体农庄，支援贫农。这样，富农就会同整个苏维埃经济发生某种联系，转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这种做法也便于调动中农的积极性。因此，布哈林曾经对农民的所有阶层提出过“积累吧，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的著名口号。

对于私人资本家也是如此。布哈林不赞成向私人资本宣战，不赞成封闭他们的店铺。他认为应当允许私人资本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贸易，用征税的办法从资本家那里抽取他们的利润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同时“用竞争，用经济斗争”来排挤他们，他指出，“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①。

总之，布哈林要求给各种经济成分以发展的自由，通过经济斗争手段，通过排挤、战胜和改造一系列过渡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通过争取、改造的办法把小农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达到国内政治平衡和经济的平衡发展。

* * *

以上我们对布哈林过渡时期动的经济平衡理论和根据这种理论提出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模式作了简单的介绍。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思想并不是把各种经济因素看作是静止的，或绝对平行发展的，也并不是主张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和平共处。布哈林的经济思想是动的经济平衡思想，他不否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也不否认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反对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而是在动的过程中，即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力求保持再生产过程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注意经济发展的速度，又注意消费者的利益；既注

^① 《布哈林言论》第 175 页。

意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又注意逐步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可以说，布哈林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苏联后来实行的高速度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时曾经说过：“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同样，应该对已有的思想材料加以研究，这里，当然应该把布哈林的著作当作已有的思想材料来加以研究。因为他的思想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的经济的事实的反映。今天，在国际上不少人对布哈林的观点、理论和模式发生了兴趣，主要也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自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人们感觉到有必要从布哈林的思想材料中得到借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1918年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 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

夏道源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标志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俄国当时是一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农业国家，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与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俄国要不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来重温这场争论的内容，学习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于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散布的极“左”流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列宁向来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就说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①德国在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得最好的国家，俄国刚刚相反。列宁根据这种情况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历史的发展如此奇特，到了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分开的两半。德国和俄国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条件，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列宁由此得出结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取得胜利，很快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它延迟爆发，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用全力仿效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它“体现了纪律、组织和在最新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合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①，而这一切正是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可见，在俄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列宁早已阐明的重要原理。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且在1918年春提出了租让制作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所谓租让制，就是苏维埃政权允许外国企业家参加开发苏维埃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一部分自然资源，承租人可以从承租企业中取得一部分产品作为报偿。苏维埃政权从中得到的好处是能在很短时间内引进大量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建立大工业基础，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培养现代化企业所需要的管理干部与熟练的技术工人。

但是，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当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提上实践日程的时候，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此却极力阻挠。他们认为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援和经济技术帮助，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布哈林断言，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取决于俄国工人阶级具有比德国工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是取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

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未能得逞以后，又极力反对列宁为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原理和政策。布哈林说，苏维埃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把管理国民经济的全部工作交给资本家，用资本主义排挤社会主义”^①。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员奥新斯基在1918年4月讨论石油国有化法令的一次会议上，听说要创办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石油企业，立即表示反对，并且发表文章，把建立这种企业说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第一只燕子”。他危言耸听地惊呼：社会主义祖国“会化为乌有，国家资本主义会登上舞台。”^②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一个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口号和要求来抵制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他们反对与外国签订贸易协定和租让合同，认为“同‘工业界巨头’达成协议，这就势必要建立一些由他们领导的、包括各基本工业部门在内的、从外表来看可能具有国营企业形式的大托拉斯。这种生产组织的体制为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提供社会基础，而且是到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③总之，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看来，在俄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有使苏维埃共和国“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危险，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

列宁在反驳这种“倒退”论时指出，布哈林等人想用“国家资本主义”吓人，正好暴露出他们根本不懂得在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根本不懂得苏维埃共和国是与资产阶级共

① 《共产主义者》杂志 1918 年第 3 期第 11 页。

② 《共产主义者报》1918 年 3 月 12 日。

③ 本刊第 1 辑第 238 页。

和国完全不同的国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时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和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小商品生产占压倒优势。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不能实行剥夺政策，必须容许他们有某种交换自由，由此必然滋长资本主义。所谓过渡，在俄国就是从小商品生产经济开始，先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这里成了中间环节，必须通过一定的步骤、把它引上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正确步骤。可见，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国家资本主义怕得要命，俄国无产阶级正好相反，不但不怕，而且热烈欢迎，容许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和发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很容易，就会很有把握”^①；“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② 列宁强调说，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坚决支持，根本用不着害怕国家资本主义。

二 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取消阶级斗争，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目的在抵抗依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0页。

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并和他们作斗争”^①。但是，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却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他们认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是金融资本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它是不可思议的事。布哈林直到1920年在《过渡时期的经济》这一著作中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他写道：“既然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合体，那么，在原则上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就根本谈不上任何‘国家资本主义’”^②。“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提纲》中把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原理和政策说成是“放弃积极的阶级政策”，“向资产阶级投降”，“拒绝进一步粉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局部地恢复它们”，会使“工农革命成果冻结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制度中”，苏维埃政权“会变成半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统治工具”，“走向金融资本的全面统治”。他们要求“无产阶级的立场，要象过去一样，把它作为阶级全盘否定，加以消灭”，“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彻底粉碎怠工”，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等等。^③他们甚至要党作出抉择：不是无产阶级离开政权，就是党放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立即实行普遍的生产资料国有化。总之，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取消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里完全混淆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与垄断组织的结合，它受垄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8页。

② 《布哈林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71—72页。

③ 本刊第1辑第229—242页。

断资产阶级的支配，为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在苏维埃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受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的资本主义，它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不但没有取消阶级斗争，而且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苏维埃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不是它的熄灭，只不过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

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2月是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镇压他们的反抗和怠工，都是采用暴力镇压方法来反对资产阶级。1918年3月签订对德和约以后，俄国革命进入了以管理国家为中心任务的时期，无产阶级现在应当学会管理国家。而管理任务首先是“纯粹的经济任务”，“主要的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①。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重心现在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作上来。列宁在1918年3—4月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迄今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②现在是要用管理方法来战胜资产阶级。客观形势变了，斗争形式必须相应地改变。今后“应当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在组织生产方面、在全民计算和监督方面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③，“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④。列宁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计算和监督，使它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随时调节经济活动。它是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有力手段，是俄国无产阶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9—500页。

③ 《列宁文稿》第3卷第4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级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采取的一种更高的斗争形式。它比过去反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方法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加速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左派共产主义者”当时所坚持的“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等口号,其实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已经实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经济领域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关于这方面的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提纲》中却只字不提。

“左派共产主义者”要求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普遍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就是要继续用直接剥夺的方法向资本进攻,把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这在当时完全是超越现实的主观愿望。俄国当时存在的关键问题,恰恰是要“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苏维埃政权来不及对资本家已经被剥夺的企业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而实行“社会化”,就需要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没有这个条件,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无能为力。“左派共产主义者”把“最坚决的”和“社会化”等等字眼联在一起,正如列宁说的,“就暴露出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①

列宁主张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反对小生产者自发势力的有力武器。因为在俄国,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势力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论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租让制时,曾经指出它同小生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意义,认为租让制就是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而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的一种联盟。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38页。

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业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数量，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反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正因如此，小生产者害怕和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左派共产主义者”也怕它，正好反映了这种小生产者的意向和情绪，从而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提纲》中还说：实行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会“使苏维埃共和国服从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加强国际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削弱苏维埃政权和俄国革命的国际革命意义”，等等^①。他们所控制的乌拉尔州俄共（布）第六次代表会议还通过决议，指责苏维埃政权“正在逐步地把苏维埃变成国际资本意志的执行人，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停顿和十月革命一系列最重大成果的毁灭”。^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派共产主义者”既不懂得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更不懂得它的政治意义。他们不懂得列宁所提出的租让制，不仅是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手段，而且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一种策略。列宁提出的租让制的重要指导原则，从政治上考虑，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使它们互相敌视，互相抵消力量；从经济上考虑，就是利用它们对俄国原料的贪欲，使它们不得不过来同苏维埃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和租让合同。这样，就可以把受帝国主义强国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吸引到苏维埃国家的周围，结成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联盟，阻止它们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新的武装入侵，以利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发展和壮大。

^① 本刊第1辑第239页。

^② 《共产主义者》杂志1918年第4期第13页。

列宁还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例来论证租让制的正确性。他指出：德国在战败后被凡尔赛条约束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工业停滞，燃料和原料奇缺，粮食供应不足；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向德国租让一部分自己无力开发的油田、森林和荒地，它自然愿意签订租让合同，在政治上向苏维埃共和国靠拢；德国资产阶级本来疯狂仇视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但是，由于它同协约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又迫使它不得不违反自己原来的愿望，站到苏维埃一边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实际上，签订租让合同只是签订一种临时性条约。什么资源可以租让出去，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限度内签订合同，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签字。苏维埃政权只是把自己一时无力开发的资源租让出去，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都保留在自己手里。为了确保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早在1918年5月，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就按列宁关于租让制的指示讨论和确定了签订租让合同的原则：一是对苏维埃国家和外国企业家互相有利；二是保持苏维埃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绝对独立地位，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同年7月，人民委员会根据同外国谈判租让问题的情况，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吸收外资的提纲，对保证上述原则的贯彻作了详细的规定：一、必须保证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二、必须对承租人的活动进行监督；三、租让企业所在地不应成为外国的势力范围；四、在苏维埃俄国工作的外国资本家必须遵守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六、苏维埃共和国保留提前收回一切租让企业的权利。因此，苏维埃国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租让政策，决不是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和增加国际资本的影响，决不会丧失苏维埃国家的主权和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是刚刚相反。它在政治上是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分化和瓦解它们的力量，增加苏维埃政权和俄国

革命的影响；在经济上则是引进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来加速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列宁的坚持和斗争，苏维埃政权在1921年至1925年期内先后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九十多项租让合同，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引进了一定数量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这对促进苏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吸收资产阶级 专家来实施国家资本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管理好国家经济，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对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迫切需要大批具有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人才。苏维埃政权当时严重缺乏自己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力量。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列宁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并对他们实行高额薪金制。但是，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抱反对的态度。

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专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科学家、工程师、农艺师、教授、医生和各种企业、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些人本身就是资本家。他们在十月革命初期对苏维埃政权往往抱消极反抗（即怠工）的态度。在俄国无产阶级粉碎了剥削者最初几次的军事反抗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有一部分开明的资本家表示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参加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利

用他们来为无产阶级建设事业服务，因为这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绝对必需的，但苏维埃政权必须充分保持对他们的统率、领导和监督地位。

列宁非常重视专家的作用，把他们看成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代表，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列宁说：“任何一个专家都应视为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产，没有这份财产，就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① 列宁认为，只有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专家，只有把剥削阶级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

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提纲》中却把资产阶级专家说成是“特权人物”、“资产阶级奴仆”，是“打倒”和“粉碎”的对象。布哈林甚至在一次会议上主张把收入四千卢布的人枪毙，遭到了列宁的驳斥。列宁说：“我们正需要发现这样的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人们领取四千卢布的职位并不很多，到处都在拉他们，我们没有专家，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列宁号召要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列宁说：“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多么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们想用两句骤然听起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来说明：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应当是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③

奥新斯基一听说“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就大做文章，攻击列宁是“右派布尔什维克”，并且冷嘲热讽地说：“企业组织和企业领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6页。

② 《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7页。

③ 《列宁文稿》第3卷第53页。

导事务上的全部主动性，将属‘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①

列宁在驳斥奥新斯基时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②

“左派共产主义者”还说：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就是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就是不依靠工人阶级。他们到处进行煽动，说什么“我们主张依靠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性，而不依靠‘工业界巨头’的旨意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③；“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执行劳动纪律并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倒会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④。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把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企业生产的“领导”同依靠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否认他们也是在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服务。其实，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家或组织家，是为了让他们执行职务，如不称职，有工人代表的监督，随时可以控告和撤换，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放弃领导权。列宁说：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

① 《共产主义者》杂志 1918 年第 1 期第 1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55 页。

③ 《共产主义者》杂志 1918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④ 同上，第 1 期第 8 页。

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才。因为工人们在跨出能被‘左倾’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利用资本家来领导托拉斯，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每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到社会主义。”^①

列宁指出，布哈林等人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创办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本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理解俄国当时的具体特点。俄国在政治上建立了苏维埃制度，比西欧任何国家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和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都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因如此，工人阶级才要采用高薪报酬的方针吸收那些最有文化、最有才干和最有组织能力并且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列宁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当竭力避免犯两种实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一方面是认为俄国的经济力量既然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另一种错误是纵容那些专唱高调或从事空谈的人，他们在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四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 原理和政策的体现与发展

列宁与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4页。

发生的分歧和争论,归根到底,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发达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所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为前提。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取得政权,只要通过立法手续,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资产阶级占有的全部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公有,很快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能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它已经不适用了。历史的发展刚刚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发达的俄国首先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找出适合于俄国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列宁根据小农经济在俄国占优势的特点,认为在这里不能从小生产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实现过渡的任务。

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则不顾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主张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们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要求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坚持“直接过渡”论。这种极“左”主张如果成为现实,连当时的个体农民私有制也必须立即废除,这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处于同全国农民为敌的地位,从而破坏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布哈林等人当时坚持的“直接过渡”论实际上是取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原理和政策在1918年提出以后,由于不久爆发了国内战争,俄共(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制

度,并没有实现。乍看起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的这场争论,似乎是以实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直接过渡”论而告终。但这是一种假象。战时共产主义原是俄共(布)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为确保军事供应和争取内战胜利而被迫采取的临时措施,“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①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施的余粮收集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按照它的规定,农民必须把扣除口粮以后剩下的全部余粮交给苏维埃国家,以保证红军、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当内战还在剧烈进行的时候,大敌当前,农民为了打败沙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武装,暂时还能忍受这种余粮收集制,但在内战胜利结束以后,农民就对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1921年春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就是白卫分子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而煽起的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如果继续坚持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工农联盟就会破裂,苏维埃政权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列宁当时领导俄共(布)坚决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进行自由贸易,同时实行租让制。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宣告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和结束。列宁后来认为这次失败是党从内战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失败。他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②,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③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践表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从小生产决不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

^② 列宁在这里是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页。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否则，就会引起生产倒退，劳动生产率下降，工农关系对立，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这就用铁的事实否定了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直接过渡”论。

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实际上是重新实行列宁在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不但没有离开列宁本人过去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原理，而且是它的继续贯彻和发展，证明在俄国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叫做“新的”经济政策，完全是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而言。如果从内容来看，不但不“新”，而且由来已久。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税、自由贸易和租让制，其中两项就是列宁早已提出过的东西。他在1918年10月就主张向农民征收粮食税，至于租让制就提得更早了，但都因内战发生而未实现。列宁在1918年虽然还未谈到自由贸易的重要意义，但只要粮食税和租让制真正实行起来，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可见，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继续贯彻列宁在1918年提出的经济政策，它包含和继承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原理和政策。

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列宁有时把它的实质说成是“战略上的退却”^①，有时说成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②，有时又说是“无产阶级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无产阶级国家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运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③，等等。这些提法尽管略有不同，基本精神却是一个，即俄国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工农的经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页。

② 同上，第130页。

③ 同上，第368页。

济结合，奠定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必须实行粮食税、自由贸易和租让制。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实行粮食税，准许农民自由周转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即进行自由贸易，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与国内外私人资本家签订租赁合同，更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但是，列宁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并不可怕，因为它是受苏维埃国家限制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列宁称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要退到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经济条件，而这正是列宁在1918年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时力主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当时曾在一篇著名的论战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透彻地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步意义，并且说明了通过它在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列宁后来在谈到国家资本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的关系时，总要引用这篇文章中论国家资本主义的部分作为论据，证明他在新经济政策上的立场同他过去与“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的立场之间的历史上的联系。

当然，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不是简单地重复列宁过去的经济政策，而是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补充和发展。例如，列宁在1918年提出的纯粹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租让制，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的条件很苛刻，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列宁在实行粮食税以后，把“租让”政策的原则、原理和基础运用到自由贸易和地方流转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提出了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合作制”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计划”，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原理和政策。

由此可见，从列宁在 1918 年提出的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开端和起源，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和发展，给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实现了俄国工农在经济上的结合，巩固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使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最后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现就是贯彻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原理和政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原理和政策的胜利。

试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郑 异 凡

1928—1929年间，苏联开展了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阶级斗争熄灭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布哈林则被当作“熄灭论”的鼓吹者受到批判。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这场批判影响深远，后果严重，苏联三十年代后期的“大审讯”，我国的“文化大革命”，都同批判“熄灭论”有直接关系。现在，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有可能根据历史实践的检验来重新探讨，重新评价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对它的批判了。

所谓布哈林“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月革命后，布哈林曾多次宣传过长入社会主义的口号。1922年11月，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说：“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者讲得很多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长入社会主义。不过，我们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就在于什么时候开始长入的问题。修正主义者不愿意有任何革命，断言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认定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获得政权就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获得愈来愈大的基础，逐步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残余排挤出去，直到因此把资本主义社

会完全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止。”^①

这里布哈林指出了他在长入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修正主义者妄想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让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他则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即解决了政权这一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之后，才能开始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时间的划分是很重要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曾批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说他们想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通过居民合作化使阶级敌人转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转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这统统是幻想，但是当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全部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变了，“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②。把这段话同布哈林的论点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列宁这里也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分界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获得了“长入”或“合作社的发展”的两个重要前提：1. 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政权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 无产阶级国家控制了经济命脉，有足够的力量去改造非社会主义成份。

布哈林所说的“和平长入”是与革命相对而言的。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整个社会就不再需要革命，而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了。这里有一个对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布哈林所说的革命，指的是社会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以先进的生产关系取代腐朽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革命一词的正确意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它首先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镇

^① 《布哈林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40—14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压剥夺者的反抗。以后，新社会便开始有机地进化增长，这个增长本身就是伟大革命改造的组成部分。”^① 所以布哈林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将不经过任何革命而转入共产主义。”^② 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代表了社会多数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发展，由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不需要也不允许再经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在这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当然，苏联当时还存在富农问题，耐普曼问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要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一般说来可不再采用暴力镇压等革命措施，而可以用和平的办法解决。

布哈林所说的“和平长入”正是指通过和平的、渐进的、进化的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按照布哈林的设想，无产阶级从夺取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这是过渡时期，相应地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和平长入说的是过渡时期。布哈林认为，这个时期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除了矛盾、斗争这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是这样说的：“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同时是某种统一体，虽然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和在过渡时期实行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它转变为国内战争，因此工人阶级政党是国

① 布哈林《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真理报》1925年11月15日。

②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192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4页。

③ 《布哈林言论》第271页。

内战争的政党。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专政被打碎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那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维护这一专政免受一切攻击，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国内和平的政党，这就是说，它要求以前的统治阶级、阶层和集团服从工人阶级；它要求它们保持国内和平，追随工人阶级，并惩罚一切破坏国内和平的人、一切阴谋家和怠工者，一句话，惩罚一切扰乱和平建设新社会事业的人。”这种国内和平当然是有条件的，是“在一切阶层，包括新政权过去的敌人，完全承认新政权、它的法律、它的机构并服从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基础上的国内和平”。^①

布哈林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内和平”口号一直被当作机会主义口号受到批判。实际上这是列宁赞同过的口号。1921年8月5日，列宁在写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信中说：“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用‘国内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国内战争’的口号的人是可笑的，甚至是很糟的。”^②斯大林在1928年7月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既然我们掌握着政权，既然我们巩固了这个政权并且把一切经济命脉集中在工人阶级手里，我们就不希望阶级斗争采取内战的形式。”^③道理是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并大体上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就提到了首要地位，而要发展生产，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无产阶级决不能用发动国内战争来打乱自己的建设部署，在国内战争，连年动乱中是不可能进行任

① 《布哈林言论》第2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页。

何经济建设的。布哈林在1924—1927年间多次提出的“国内和平”口号只不过是列宁思想的阐述和发挥而已，但是当时重申并贯彻这一口号对苏联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过渡时期的社会是怎么发展的呢？布哈林认为，应当是通过“进化”的道路，采用“改良”的方法，“因为对我们的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进行慎重的改造、我们的各项‘改良’、我们的‘建设’都不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新形式下）的继续。”^①他引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的论点作为自己的依据。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②方法服从于任务。列宁提出新的方法是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直接联系着的。列宁此文写于1921年11月，也就是国内战争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不久，当时全国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关于重心的转移，列宁在一年后写的《论合作制》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③

布哈林在引用列宁的上述论断后，作了很好的解释：“这决不

① 《布哈林言论》第24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4、576页。

③ 同上，第687页。

是说，列宁在这里否认阶级斗争，因为‘和平组织’‘文化建设’工作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①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阶级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采取国内战争、没收剥夺的形式的。1924年，布哈林曾正确地指出：“过去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来说首先带有军事政治打击的性质，而现在它则开始具有和平的经济的面貌。在这种类型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在这里撇开了外部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②把这段话同上面所引的列宁《论合作制》中的论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布哈林的提法同列宁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阶级斗争有三种形式：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个起码的常识。把承认阶级斗争形式改变说成是否认阶级斗争，是站不住脚的。

十月革命后通过剥夺和国内战争，消灭了原有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但是农村的富农阶级仍然存在，在城市也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出现了叫做耐普曼的新资产阶级。对富农和耐普曼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当时在联共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一种意见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用剥夺的办法消灭它们，过两年去实行“第二次革命”。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主张用经济的办法同它们作斗争，这就是发展国营经济，发展农村的各种类型合作社，通过经济竞争，用排挤的办法逐步消灭它们。布哈林对比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指出：“如果我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在这里我们是错了。不是立即，而是通过排挤、战胜和改造一系列过渡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

^① 《布哈林言论》第301页。

^② 布哈林《论今日的取消派》，《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2期第6页。

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①对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私商、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的，也不是一挥革命的宝剑就能把它们消灭的，因为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存在市场，那就必然会在这基础上不断产生私商。但是应当看到，当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还起着某种有益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同它们进行经济斗争，在经济竞争中逐步地把它们排挤出去。“我们以什么方式排挤直接的敌人，私人资本家呢？用竞争，用经济斗争。如果他们卖东西便宜一些，我们就应该做到卖得更便宜。顺便指出，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②为了使经济斗争得以正常进行，布哈林主张“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③。实行新经济政策本来就是准备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加速经济周转来活跃城乡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用经济的办法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讲，从发展周转自由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于斗争的结局，他作了这样的对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私人企业进行竞争，大工业排挤中小工业，大资本吞并中小资本，最后胜利的是工业巨头和银行巨头。在过渡时期情况表而上大致与此相似，所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代替了工业巨头和银行巨头。由于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所以在这里是国家掌握的大工业排挤私人资本主义的中小企业，国家的批发商业、国营商业网排挤小私人商业企业，首先是零售商业。斗争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买主，而买主是哪里价廉物

① 《布哈林言论》第 176 页。

② 同上，第 175 页。

③ 同上，第 181 页。

美就到哪里买。只要善于正确地组织企业，那么一切优越性都将在国营大生产方面，取得最后胜利的也必将是它们。在农村，把小农经济组织成能同富农较量的合作社，利用国家的援助，通过竞争同样能把富农经济排挤出去。

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始终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经济上要比私人资本强大得多，另一方面它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用立法、税收等制度保护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排挤私人经济。布哈林指出：“既然我们实际掌握了经济命脉，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阶级力量的变动。如果我们没有银行，而建立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那么它就会压垮我们。而如果我们有了银行，我们贷款给它，那么它就会从属于我们。如果我们两手空空，那么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如果他是我们银行的存户，他就不能战胜我们。”^① 无产阶级国家从各个方面支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例如用立法保护工人的事业，保证工会有一定的权利，迫使私人企业主支付工人保险金，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课税，给予合作企业以优待和优先权，给它们以财力支援，用立法保证它们享有较大的权利，等等。用布哈林的说法，这就是“在我们的政治中包含了相当多的经济，因为在我们国家政权的机构里，已经包括了各种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命脉也包括在内”。^② 布哈林指出：“在这里也有镇压，但这不是重点。在这里也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在排挤和消灭的基础上将会战胜阶级敌人及其代表的经济形式。归根到底，我们要撵走‘耐普曼’。”^③ 布哈林预期：“由于各种私人企业主

① 《布哈林言论》第 181 页。

② 同上，第 187 页。

③ 同上，第 159 页。

及其私人经济遭受排挤，随着国营合作社经济继续组织并日趋完善，我们将逐渐地愈来愈接近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愈来愈向计划经济过渡，那时，一切都属于劳动者，全部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劳动群众的需要。”^①

布哈林的这些设想和方案，到底如何，是否行得通，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说布哈林主张保护资本家，搞阶级合作，看来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布哈林的上述言论只不过是联共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决议的阐述而已。例如决议写道：“在经济政策方面，必须使一切经济部门（包括农村在内）尽量扩大经济周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真正得到巩固。对于最近几年内不可避免地要增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成分，将以经济斗争的手段和基本农民日益合作化来加以克服。由于商品流转更加迅速，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速度也将加快，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将有愈来愈大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增长。”^② 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重申了这一政策，指出要由行政压制手段转变到经济竞赛和经济斗争，利用、克服并排挤资本主义成分。^③ 应该说，布哈林对联共决议的阐述是准确的，看不出有歪曲之处。

对待农村中的富农，布哈林同样主张用经济手段同他们进行斗争，而反对采用剥夺、扫地出门的办法。

1925年俄共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农村实行了一些新措施，其中包括放宽雇工和租佃的条件。这就是允许一定限度的剥削，使农村的雇佣劳动和剥削合法化，富农可以租赁贫农无力经营

① 《布哈林言论》第217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4页。

③ 同上，第80—81页。

的土地扩大自己的耕地，同时利用雇工耕种。同样，这也使一些中农、富裕农民有可能利用这种新规定，发展自己的经济。事情很清楚，苏维埃政权既然采取这种措施，那它自然就不应该同时宣传在农村实行剥夺政策，搞第二次革命，否则势必使现行政策成为一纸空文。布哈林论证了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他指出，由于雇工和租佃合法化，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可以得到工作，他们出卖劳动力的时候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样，无力耕种土地的贫农在把土地出租给富农时也可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这以前，由于在出卖劳动力和出租土地上多半是贫雇农有求于富农，并且又不大合法，所以富农经常利用这一点私下加重对他们的盘剥。富农自然会利用新措施，利用贸易自由扩大和发展他们的经济，但布哈林认为这归根到底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他设想，富农积累的结果必然会出现大量闲置的资金，他们如果想要使这些资金生利，只有把它们存入国家银行，而国家银行则可以把这些存款贷给贫农，援助中农，作为他们兴办合作社、发展生产的资金。贫农、中农合作社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把富农经济排挤出去。

正是出于发展农村经济的考虑，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1925年4月17日，他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①他解释说，农民经济的积累意味着对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能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应该说，布哈林对农民经济的发展同工业发展

① 《布哈林言论》第184页。

的相互促进关系的解释是颇有见地的。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党内就有不同看法。后来布哈林在一篇文章中检讨说：“发财吧”这一口号“无疑是对党应持提高农村富裕水平的方针这一完全正确的原理的错误表述”^①。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为这口号展开争论，当时斯大林虽然认为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但他认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比起来“甚至是不值得注意”，“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②何况他已承认了错误。直到后来，到三十年代中期，这个口号才被上纲到“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③的高度。

布哈林设想有两种“长入”：“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将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④

这是1925年说的，三年后此语被当作布哈林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证据”。为了弄清布哈林的原意，且引他1925年在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一段发言作为注解。他在展望农村将会出现哪些成分时指出，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农村将会出现贫农合作社（集体农社），销售、采购、信用等方面的中农合作社，一些地方还会有富农合作社（它们将在信用合作社中拥有自己的据点）。“这个阶梯都将长入我们的银行、我们的信用机关的体系，并同时长入

① 布哈林《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真理报》1925年11月14日。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9—321页。

③ 同上，第13卷第317页。

④ 《布哈林言论》第210页。

我们一切经济机关的体系。总的说来我们这里会是怎样呢？总的说来我们这里会是这样：如果富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如果贫农和中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社会主义合作社。”^①

可见，布哈林所谓富农合作社“长入”云云，指的无非是富农合作社同国家经济机构联结在一起，具体点说，就是把闲置的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以取得一定的利息继续发展他们的经济。但这样一来它们也就得在一定程度上受无产阶级国家的控制。其次，布哈林的用词是谨慎的，说的是长入经济机关的体系，而不是一般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按当时的见解，社会主义社会是已消灭阶级的社会，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是不可能长入的。第三，布哈林说得很清楚，富农合作社长入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而不是社会主义成分，也就是说，对社会主义成分来说，它仍然是“异类”。有人说，布哈林明知是异类，还认为可以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取消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实际上布哈林说的是，它虽然能长入经济机关体系，但毕竟是异类，并没有混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使富农合作社同银行等国家机关联结在一起，使它受无产阶级国家控制，这是同富农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

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光靠暴力是不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反对富农的斗争除了镇压以外，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布哈林认为，对付农村中的私人店铺的办法不是封闭店铺，而是办好消费合作社，对付富农高利贷的办法是组织信用合作社，搞好低息的合作信贷。“我们的商品应当比私商的商品价廉物美，我们的贷款应当比高利贷者的贷款额大息低，合作社应当比私商更善

^① 《布哈林言论》第203页。

于经营,更能满足农村的地方性需求。”^①

在同富农斗争中应当充分利用苏维埃国家的力量。例如国家的立法就是同富农作斗争的强大工具,是有利于劳动农民的。布哈林指出,“甚至为富农做工并受富农剥削的雇农,尽管受富农的支配,但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却支配着富农,因而可以通过法律,以一系列最独特的形式迫使自己的‘主人’富农服从自己的阶级意志。我们有合同,我们有工人立法,我们有征税制度,最后,我们还有信贷政策”^②,这些都是同富农作斗争的武器。在选举时使劳动农民的候选人当选,在征税时,对富农的课税多于其他农民,在贷款时只资助贫农、中农,这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用征税而不是用剥夺和强征的办法同资产阶级斗争,这是列宁早在1918年就提出过的办法。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向资产阶级强征,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行并且会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方法,但是,事实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多半象是夺取的方法(把俄国从富人手里夺过来交给穷人),而很少象是实行管理的方法。可是,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就必须转而采用这第二种方法,就必须用经常正确地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办法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强征的办法。这种税收办法,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③列宁这里不仅肯定了税收的办法,并且从原则上肯定了管理的办法优于夺取的办法。可以看出,布哈林的主张同列宁是一致的。

布哈林认为,“对富农斗争的主要办法,就是使中农脱离富

① 《布哈林言论》第216页。

② 同上,第203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505—506页。

农。”^①富农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得到中农的支持，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对待中农的政策上出现了偏差，例如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农当作投机分子对待，在经济措施上不给中农以支持，不注意抓好中农合作社，在同富农斗争中侵犯中农利益，等等，结果就会把中农推向富农那边，就等于帮了富农的大忙。在农村中只有使中农同贫雇农结成坚强的联盟，才能组成农村的多数，才能有效地对付富农。布哈林指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中农经济的增长，中农经济的商品率也在增长，中农开始关心起扩大商品流转范围了，他们做的买卖增加了，他们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越来越感到不满了。“凡是限制商品流转的一切措施，都给日益发展的中农经济以沉重的打击。”^②因此，1925年布哈林反复强调，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他说：“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村，对农民的让步。它同时也是我所说的战略手段：即退却、改组队伍和以旨在保持同中农联盟的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崭新方法实行进攻。”^③

布哈林这里提出的中农问题，是当时苏联农村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农介于贫农和富农之间，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很接近富农，在反对富农斗争中稍不注意就会波及中农，损害中农利益。我们看到，后来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偏差和错误，在许多方面都同不正确地对待中农有关，例如在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褫夺中农的选举权，象剥夺富农那样剥夺中农财产，“忘记了和中农群众的经济结合不应当建立在强制手段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中农协议的基础上”。斯大林把不正确地对

① 《布哈林言论》第 229 页。

② 同上，第 231 页。

③ 同上，第 232 页。

待中农看作是当时“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①

“长入”问题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能不能、允许不允许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实行和平经济改造，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把他们排挤出去，以至最后消灭这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原则上都赞同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写道：“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②十月革命后，还在1918年，列宁也谈到对资本家实行镇压和赎买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认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③当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用赎买、还是通过经济斗争达到排挤以至消灭的目的，这是可以探讨的，也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提出对资本家和富农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7—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315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550页。

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只承认镇压、剥夺是反对资本家、富农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显然是片面的。

列宁说过：“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①1929年4月布哈林在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上曾引用列宁的这段话为自己辩护，但是他被指责为利用列宁的话否定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布哈林在全会上的发言没有公布过，但是我们看到1925年发表的《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一文曾引用过列宁的这段话。他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解释：除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任何社会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各阶级的统一，“可是，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反映整个社会统一的某种‘阶级合作’的外壳，那么，这决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停止，而是阶级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就当时苏联的情况来说，新资产阶级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阶层，“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着对社会有益的职能；对待新资产阶级决不能只限于用镇压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有无产阶级的合作，而在这种合作之中就包含着阶级斗争”，这就是利用、排挤并最后战胜这个新资产阶级。^②关于合作，布哈林认为，“需要严格区分两种东西：一是在社会中的合作，一是政权中的合作，即在几个阶级之间分掌这一政权。合作甚至联盟，牢不可破的联盟，还不是分掌政权。”^③同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合作并不等于政权中的合作，无产阶级是不同资本家、富农分掌政权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7页。

^② 《布哈林言论》第158、159页。

^③ 《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哈林著作选）1967年纽约俄文版第293页。

还必须指出，布哈林在谈论“长入”、“合作”的同时，也指出了采取恐怖手段反对富农的可能性。他在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就说过：“如果我们不幸发生了战争，我们应该还去组织贫农委员会，如果富农举行暴动来反对我们，我们将采取恐怖手段对付富农。”^①

布哈林还被指责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上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下面是布哈林受到批判的一段话：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别人发财并钻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刺杀农村通讯员，——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的地区。十分明显，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②

尽管这段话有表述不确切的地方，但意思是清楚的。第一，指出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这就指明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阶级根源，根本原因。第二，一些地方苏维埃机关软弱，给富农分子以可乘之机。注意加强苏维埃机关，不给富农分子提供机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之一，是无产阶级政权防止和制止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主要途径。此外，历史证明，造成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政权在政策上的错误也往往人为地造成阶级斗争尖锐化、扩大化，这一点也应给予高度注意。应该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

^① 《布哈林言论》第 204 页。

^② 同上，第 213—214 页。

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否认这一点，认为不管情况如何，阶级敌人总是要反抗的，阶级斗争总是要尖锐化的，这就势必走向宿命论的观点。布哈林指出苏维埃机关需要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建设，说的是从无产阶级政权方面主动采取措施防止阶级斗争尖锐化，这同歪曲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扯不到一起的。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考察“阶级斗争熄灭论”本身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之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同这种观点对立的则是布哈林的被称之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这一理论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被概括为三句话：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

为了弄清楚布哈林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真正观点，有必要看看他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论述。

1919年底，布哈林在《共产主义 ABC》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发展趋势时写道：“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也就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的自由，捆住它的手脚，不让它进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反抗越激烈，它越疯狂地调动自己的力量，它越是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就应当越严厉和越无情，不得已时甚至应该不惜采取恐怖手段。只有在剥削者被彻底镇压的情况下，即当他们不再反抗的时候，当他们不再有任何可能来祸害工人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日益缓和下来（смягчаться），那时从前的资产阶级将渐渐地同无产阶级溶合起来，工人国家逐渐消亡（отомрет）；而整个社会就将变为没有任何阶级的共产主义

社会。”^①

1925年初发表的《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对比了资本主义下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分裂和没有崩溃的时候，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而在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消亡’（отмирать）。”^②同年出版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写道：“我们知道得很清楚，阶级斗争不会一下子停止和消亡，而是还要持续很长时期，直到阶级划分最终消失为止。”^③

写于1927年的《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时期》一文比较集中地谈到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文章写道：“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但是，这决不排斥这些矛盾在一定发展时期内的**尖锐化**。……在发展的初期，当重心还在于某种比较公开和尖锐的冲突的时候，一个时期的矛盾尖锐化可以说是一种规律。就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排斥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这里需要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过渡时期的矛盾不会马上消失，它们将在**阶级斗争**中被克服。……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最后则会**克服矛盾**。但是，正是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行动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它排挤城乡资产阶级，**领导农民和改造农民**。”^④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布哈林的基本观点是：1.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只有在这以后，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趋于缓和。2. 在过渡时期并不排除在某一阶段阶级斗争尖锐

①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第53页。

② 《布哈林言论》第158页。

③ 同上，第211页。

④ 同上，第242, 246—247页。

化的可能性。3. 阶级斗争的形式会起变化，但形式的变化不等于停止或取消阶级斗争。4.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渐缓和，以致最后“消亡”，阶级斗争要延续到阶级划分最终消失为止。

现在我们把布哈林所阐述的阶级斗争消亡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对照一下。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①无产阶级国家不是被废除、被消灭的，而是自行消亡、自行停止的。列宁曾经称赞“国家消亡”这一说法，认为它“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现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②。无产阶级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同样适用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是被废除、被消灭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随着阶级的消失而逐渐“消亡”或“熄灭”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那么阶级斗争就永无消亡之日，就会一百年、一千年地斗下去，不可能想象，这样斗的结果有朝一日会突然出现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突然停止的世界。在布哈林的文章中没有发现“熄灭”（потухание）一词，这个词很可能是批判者概括出来的。但是如果抛开布哈林本人所没有说过的内容（如“立即消灭”、“很快消灭”、“阶级敌人不会反抗”之类），那么说阶级斗争将“熄灭”，或用布哈林自己的话说，将“日益缓和”、“消亡”（отмирать）、“静息”（утихать），这只不过是反映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熄灭或消亡论正如国家消亡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什么异端邪说！

总的说来，布哈林无非是主张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及时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式，从镇压为主改为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7—248页。

经济斗争为主，用竞争的办法，排挤、改造并最后消灭私商和富农。这一主张是值得重视的，至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他提出的办法是否行得通，也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探索和检验。但是把布哈林的这些主张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却是缺乏根据的。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一个正确的理论被当作机会主义遭到批判，混淆了是非界限，那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实践，使实际工作走上歧途。苏联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反右倾的结果是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大审讯”中都可以看到这场批判的严重后果。

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许多地方是歪曲对方观点，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应当指出，布哈林在1929年受批判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言论多半是在1925年发表的，但批判者却完全脱离当时（1925年）的具体历史条件，也不提当时党的政策，这样的批判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从这里可以吸取一个重要教训，这就是在批判机会主义或所谓机会主义时必须完整地全面地了解对方的整个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反对断章取义，对机会主义也不应该断章取义。用断章取义，取其片言只语，攻其一点的办法进行批判，对真正的机会主义未必能击中要害，对被误认为机会主义的理论则往往以讹传讹，混淆是非界限，弄乱人们的思想，也给实际工作造成损失。

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既需要讲出活着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也需要讲出死去的政治家的实情，因为凡是真正应该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①讲出死去的政治家的实情，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肩上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16页。

文献和资料

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纪要(摘录)

(1928年7月11日)

加米涅夫:斗争确实很严重吗?

布哈林:这正是我要谈的问题。我们感到,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我们会因此被推翻。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远比我们过去同你经常发生的分歧要严重得多。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都同意对局势作这样的估计:“如果在政治局里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会好得多。”我曾对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非常坦率地谈过这一点。我和斯大林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说话了。他是一个无耻的阴谋家,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把持着一切。他的主张是根据排斥异己的需要而变化不定的。在我们“七人”^①中进行争论的时候,他曾经用过“虚伪”、“你撒谎”等等最尖锐的字眼。现在他作出让步,是为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懂得这一点。他的诡计不过是要把我们弄成宗派主义者……他在全会上宣布的路线是:(1)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依靠殖民地,就是依靠外债,或者依靠对工人的剥削。我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不能借债,因此,我们主要靠农民的贡税。你知道,这正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

^① 政治局多数委员组成的非正式领导小组。——编者注

主张；(2)社会主义越发展，它所遇到的反抗越强烈……这是胡说八道；(3)由于需要贡税，由于反抗会增长，我们要加强领导。自我批评不适用领导人，而只适用于执行命令的人们。实际上，自我批评是针对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的。结果，我们正在形成一种警察制度。这虽还不是“布谷鸟已经叫过了”^①的问题，但确实会决定革命的命运。按这种主张一切都会毁灭……

彼得堡(列宁格勒)的人民一般是拥护我们的。但是，当谈到可能要撤换斯大林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我们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1)中层的中央委员仍不理解分歧的深刻程度；(2)对分裂极其恐惧。因此，当斯大林在采取非常措施方面作出让步时，就使我们难于向他进攻。我们不想成为宗派主义者，要不然他们就会把我们打倒。而托姆斯基在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中说得很清楚，斯大林是一个宗派主义者……

译自丹尼尔·史密斯《共产主义史料》1960年
纽约英文版第308—309页。

(严伦译)

^① “布谷鸟已经叫过了”是一句预言不祥之兆的话。——编者注

对布哈林的审讯

(1938年3月5日)

审判长乌尔利赫：现在我们对被告布哈林进行审讯。被告布哈林回答第一个问题：您承认您在预审中招认的反苏维埃活动的口供吗？

布哈林：我完全承认我的口供。

维辛斯基：简要谈谈，您认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布哈林：第一，参加反革命右派和托派联盟。

维辛斯基：从哪一年开始？

布哈林：从联盟成立开始。我承认还在此以前就犯了参加反革命右派组织的罪。

维辛斯基：从哪一年开始？

布哈林：大约是从1928年。我认为自己的罪过在于：我是这个“右派和托派联盟”的最大的首领之一。

维辛斯基：这个反革命组织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布哈林：这个反革命组织，如果简要地说……

维辛斯基：对，暂时说简短一点。

布哈林：它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就其实质来说，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关系。虽然说起来，也许还不够自觉，还不那么明确。

维辛斯基：推翻苏维埃政权？

布哈林：推翻苏维埃政权，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维辛斯基: 借助于什么?

布哈林: 借助于苏维埃政权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其中包括利用预计未来爆发的战争。

维辛斯基: 在预计未来爆发的战争中靠谁的帮助?

布哈林: 靠外国。

维辛斯基: 以什么为条件?

布哈林: 如果具体地说,就是以一系列的让步,直到割让领土。

维辛斯基: 这是指什么?

布哈林: 如果要作多余的解释,就是以瓜分苏联为条件。

维辛斯基: 夺走苏联的很多州和共和国?

布哈林: 是的。

维辛斯基: 例如?

布哈林: 乌克兰、滨海地区、白俄罗斯。

维辛斯基: 给谁?

布哈林: 给德国、给日本,一部分给英国。

维辛斯基: 关于破坏活动的情况呢?

布哈林: 破坏活动的情况是这样:最后,特别是在托派那部分人,即大约在1933年形成的所谓联络总部的压力下,尽管有很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骗人的政治圈套,在经过各种波折、争论之后,还是通过了破坏活动的方针。

维辛斯基: 也就是削弱和破坏国防能力的方针?

布哈林: 表面上不是这样,但就实质而言是这样。

维辛斯基: 但是,在这方面活动已经明确?

布哈林: 是的。

维辛斯基: 关于破坏行为,您也能这样说吗?

布哈林: 我主要是研究一般领导问题和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

工作，当然，这并不排除我了解实际事务，也不排除从我这方面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

维辛斯基：但以您为首的联盟是否提出了组织破坏行为的任务？

布哈林：就我根据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各种不同的单个事物所能作出的判断，这取决于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

维辛斯基：被告霍扎也夫，您同布哈林谈过加紧破坏活动吗？

霍扎也夫：1936年8月在我的别墅里，当我同布哈林谈话时，他指出，我们民族主义组织的破坏工作很薄弱。

维辛斯基：到底要干些什么呢？

霍扎也夫：加强破坏活动，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转向组织暴动、恐怖活动，等等。

维辛斯基：在你们那里提出过组织暴动的任务吗？

布哈林：有过暴动的方针。

维辛斯基：有过方针？您曾派斯列普柯夫去北高加索组织这件事。您派雅科温科去比斯克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吗？

布哈林：是的。我想，当您问到中亚细亚时，在我的回答中指的也只能是中亚细亚。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在“右派和托派联盟”的活动中有过组织暴动的运动？

布哈林：有过。

维辛斯基：联盟有组织恐怖活动、杀害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这些目标吗？

布哈林：有，我想，这个组织出现的日期大约可以定在1932年秋天。

维辛斯基：而您同杀害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有什么

关系？这次暗杀也是经“右派和托派联盟”同意并按其指示进行的吗？

布哈林：我对此一无所知。

维辛斯基：被告李可夫，关于杀害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您知道什么情况？

李可夫：关于右派分子和联盟的一部分右派参与杀害基洛夫，我一无所知。

维辛斯基：您同叶努基泽有联系吗？

李可夫：同叶努基泽？很少。

维辛斯基：他是“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参加者吗？

李可夫：从1933年起就是。

维辛斯基：被告亚哥达，您知道现在被告李可夫所说的叶努基泽代表联盟中的右派，并与组织杀害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有直接关系吗？

亚哥达：李可夫和布哈林都没说真话。李可夫和叶努基泽参加过讨论杀害谢·米·基洛夫问题的总部会议。

维辛斯基：右派同这件事有关系吗？

亚哥达：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联盟是右派和托派的联盟。

维辛斯基：其中被告李可夫和布哈林与这次暗杀都有关系吗？

亚哥达：有直接关系。

维辛斯基：您作为“右派和托派联盟”的成员，与这次暗杀有关系吗？

亚哥达：有。

维辛斯基：现在布哈林和李可夫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是真话吗？

亚哥达：这不可能，因为当叶努基泽转告我说，他们即“右派和

托派联盟”在联席会议上就对基洛夫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作出了决定，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维辛斯基：为什么？

亚哥达：我声明，我不容许任何恐怖活动。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维辛斯基：并且对组织来说是危险的？

亚哥达：当然。李可夫和叶努基泽开始坚决反对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在“右派和托派联盟”另一部分人的压力下，他们同意了。叶努基泽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维辛斯基：在这以后，您本人采取过什么措施来杀害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

亚哥达：我对扎波罗热茨下达过指示。当尼古拉也夫被捕的时候……

维辛斯基：第一次？

亚哥达：是的。扎波罗热茨来向我报告，说抓住了一个人……

维辛斯基：在这个人的公文包里？

亚哥达：有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本日记。但他把这个人放了。

维辛斯基：而您同意这样做吗？

亚哥达：我予以查照备案了。

维辛斯基：而您以后发出了别阻挠杀害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的指示吗？

亚哥达：是的，发出过……

维辛斯基：还问布哈林一个问题。您对恐怖活动，对针对苏维埃活动家的恐怖活动，是抱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

布哈林：您问…… 我，作为右派和托派总部的参加者，是不是拥护者……

维辛斯基：恐怖活动的拥护者。

布哈林：是。

维辛斯基：针对谁？

布哈林：针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维辛斯基：您成为这样的拥护者，大约是从1929—1930年开始的吗？

布哈林：不，我想大约是从1932年开始的。

维辛斯基：而您在1918年不是赞成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吗？

布哈林：不，没有。

维辛斯基：您曾赞成逮捕列宁吗？

布哈林：逮捕？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况……

维辛斯基：有过这种事？

布哈林：是的。

维辛斯基：是要杀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吗？

布哈林：第一次是说扣留二十四小时。

维辛斯基：而在1918年你们曾打算逮捕斯大林同志？

布哈林：曾议论过要组织那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新政府。

维辛斯基：我问你们在1918年有逮捕斯大林同志的计划没有？

布哈林：有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计划。

维辛斯基：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布哈林：完全对。

维辛斯基：而关于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呢？

布哈林：绝对没有。

维辛斯基：我请求法庭：在今天审讯结束以前，或者在下次审讯时，传讯与本问题有关的证人：前“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积极参加者雅柯夫列娃，前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积极参加者奥

新斯基、曼采夫，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卡烈林和卡姆柯夫，以审问他们关于布哈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否有过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计划，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计划。

审判长乌尔利赫（在同法官们商议以后）：法庭决定满足国家公诉人关于传讯雅柯夫列娃、奥新斯基、曼采夫、卡烈林和卡姆柯夫作为证人的请求。

被告布哈林，您如果想交代一点您的反苏罪恶活动，那就请说吧。

布哈林：我想谈谈关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可以吗？

维辛斯基：当然可以，这是您的专长……

布哈林：我想从思想方针谈起。我想回答公民国家公诉人向拉柯夫斯基提出的那个问题：“右派和托派联盟”为什么进行这种反苏维埃政权的罪恶斗争。我知道，我不是演讲人，不应该在这里说教。我是个被告，应当作为罪犯站在无产阶级国家法庭面前承担罪责。

我们全都变成了凶狠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我们变成了间谍、恐怖分子、资本主义复辟者。我们走上了背叛、犯罪、变节的道路。我们变成了暴动队，组织了恐怖集团，从事破坏活动，想推翻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您说说，你们的反苏维埃活动实际上是怎样实现的？

布哈林：那就请允许我列举一些纲领性要点。现在我就来说一下我的反革命实际活动。

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概括我的纲领性方针，那么，在经济方面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善于经营的个体农夫，减少集体农庄，实行对外

国的租让制，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结果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化。

维辛斯基：您的目的何在？您预定的一般结果是什么？

布哈林：预定的结果是大大倒向资本主义。

维辛斯基：而实际结果呢？

布哈林：实际结果完全是另一回事。

维辛斯基：实际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布哈林：实际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维辛斯基：和你们的预定结果的彻底破产？

布哈林：和我们的预定结果的彻底破产。在国内，我们的实际纲领，——应当说，——就是滚向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滚向联合，因为从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派别结成联盟得出的结论就是成立各种政党的自由，而从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又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出联合的结论，因为如果要为自己挑选推翻政府的同盟者，那么，一旦获得想象中的胜利，他们第二天就会成为政权的参加者。这不仅滚上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道路，而且在政治意义上滚上了具有凯撒主义成分的道路。

维辛斯基：简单地说，就是法西斯主义。

布哈林：如果“右派和托派联盟”持指靠富农阶级的思想方针，同时持宫廷政变和国家政变、军事密谋与指靠反革命分子御用禁卫军的方针，那么，这就无非是法西斯主义的成分。

维辛斯基：简单说来，你们滚进了极端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泥坑。

布哈林：对，说得对，尽管我们还不那么明确。现在请允许我立即交代我的犯罪活动。

维辛斯基：也许可以先由我来提两、三个履历方面的问题？您在奥地利住过吗？

布哈林：住过。

维辛斯基：多久？

布哈林：1912—1913年。

维辛斯基：您同奥地利警察局没有联系吗？

布哈林：没有。

维辛斯基：在美国住过吗？

布哈林：住过。

维辛斯基：多久？

布哈林：七个月。

维辛斯基：在美国同警察局没有联系吗？

布哈林：绝对没有。

维辛斯基：从美国回俄国您是经过……

布哈林：经过日本。

维辛斯基：在那里逗留了多久？

布哈林：一星期。

维辛斯基：在这一星期里，您没有被人招募吗？

布哈林：如果您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

维辛斯基：根据刑事诉讼法典，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

审判长乌尔利赫：检察长更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您，布哈林，被控告早在1918年就企图杀害党的领导人，还在1918年就谋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维辛斯基：我没有越出刑法典的范围。

布哈林：完全正确。

维辛斯基：同警察局没有任何联系吗？

布哈林：绝对没有。

维辛斯基：那么，为什么您这样容易就组成了从事间谍工作的

联盟？

布哈林：关于间谍工作，我毫无所知。

维辛斯基：那联盟是干什么的？

布哈林：这里曾传过沙兰戈维奇和伊万诺夫即两个奸细关于间谍活动的两份供词。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那么您认为李可夫是奸细吗？

布哈林：不，我不认为。

维辛斯基（对李可夫）：被告李可夫，您知道“右派和托派联盟”进行间谍工作吗？

李可夫：我知道有从事间谍工作的组织。

维辛斯基：您说一说，白俄罗斯民族主义法西斯组织作为你们的“右派和托派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被告沙兰戈维奇领导进行过间谍工作吗？

李可夫：对。

维辛斯基：同波兰侦探机关有联系吗？

李可夫：有。

维辛斯基：您知道这件事吗？

李可夫：知道。

维辛斯基：而布哈林不知道吗？

李可夫：据我看，布哈林也知道。

维辛斯基：是这样？被告布哈林，这不是沙兰戈维奇说的，而是您的好友李可夫说的。

布哈林：尽管这样，我还是不知道。

维辛斯基：我想向被告布哈林解释一下。您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要向您问及奥地利吗？

布哈林：同奥地利警察局的联系，就是我在奥地利的要塞中

被囚禁过。

维辛斯基：被告沙兰戈维奇，尽管您也坐过牢，但您还是波兰的间谍，是吗？

沙兰戈维奇：是的，尽管我也坐过牢。

布哈林：我在瑞典坐过监牢，在俄国坐过两次监牢，还在德国坐过监牢。

维辛斯基：您坐过监牢并不能证明您不会成为间谍。

被告李可夫，您来证实一下，布哈林在不同国家坐牢以后，他和您都知道沙兰戈维奇与波兰侦探机关保持间谍联系吗？他知道并同意这件事吗？

李可夫：我知道有进行间谍工作的组织。

维辛斯基：布哈林坐过各种监牢，但并不妨碍他同意自己的同谋者与波兰侦探机关进行联系。您明白这一点吗？

布哈林：我明白，但我否认这一点。

维辛斯基：你们的反革命右派组织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布哈林：我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接近大约是在1928—1929年。以后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进行联系和试探，并秘密会议，在这种基础上迅速形成领导右派组织的特殊组织，它大体上有如一个等级阶梯：三人小组——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

在1930—1931年开始了右派反革命组织发展的下一个阶段。那时国内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富农阶级暗中破坏，反抗党的政策，如此等等。我认为这个阶段是在一切方面转向“骑墙的态度”。三人小组变成了秘密总部。因此，如果说从前这个三人小组是反对派集团的头目，那么，它现在就变成了反革命秘密组织的总部。

叶努基泽密切参与这个秘密总部，他通过托姆斯基同这个总部联系。乌格拉诺夫同它保持密切关系。

大约到1932年秋，开始了右派组织发展中的下一个阶段，即转入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策略阶段。

转向暴力推翻策略的时间，我可以大致确定是在制定所谓柳亭纲领的时候。它之所以称为柳亭纲领，是为了保密，防止泄密。

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托洛茨基不得不抛弃自己左的外衣。当需要确切说明究竟要干什么的时候，他的右派立场就立即暴露出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不主张非集体化，等等。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您从思想上武装了托洛茨基主义？

布哈林：完全对。这里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托洛茨基坚持采取尖锐的斗争方法，而我们则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上武装他。在柳亭纲领中已经决定转向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策略。柳亭纲领是以右派总部的名义批准的。柳亭纲领的实质就是“宫廷政变”、恐怖活动和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联合的方针。当时已经产生了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时期同司尔佐夫和洛米纳泽有过会晤。

我利用了许多合法的机会来达到反苏维埃的非法目的。皮达可夫在1932年夏天的一次谈话中讲过，他同谢多夫会暗时谈过关于托洛茨基的恐怖方针。那时我和皮达可夫认为，这不是我们的主张，但是，我们决定尽快找到共同语言，在反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消除分歧。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也许我弄错了——同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谈过。我记得，托姆斯基在那个时期特别坚决主张实行国家政变和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而右派总部的成员们则以暴动运动为目标。1932年已经建立了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反革命联盟。

审判长乌尔利赫：审讯到此结束。下次审讯在3月7日上午11

时举行。

译自《真理报》1938年3月7日。

(张海滨译 郑异凡校)

对布哈林的审讯(续)

(1938年3月7日上午)

审判长乌尔利赫:被告布哈林,继续招供你们的反苏活动。

布哈林:第三天我在结尾时说,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盟大约是在柳亭纲领基础上在1932年底形成的。这时候,恐怖情绪在右派反革命组织者的参加者中间已经开始产生了。可以断定,在所谓我的学生中间,在乌格拉诺夫周围聚合起来的马特维也夫集团中间,在李可夫的追随者中间和在某些工会工作人员中间确有这种情绪。红军中的阴谋集团是在这个时期组成的。关于这一点,我是听托姆斯基说的,他是从叶努基泽直接得到这方面消息的。

大概是在这同一时间,即在1932年底或1933年初,由各种反党反革命派别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左派代表,组成了所谓联络总部。

我们右派阴谋分子产生实行国家政变的念头大约是在1929—1930年间。这种念头首先是托姆茨基说出来的,因为他同叶努基泽的私交很密,经常来往,克里姆林宫的警卫这时掌握在这个人手里。同时,可能还谈了要利用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我们在这个时期讨论过依靠军人集团、阴谋参加者用暴力推

翻苏联政府的问题。

维辛斯基: 通过土哈切夫斯基、普里马科夫和其他某些人?

布哈林: 完全对, 在 1931—1932 年间, 由于政治情况发生变化, 特别注意开展暴动运动, 所以, 反革命右派组织在右派总部的领导下, 煽起了几起富农暴动。

维辛斯基: 是在您的直接指示和直接领导下?

布哈林: 完全对。我派斯列普柯夫去库班河一带策划富农暴动。李可夫派埃斯蒙特去高加索, 他同右派分子皮沃瓦罗夫和托洛茨基分子别洛博罗多夫进行联系。此外, 我还可以交代一点, 关于富农的暗中破坏活动是作为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的某种预备阶段, 这是 П·彼得罗夫斯基和扎伊策夫告诉我的。

维辛斯基: 既然您谈到了埃斯蒙特, 我要问您关于您同白卫分子和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联系, 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布哈林: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 我不记得了。

维辛斯基(对法官): 请允许我问一下李可夫。您对这个问题能说什么吗?

李可夫: 我从皮沃瓦罗夫那里得知, 按照斯列普柯夫的指示和建议组织起来的哥萨克同盟……

维辛斯基: 白卫哥萨克同盟?

李可夫: 对, ……他通过当了反革命组织的干部的一些归侨同留在国外的哥萨克侨民发生联系, 德国法西斯分子在这种联系中给了帮助。

维辛斯基: 被告布哈林, 您知道这件事吗? 认得皮沃瓦罗夫吗?

布哈林: 我不知道皮沃瓦罗夫。

维辛斯基: 李可夫知道, 皮沃瓦罗夫在北高加索领导一个叛

徒、反革命分子的地方组织，他与国外的白卫哥萨克集团有联系，而您，布哈林知道吗？

布哈林：我不否定这种事实的可能性，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

维辛斯基：被告李可夫，布哈林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李可夫：据皮沃瓦罗夫说，这个联盟是由斯列普柯夫发起组织的，而他是布哈林派到北高加索去的，我认为，布哈林给过他某些指示和指令。

维辛斯基：因此，这种联系是按布哈林路线进行的？

李可夫：思想是按布哈林路线的。

维辛斯基：思想和它的实际贯彻。

李可夫：斯列普柯夫做这件事。

布哈林：我不否认斯列普柯夫是我派的。我派他去，是要他同白卫哥萨克集团联系。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们在北高加索的同谋集团同国外白俄侨民哥萨克集团保持联系，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交代了这件事，斯列普柯夫交代了这件事。

布哈林：如果李可夫交代了这件事，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维辛斯基：您是作为阴谋家和领导者知道这一事实的吗？

布哈林：从数学概率的观点来看，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事实。

维辛斯基：请允许我再问一下李可夫：布哈林知道这件事吗？

李可夫：根据数学概率我个人认为，他本应知道这件事。

维辛斯基：清楚了！被告布哈林，您知道卡拉汉是右派和托派阴谋集团的参加者吗？

布哈林：知道。

维辛斯基：您知道卡拉汉是德国间谍吗？

布哈林：不，我不知道这个。

维辛斯基（对李可夫）：被告李可夫，您知道卡拉汉同某些德国人进行过几次谈判吗？

李可夫：对，对。

维辛斯基：是叛变性谈话吗？

李可夫：是叛变性的。

维辛斯基：卡拉汉代表你们的联盟打算给德国人割让苏联某一部分领土吗？

李可夫：我同卡拉汉本人没有见过面，我从托姆斯基谈话中知道这件事。他是当着我和布哈林的面说的。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布哈林也知道？请允许我问一下布哈林。您知道吗？

布哈林：我知道。

李可夫：谈话内容是：德国法西斯分子接受这些条件，即在租让和贸易条约等方面给予优待，但是，他们那一方要求让各民族共和国享有自由分离的权利。

维辛斯基：这是什么意思？

李可夫：这就是说，不是我们所建议的。这是德国人的新要求。当然，用实话来说，这就是瓜分苏联。

维辛斯基：这就是把苏联的某些部分献给德国人？

李可夫：当然。

维辛斯基：您是指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法西斯？

李可夫：实际上，所说的只能是白俄罗斯。

维辛斯基：那么，关于乌克兰呢？

李可夫：没有乌克兰各反革命组织的同意，我们不能决定这个问题。

维辛斯基：那我要问被告布哈林，您在1934年同拉狄克谈判过这件事吗？

布哈林：拉狄克对我谈过他同托洛茨基谈判的事，说托洛茨基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了为给予反革命组织的支持而割让领土的谈判。

维辛斯基：拉狄克对您说过吗，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应当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

布哈林：关于乌克兰，我肯定记得，说的是其他几个地区的事，但是哪些地区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维辛斯基：总之，您曾供认：“托洛茨基在加强恐怖活动的同时，始终认为靠割让领土（把乌克兰给德国人，把远东给日本人）使苏联在对德和对日战争中失败，是联盟上台执政的主要机会。”是这样吗？

布哈林：是这样。

维辛斯基（对李可夫）：您在预审中和在这里的法庭上都供认卡拉汉同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过关于援助你们阴谋的谈判。这不是事实？

李可夫：我们采取了有利于右派总部进行实际活动的措施。这一点在白俄罗斯方面的工作中和领导中已经实现了。

维辛斯基：就是说，德国人担心的是白俄罗斯给谁？

李可夫：德国人担心什么，我说不上。

维辛斯基：他们担心的是你们把白俄罗斯给什么人？不给德国人？

李可夫：给波兰人。

维辛斯基：那给德国人什么呢？这样一来，德国人为谁奔忙呢？为波兰人吗？德国人为你们效劳，而你们的报答却是把白俄

罗斯给波兰人。他们处在可笑的位置。

李可夫：（沉默）

维辛斯基：我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卡拉汉同德国人进行了谈判。显然是经你们联盟同意的。布哈林知道这件事吗？

李可夫：托姆斯基对我和布哈林谈过这件事。

布哈林：我是事后知道的，因为卡拉汉……

维辛斯基：您同意卡拉汉代表联盟同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谈判？

布哈林：一般关于谈判……我同意，这就是说，我认为是适宜的……

维辛斯基：不是一般，而是卡拉汉所进行的谈判？您同意了这些谈判？

布哈林：我未否认，所以就是同意。

维辛斯基：但您说，关于这件事您是事后知道的。请允许我问被告李可夫。这些谈判是由卡拉汉自己倡议去进行的吗？

李可夫：他是按照托姆斯基的委托和倡议进行这些谈判的。但是，当把这些谈判报告我们时，我和布哈林都同意了。

维辛斯基：你们同意的不仅是谈判这个事实，而且还有倡议，即同意整个事件本身？

李可夫：我们两人不是小孩。如果不同意这些东西，就会同他们进行斗争，在这些事情上是不能玩弄中立的。

维辛斯基：那么，可以证实，卡拉汉是经布哈林同意去同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谈判的。被告李可夫，您可以肯定这一点吗？

李可夫：可以。

维辛斯基：那么，被告布哈林，您对卡拉汉同德国人进行的这些谈判承担责任吗？

布哈林：毫无问题。

维辛斯基：被告李可夫说，那个时期说的是要割让白俄罗斯。我理解得对吗？

布哈林：我想象此事完全不是这样。

李可夫：托姆斯基转告我们，德国人对卡拉汉说，德国法西斯分子除了要求经济让步以外，坚持要让各民族共和国享有分离权利。我们立即心领意会，把它解释为瓜分苏联。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要献出白俄罗斯？

李可夫：我们当即在总体上接受了这一点。

维辛斯基：“我们”是谁？

李可夫：我、布哈林和托姆斯基。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对吗？

布哈林：不全对。同白俄罗斯无关，而与乌克兰有关。

维辛斯基：啊哈！现在竟同乌克兰有关。要知道到现在为止说的是白俄罗斯。请允许我向被告李可夫出示他的口供，案卷第一册第一一九页给他看：“但是，应当说，关于对波兰的方针问题，即我们一旦上台执政要事先取得波兰的支持这种观点，它在很早，即在1930—1931年就产生了。”您确认这一点吗？

李可夫：可以。

维辛斯基：我继续宣读：“我们那时一致同意的总条款，就是我们在同波兰人（那时已通过切尔维雅科夫同他们建立了联系）的谈判中，我们同意从苏联割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吗？您同谁讨论了这个问题？

李可夫：我同戈洛杰德与切尔维雅科夫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

维辛斯基：他们都知道？布哈林也知道吗？

李可夫：是的。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这一切您都知道吗？

布哈林：在1930年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希特勒那时还未掌握政权。

维辛斯基：在1930—1931年您同李可夫与托姆斯基议论过吗？

布哈林：我不记得这一点。

维辛斯基：不记得？被告李可夫，您能说些什么？

李可夫：第一次通知此事的是托姆斯基，他引用了切尔维雅科夫的话，此人当时在托姆斯基别墅里。于是，我们三个人根据托姆斯基的通知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接受了同白俄罗斯反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的建议。无论如何，布哈林是在场的。

维辛斯基：既然布哈林在场，这就是说，布哈林知道这件事。

请允许我问一下白俄罗斯阴谋分子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沙兰戈维奇。被告沙兰戈维奇，您对这件事能说些什么？

沙兰戈维奇：戈洛杰德和切尔维雅科夫已经把这项方针作为现成事实报告了我们的组织。同时，我应当说，在谈这项方针时，托姆斯基从未被提及。问题只涉及李可夫和布哈林。并且切尔维雅科夫还同布哈林谈过几次话。他在谈话以后不但告诉过我，而且在总部的会议上引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话通知了我们的组织。

维辛斯基：李可夫回答的下一段话，案卷第一二〇页：“切尔维雅科夫在白俄罗斯开展了极其积极的活动。他与同他进行秘密活动有联系的人，在其同波兰人的相互关系中，从我们这项指示中得出了全部实际结论”。李可夫，您能确认这一点吗？

李可夫：当然。

维辛斯基：因此，切尔维雅科夫和一切同你们联系的人，都同

波兰人保持经常联系？

李可夫：对。

维辛斯基：这是什么联系？

李可夫：那里也有间谍联系。

维辛斯基：在你们组织的一部分人中，按照您的指令同波兰人保持间谍联系？

李可夫：当然。

维辛斯基：其中也有布哈林的指令吗？

李可夫：当然。

维辛斯基：您与布哈林是有联系的？

李可夫：毫无问题。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你们是间谍？

李可夫：（沉默）

维辛斯基：而且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

李可夫：我一点也不比间谍好。

维辛斯基：你们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是间谍。

李可夫：可以说，——是。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您承认自己犯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吗？

布哈林：我不承认。

维辛斯基：可是，李可夫交代了什么？沙兰戈维奇交代了什么？您对间谍活动感兴趣吗？

布哈林：关于这类活动，我未得到任何消息。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您不必装出一副苦相，应当承认事实。而事实就是：您有一个由您的白俄罗斯的同伙，即阴谋分子结成的由戈洛杰德、切尔维雅科夫和沙兰戈维奇领导的集团。对吗，沙兰

戈维奇？

沙兰戈维奇：对的。

维辛斯基：你们按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令，在他们的领导下同波兰的侦探机关和波兰参谋总部联系？对吗，沙兰戈维奇？

沙兰戈维奇：完全对。

维辛斯基：那么，谁是你们这些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呢？

沙兰戈维奇：李可夫，布哈林。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他们是间谍，正如……

沙兰戈维奇：正如我本人一样。

维辛斯基（对李可夫）：被告李可夫，戈洛杰德在1932年告诉你没有，所有在白俄罗斯领导岗位上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职务的任命都得事先征得波兰侦探机关的同意？

李可夫：是的。

维辛斯基：布哈林知道这一点吗？

李可夫：这一点我没法说。

维辛斯基：您不知道？不想出卖好朋友？您是否认为这位戈洛杰德对布哈林谈过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事，还是认为他们应当对布哈林保密？

李可夫：我想他同布哈林谈过，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谈了什么，我不知道。

维辛斯基：关于波兰间谍乌里扬诺夫的叛变活动，您知道吗？

李可夫：我知道。

维辛斯基：布哈林知道这件事吗？

李可夫：我不知道。

维辛斯基：关于波兰间谍贝尼克的叛卖活动知道吗？

李可夫：我知道。

维辛斯基：布哈林知道吗？

李可夫：我不知道。

维辛斯基：那么审判长同志，请允许我宣读案卷第一二七页，那里记录了向李可夫提的几个问题和他的回答：“问：关于你们在白俄罗斯的组织的消息和对它们活动的领导，您几乎总是仅限于谈自己。但是总部其他成员起什么作用呢？答：凡是我在这里供认的……”。而您在这里供认了贝尼克、乌里扬诺夫，供认了波兰人关于破坏国防能力的指令，供认了经波兰侦探机关同意对负责人员的任命，——这都是您供认的……“凡是我在这里供认的，总部其他成员自然也知道。托姆斯基和布哈林都知道”……您能确认这一点吗？

李可夫：这是指关于我们大家对待白俄罗斯的态度。

维辛斯基：不对，你在这里别想脱身，我继续念……“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知道，施密特也了解这些事情的一部分”，——您是指瓦西里·施密特，——“我谈自己的作用较多，这里因为根据总部的决定，同白俄罗斯右派反苏组织的主要联系都集中在我手中”。清楚吗？

李可夫：我很清楚。

维辛斯基：我请求法庭证实。我所引证的话，同李可夫签供的记录原件完全一致，我请求将这个记录给李可夫看，以便他能辩证自己的签字。

李可夫：我不否认。

审判长乌尔利赫：我证实，这些引用的话同李可夫在每页上签字的记录原件完全一致。

维辛斯基（对李可夫）：在您看来，布哈林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些间谍的联系？

李可夫：他本应知道，但在细节上知道得要比我少。

维辛斯基：我不是问你们的细节，而是问事实本身。布哈林知道这件事吗？

李可夫：关于联系的事，报告过布哈林，他知道这一点。

维辛斯基：我想要查明的就是这一点。请允许我认为已经查明，李可夫和布哈林知道这种叛变性联系的实质，而在这种联系中包括有间谍活动。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审判长乌尔利赫：被告布哈林，继续说下去。

布哈林：富农阶级在 1933—1934 年已被粉碎。暴动运动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因此，在右派组织总部中重新出现了以反革命阴谋政变的方针作为中心思想的时期。

阴谋的实力就是叶努基泽加上亚哥达的实力，而叶努基泽那时——据我记忆所及——收买了克里姆林宫前警卫队长彼得松。顺便说一下，他当年曾做过托洛茨基列车的警卫队长。然后还有土哈切夫斯基、科尔克和其他人等阴谋分子的军事组织。

维辛斯基：这是在哪一年？

布哈林：我认为这是在 1933—1934 年。

维辛斯基：同时，您同霍扎也夫进行过具有失败主义叛徒性质的谈判？

布哈林：我同霍扎也夫在 1936 年有过唯一的一次谈话。

维辛斯基：您同霍扎也夫谈到，已经同法西斯德国达成了协议。

布哈林：不，没有谈过。

维辛斯基（对法官）：请允许我问一下被告霍扎也夫。

被告霍扎也夫，布哈林同您谈过话吗？

霍扎也夫：谈过。

维辛斯基:怎么谈的,何时,何地,具体谈了什么?

霍扎也夫:在8月,当布哈林来塔什干的时候。我和布哈林之间的谈话是在奇姆甘我的别墅里进行的。布哈林在概述了苏联国内形势以后说,应当这样来指导我们的活动,以便使这种活动有助于导致苏联的失败。据他说,国内外形势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他说,我们右派现在同法西斯德国达成了协议,还打算同日本签订协定。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去过霍扎也夫别墅吗?

布哈林:去过。

维辛斯基:谈过话吗?

布哈林:不是这种谈话,而是另一种谈话,也是秘密的……

维辛斯基:我问的不是一般的谈话,而是这一个谈话?

布哈林: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这一个”被认为是最难的……

维辛斯基:我请求法庭向犯人布哈林说明,他在这里不是哲学家,而是罪犯,不谈黑格尔哲学对他是有利的,首先对黑格尔哲学来说这将会好一些。

布哈林:在别墅谈过话。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您证实霍扎也夫的口供?

布哈林:我说过,我们不得不同各种各样的外国打交道,决不能只同一个集团打交道,还需要同其他许多集团打交道。

维辛斯基:谈到过英国吗?

布哈林:谈过。

维辛斯基:谈过日本吗?

布哈林:谈过。

维辛斯基:谈过德国吗?

布哈林：谈过。

维辛斯基：谈过需要什么来支持你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吗？

布哈林：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要知道我是第一次同霍扎也夫谈话。

维辛斯基：您同霍扎也夫谈了你们阴谋集团准备推翻苏维埃政权吗？

布哈林：用隐晦的方式谈过。

维辛斯基：然而，是用使他能理解您的方式？

布哈林：完全对。

维辛斯基（对霍扎也夫）：你理解了吗？

霍扎也夫：绝对理解了。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霍扎也夫说得对，你对霍扎也夫谈了关于同英国间谍联系的事？

布哈林：没有这回事。

维辛斯基（对霍扎也夫）：有这回事吗？霍扎也夫？

霍扎也夫：有。

我们同他约好，最好是或者通过塔吉克人进行活动，或者是派人到阿富汗去。

维辛斯基：由于这里的供词与您的相反，我再问一次：您究竟受雇于什么侦探机关？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您愿意在苏维埃法庭面前承认吗？

布哈林：任何一国都不是。

维辛斯基：我对布哈林暂时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乌尔利赫：被告布哈林，继续你的供词，不过要说具体一些。

布哈林： 大约在临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时期，根据托姆斯基的倡议，产生了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开会时刻动用反革命武装力量发动国家政变的思想。按照托姆斯基的想法，这次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逮捕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皮达可夫反对这种主张，不是出于原则考虑，而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会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懑。这种主张遭到否决。

应当说，还在更早的时期，我曾亲自委托谢苗诺夫组织恐怖活动集团，并在我们右派总部报告了这件事。这件事通过了。因此，我比总部任何其他成员应对组织谢苗诺夫恐怖活动团体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还曾委托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在第三天审讯中已谈到他——同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地下委员进行联系。

第二、我曾企图通过一个 C. B. 奇列诺夫同社会革命党在国外的各种团体和小组建立联系。社会革命党人答复说，原则上同意支持联盟，并同右派、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等等保持接触。但是，他们要求有正式的保证，大概是书面的保证。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按照富农的方针改变农民政策，其次是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合法化。不言而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在阴谋成功时成立的政府将是联合政府。

此外，我在 1936 年最后一次出国期间，在同李可夫商谈以后，我曾亲自直接同孟什维克尼古拉也夫斯基建立联系，此人与孟什维克党的领导层非常接近。我从尼古拉也夫斯基的谈话中发现，他知道右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协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包括柳亭纲领，他全都知道。在我们之间所谈的具体新东西，就是在右派总部，或联络总部，或整个阴谋的一般上层组织完全失败时，将通过尼古拉也夫斯基同第

二国际领导人达成协议，由他们在报刊上掀起相应的运动。

除了我个人以外，右派和托派组织的某些其他重要领导人同样建立了联系，他们同早已形成的各种反革命组织保持了罪恶的接触。

李可夫通过尼古拉也夫斯基同孟什维克有联系；亚·彼·斯米尔诺夫进行过许多次非常重要的联系。这是他早在农业人民委员部时就已建立起来的联系。大家知道，该部有社会革命党的或者靠近社会革命党的运动的许多重要活动家。

由此可见，毫无疑问——我也完全承认——除了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结成联盟以外，还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建立了完全直接的实际联系，其直接罪魁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就是作为右派领导核心的我本人。这首先指的是留在这里的地下的社会革命党人，即正式的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其次是主要聚集在马尔克·维什尼亚克（前立宪会议秘书）这种人物周围的国外组织。

维辛斯基：我要问一下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伯斯索诺夫在这里招认了关于他去布拉格同谢尔盖·马斯洛夫会面的事。伯斯索诺夫与马斯洛夫在那里交谈时引用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话。被告伯斯索诺夫，马斯洛夫对您说过他知道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吗？

伯斯索诺夫：他说，他知道右派反对派的反革命观点和他们的地下活动。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您同马斯洛夫有过直接联系吗？

布哈林：没有。

维辛斯基：被告伯斯索诺夫，您也知道马斯洛夫在布拉格是什么人吗？知道他是反革命富农党的组织者吗？知道他靠外国特

务机关的经费,并靠自己的报纸和杂志维持生活吗?是这样吗,被告伯斯索诺夫?

伯斯索诺夫: 完全对。

维辛斯基: 他通过谁得到情报。

布哈林: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推测,这是通过社会革命党国外中央委员会的现有委员来进行的。

维辛斯基: 您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有联系吗?

布哈林: 通过奇列诺夫同拉波波尔特联系。

维辛斯基: 社会革命党人?

布哈林: 这个拉波波尔特同马尔克·维什尼亚克有联系。

维辛斯基: 这就是说,您推测谢尔盖·马斯洛夫是通过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国外中央委员会委员,得到了关于你们的地下活动的情报的,或者……

布哈林: 或者通过拉波波尔特或维什尼亚克。

维辛斯基(对李可夫): 您向尼古拉也夫斯基报告了自己的地下工作吗?

李可夫: 是的。

维辛斯基: 被告布哈林,继续说。

布哈林: 随着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掌握政权,在各个反革命组织上层分子当中开始就因军事形势而利用外国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1934年夏天,拉狄克对我说: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示,托洛茨基同德国人进行了谈判,托洛茨基已向德国人保证割让许多领土,其中有乌克兰。如果我没有记错,那里还提到了割让领土给日本。

应当说,我当时还反对过拉狄克。我觉得,在群众的爱国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发展的情况下,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从阴谋计

划本身来看，在政治上和策略上是不适当的，在这里应当非常小心地行事。

维辛斯基：这是谁说的。

布哈林：我说的。我甚至认为，连预备谈判都根本不需要。

维辛斯基：为了不失败？

布哈林：我说的不是被捕意义上的失败，而是整个事业的失败。

维辛斯基：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在哪一年？

布哈林：同拉狄克谈话是在1934年夏天。

维辛斯基：同卡拉汉谈话要晚一些吗？

布哈林：是在他来莫斯科以后，在1935年。

维辛斯基：同叶努基泽的谈话是在同卡拉汉这次谈话以前，还是说同叶努基泽谈这个题目要晚一些？

布哈林：第一次谈话是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认为可以利用战争和利用同德国人达成的预备协定。

维辛斯基：你们谈论向德国人开放战线是在什么时候？

布哈林：是当我问托姆斯基如何设想政变手段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是军事组织的事，应由它开放战线。

维辛斯基：请允许我交验布哈林口供——第五册，案卷页码九五至九六：“托姆斯基对我说，讨论了两个方案：一种情况是当新政府在和平时期组成的时候”……而这就是说，阴谋分子在和平时期组织新政府，“另一种情况是在战时组织新政府，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德国人要求巨大的经济让步”……关于这些让步，我已经谈过。——“并坚持要求割让领土”。您说，这对不对？

布哈林：是的，一切都对。

维辛斯基（继续念）：“我问托姆斯基，在这方面关于政变手段

是怎样设想的。他说，这是军事组织的事，应由它向德国人开放战线”。

布哈林： 是的，对。

维辛斯基： 而当他告诉您这件事时，您反对了吗？

布哈林： 我反对了。

维辛斯基： 那为什么不把“我反对了”写下来？

布哈林： 就在这下面写了。

维辛斯基： 但这下面写的全是别的话，下面这样写：“对这件事，我对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哪一种情况下？

布哈林： 在开放战线的情况下。

维辛斯基： 对……“在这种情况下，把在战线上失败的祸首交付法庭审判是适当的。这使我们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口号，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布哈林： 是的。

维辛斯基： 什么叫做利用爱国主义口号？

布哈林： 这不是使人反感的意义上的“利用”……

维辛斯基： 利用爱国主义口号，就是摆脱难局，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某人叛变了，而我们是爱国主义者……你们在这里所用的伪善的背信弃义的手法，将进一步被证实。请允许我继续念：“我是说用这种办法，即谴责失败的祸首，可以顺便摆脱我所担心的波拿巴主义的危险。”

布哈林： 是的，完全对。

维辛斯基： 这就是您所谓的“反对”开放战线：审判战线上失败的祸首，玩弄爱国主义口号，推脱得一干二净。同叶努基泽谈过这种问题吗？

布哈林： 同叶努基泽谈过。

维辛斯基：同卡拉汉谈过吗？

布哈林：谈过。

维辛斯基：叶努基泽和卡拉汉关于此事说了些什么？

布哈林：他们说明，第一、卡拉汉在实行经济让步的条件下同德国人签订了条约；第二、德国人坚持关于割让领土的要求，卡拉汉对此未作答复，他声明说，这件事应当加以讨论。其中还有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分离的条款。第三、关于苏联同捷克和法国签订的互助条约。德国人要求撕毁这些条约，而卡拉汉对这种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打算欺骗德国人，不满足这个要求。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你们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建立在欺骗上？他们打算欺骗你们吗？

布哈林：这是经常有的事。

维辛斯基：利用你们，然后扔到垃圾堆里去。

布哈林：对。

维辛斯基：总之，不论是你们，还是他们都输了。您同卡拉汉谈过开放战线吗？

布哈林：卡拉汉说，德国人要求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

维辛斯基：您不想承认，您是主张在德国人发动进攻时开放战线的发起人。

布哈林：不是。

维辛斯基：而李可夫确认，布哈林是这个思想的发起人。被告李可夫，这一点对吗？

李可夫：关于开放战线，我是第一次从布哈林信中听来的。

布哈林：这是真的。但这决不等于我是发起人。这是在同托姆斯基谈话以后的事。

维辛斯基：我认为开放战线的问题已经很清楚。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译自《真理报》1938年3月8日。

（夏道源译）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1938年3月12日)

审判长公民和法官公民们，我完全同意检察长公民所说的关于这次审判的重要意义；这次审判揭露了我们的卑鄙罪行、“右派和托派联盟”所犯的罪行；我是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我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

这次审判是一系列审判中的最后一次，它揭露了一切罪行和叛国活动，它揭示了我们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斗争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和根源。

我被监禁已经一年多了，因此，我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根据我偶然了解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实际生活的片断，我看到、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被我们如此罪恶地背叛了的利益，正在进入一个宏伟发展的新阶段，现在正在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阶段的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被告们，坐在栏杆的另一边，这道栏杆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隔开来。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反革命的被告的行列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在审判刚刚开始的时候，审判长公民就曾问我是否服罪，我回答说认罪。

审判长公民曾问我是否确认我的供词，我回答说，我完完全全确认。

在初步的调查已经结束时，我被召到国家检察长那里去进行讯问，他掌握了全部调查材料，他把材料概括如下（第5卷第114页，1937年12月1日）：

问题：你是不是右派反革命组织总部的一个成员？我回答说：是，我承认。

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承认，你作为其成员的反苏组织的总部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该总部的目的是要用暴力推翻党和政府的领导？我回答说：是，我承认。

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承认，该总部进行过恐怖活动，组织过富农暴动并且准备过白卫富农的暴动以便反对政治局的成员、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我回答说：这是真的。

第四个问题：你是否承认，你犯了进行叛国活动的罪，即曾准备搞一个以政变为目的的阴谋？我回答说：是，这也是真的。

在法庭上我承认了、而且现在仍然承认我所犯的罪，以及国家检察长公民在法庭调查结束之后根据他所掌握的调查材料控告我们所犯的罪。我在法庭上还声明过，现在我强调说一下而且重复说一下：我承认，我对于“右派和托派联盟”所犯的全部罪行在政治上负有责任。

我已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而且我赞同检察长公民的意见，他曾重复了几次说，我站在我的死亡时刻的门槛上。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利对（1）在印好的起诉书中，（2）在法庭的调查中，以及（3）在苏联检察长公民所作的起诉演说中提出的某些控告加以驳斥。

我认为必须说一下，在国家检察长公民对我进行讯问时，他曾十分郑重地声明说：作为被告之一的我，不应当承认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的东西，不应当发明没有发生过的事实；而且他曾要求把他的

这一谈话载入记录。

我再次重复说，我承认我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弥天大罪，犯了组织富农暴动、准备搞恐怖行动以及参加一个地下的反苏组织的罪。我还承认，我犯了组织一个阴谋进行“宫廷政变”的罪。顺便说一下，这就证明国家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演说中所说的许多话——他硬说我摆出一副纯粹的理论家的姿态、哲学家的姿态等等——是不正确的。这都是一些确确实实的事情。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而不是一个齿轮的轮牙。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而且我的确不知道，不过这并不能减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右派和托派联盟”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

(1) 我个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 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中重复对方的话；

(3) 如果说李可夫第一次从我那里听到这话，那么，我再说一下，那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时重复对方的话。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关于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过这件事。有一次我曾明确地对格林科讲过这个问题。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并不是很有利的方法。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检察长公民在起诉演说中解释说，一个匪帮的成员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抢劫，尽管如此，他们也应当互相负责。这话不错，但是要成为一个帮，则匪帮中的成员们应当互相认识，而且相互之间应保持多少比较密切的联系。可是我却是从起诉书第一次知道沙兰戈维奇这个名字，而且是在这个法庭上第一次见到他。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存在着马克西莫夫其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特涅夫，我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同拉柯夫斯基谈过反革命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同罗森霍尔茨谈过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同捷连斯基谈过这个问题，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些人，检察长甚至没有向我提过一个问题。

“右派和托派联盟”首先是右派和托派的联盟。一般说来，那么它又怎么能把譬如象列文^①这样的人——他在这个法庭上说，迄今为止他还不知道孟什维克为何物——包括在内呢？它怎么能够把普列特涅夫、卡扎科夫等人包括在内呢？

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他们是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一个阴谋活动的同伴，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的集团。所有的被告同“右派和托派联盟”都有这种或那种联系，其中某些人与情报机关有联系，如此而已。但是，这并没有提供理由来证明这个集团是“右派和托派联盟”。

第二，的确存在过的、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消灭了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是历史地产生的。它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消灭以前，的确确实存在过。它是历史地产生的。我已供认，

^① 列文，列·格·(Левин, Л. Г. 1870—1938) 1896—1897年在柏林和巴黎当医生，1897年起在俄国行医，1920年4月起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内科主任。——译者注

早在1928年，在当时由我主持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就第一次同加米涅夫谈过。

那么，怎么能够硬说这个联盟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关的指示建立的呢？为什么？那是1928年的事啊！而且，当时我差一点死于波兰“保卫局”的特务之手，这件事是当时接近党的领导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第三，我坚决否认：说我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说它们是我的主子，说我是按照它们的旨意行事。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起诉书以前，对于其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沙兰戈维奇的口供的记录曾被提交给我看过，从那份记录来看，似乎我实际地拟定了进行破坏的计划。

沙兰戈维奇：不要再撒谎了，至少在你一生中就这一次。现在甚至在法庭上你还在撒谎。

审判长：被告沙兰戈维奇，别打断他。

沙兰戈维奇：我控制不住自己。

布哈林：说一说伊万诺夫。总起来，关于他的供词，我要说的话如下。过去与暗探局有联系的某些人供认说：由于害怕被揭露，他们就决定进行一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从而参加了右派这个以进行恐怖活动为宗旨的地下组织。但是，这哪有什么逻辑呢？真是绝妙的逻辑。由于害怕可能被揭露，他们就参加了一个恐怖组织，在那里他们要冒第二天就被逮捕的危险。这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我无法想象。但是，检察长公民却相信他们，尽管这一切都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霍扎也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联系；伊克拉莫

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肥肉。实际上，这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扎也夫说要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且我含含糊糊地支持过土耳其斯坦独立的想法。根本没有谈及任何坐探。国家检察长公民曾问我：你见过霍扎也夫吗？见过。是在塔什干吗？是在塔什干。你跟他谈过政治吗？谈过政治。这就是说你谈过坐探。这样的结论曾被作出过好几次；当我对这样的结论提出抗议时，检察长公民就责备我不讲真话，企图为自己开脱，想掩盖事实真相等等；而且他还得到我的一些同案人的支持。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个案子中，真正的逻辑完全在我一边。国家检察长公民以这样一些材料为根据，宣称一切间谍联系都是通过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渠道进行的。况且检察长公民还说过，在这里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检察长公民的演说提到了两家日本报纸。但怎么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报道恰恰同我和右派有关呢？

不过，我承认，对于肢解苏联的卑鄙计划我是有罪的，因为当时托洛茨基正在就割让领土问题进行谈判，而我又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联盟。这是事实，我承认这个事实。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的活动。亚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决定而被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但是，检察长公民所谓的逻辑在这里帮了真实内容的忙。他问道：难道布哈林和李可夫能对这些谋杀袖手旁观吗？接着他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谋杀。可是没有袖手旁观和知道是同一回事。这就是基础逻辑学中所谓的同义反复，这就是把还有待于证明的东西当做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接受下来。那么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这样的：好呀，你这个坏蛋，你怎样解释

这些事实呢？你能够否定在叶努基泽和亚哥达知悉的情况下某个分部作过某种决定吗？或者你连这一点也否定？法官公民们，我不能否定这一点。不过，如果说我不能否定它，那么同时我也不能肯定它，我只能作某种猜测。最后，你们必须记住这件事情的秘密性。总部没有举行过会议，有机会时就讨论一些问题，只要彼此之间有了秘密的联络方法，这样一些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马克西姆·彼什科夫。亚哥达自己说这次谋杀跟他个人有关。我没有权利闯进这个领域中去。这是亚哥达的供词，这个供词由于以下的基本事实而显得非常有力；他曾请求在审判员的密谈室里谈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可是克留奇柯夫说，那是为了降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精力充沛的生活能力。^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个辩护律师也采用了这个观点。但是，这是可以一眼看穿的。这个论据是同亚哥达本人的有力的供词相矛盾的，而他的供词被交法庭秘密讨论时被肯定了。

关于明仁斯基。布拉诺夫也已经在供认了个人的动机。当时明仁斯基已经病了，他根本不可能对“右派和托派联盟”造成任何损害。

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信以为真呢？

我想详细谈谈布拉诺夫的供词。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逝世是一件令人感到极其痛苦、极其可怕的事情。我提供了什么样的口供呢？我又是怎样提供和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呢？当时我被讯问说（显然，调查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我是否记得起任何事情能说明“右派和托派联盟”

^① 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儿子。克留奇柯夫供称，他们谋害彼什科夫，是为了使高尔基由于失去爱子而悲痛得身心交困，“变成一个无害的老人”。——译者注

中的人对高尔基抱敌视态度。我记起了与托姆斯基的一次谈话，即我在这个法庭上提到过的和检察长讯问过我的那次谈话。那次谈话的要点是托姆斯基曾粗略地谈到托派正在准备采取反对斯大林分子高尔基的敌对行动。当时我决不认为他可能诉诸恐怖行动。我对此置若罔闻。在讯问时我想起了同托姆斯基的这次谈话。对于检察长公民的反复追问，我坚定地回答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恐怖行动。在这个法庭上，我曾答复检察长公民的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明白了，他要诉诸这个。”检察长公民由此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他说：“这个是什么？如果不是一种羞羞答答的承认的话？”羞羞答答地承认什么呢？什么东西被承认了呢？——如下的事实：我在法庭上了解到了一些我过去不知道的新事实，因此，回顾起来，对于我问托姆斯基的谈话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加以考虑。我认为，国家检察长公民的推论在这个场合下不能认为是恰当的。

再说一说1918年的事。国家检察长公民声称，1924年我是被迫承认在斯莫尔尼的某一次谈话。当时我不是被迫的；我绝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那样做；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暗示过这件事；当时我公布这个事例的目的，是为了在当时，1923—1924年，证明派别斗争的莫大危害，证明它会导致什么结果。所以，我首先要澄清这个误解。

国家检察长公民说：布哈林提不出任何东西来反驳五个证人的证词；他们曾出庭站在我们大家面前，站在审理本案的诸位法官公民的面前；他们断言我曾有过而且坚决鼓吹过一个计划、一种思想、一个想法——逮捕列宁并且在肉体上消灭他，除列宁之外还有党内另两位杰出人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说我提不出任何论据来进行辩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检察长公民可以认为论据

不真实，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不能说我提不出任何东西来进行辩驳。我提出了大量的论据。

主要的证人是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说，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准备进行反对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阴谋活动，即逮捕他们以及被假定要加以杀害等等这一整个事件，——她在她的证词中，然后在对质时以及在审判中，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的时期发生的。我在对质时，在预审当中以及在法庭上都讲过，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曾打算用强迫手段实行政变，这是不真实的；其所以不真实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派和所谓的“左派”在中央委员会内占多数，在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进行表决的关键时刻，假使托洛茨基派不投降的话，托洛茨基派和“左派”就会在中央委员会内取得多数。既然如此，那么怎么能够设想，他们当时投降是为了诉诸阴谋手段呢？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在下届党代表大会上赢得党内的多数。既然如此，怎么会去谈论证人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现在所说的那些事呢？我还举了另一个例子。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断言，莫斯科区域局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中心，我曾斗胆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几个倍受尊敬的党员。我无非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揭穿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的论据。众所周知，一些优秀的人物，古比雪夫、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明仁斯基等，当时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者，都属于我的“左派”集团。这些人比曼采夫们、斯土柯夫们以及其他人要重要得

多；他们就其政治品格和政治活动来说比上述的那些人要强得多。总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在列宁格勒的核心集团包括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人。那么我要问，如果那些人在核心集团中占据关键的位置，怎么会有一个叛乱的计划呢？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不可能的。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反对我的主要证人，在这里把事情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后的莫斯科时期搅在一起了。

法官公民们，我请求诸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桩极其严重而又令人非常关切的事情，因为在审讯中对这个问题如此十分注意，所以我当时斗胆重复说过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可是国家检察长公民却断言我提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我在这个问题上无罪。

其他一些事情我不详细谈了，因为我不想占用诸位的时间。我承认，与卡烈林和卡姆柯夫谈过一次话；而关于逮捕列宁二十四小时以及随后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的建议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动提出的。但是在第一次谈话当中，以一种粗暴的形式给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至于后来通过皮达可夫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谈判，这一事实，正如检察长公民所说的那样——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可以被认为是要用强迫手段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我承认这一点；这是事实。对于在肉体上消灭的计划，我断然否认。国家检察长公民在这里所使用的逻辑，即强迫逮捕就意味着在肉体上消灭，至少是站不住脚的。立宪会议被逮捕了，但没有人在肉体上受到伤害。我们逮捕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受到伤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过捷尔仁斯基，但他在肉体上没有受到伤害。而且我要说明——这一点在国家检察长的讲话中被略去

了——，在这些罪恶的、卑怯的谈话中，曾特别规定，对有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不得损害。诸位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后的这个插曲，总的来说只占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不久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开始行动起来。我们不得不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加以逮捕。我亲自参加了这一行动，我亲自参加了指挥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此后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毫不相干了。我出国去进行革命工作去了，接着回国，接着，我重复说一下，我被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炸伤了。我并不否认那个炸弹不是向我个人扔的，正象证人曼采夫所说的那样，但我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知道，当时我到莫斯科委员会大楼去做报告，暗杀的企图正是在那个时刻进行的，我受了轻伤。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被炸死了。众所周知，这个企图是切列帕诺夫和他的妻子塔玛拉所领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所谓的地下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实行的。

我提到了曼采夫，因为切列帕诺夫是被“左派共产主义者”曼采夫逮捕的，由此可见他不是切列帕诺夫的同盟者。说贝拉·库恩曾鼓励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不真实的。

我要说明的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有过罪恶的阴谋活动，后者在他们举行发动之后立即垮台了，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参加了对他们的镇压。

为了支持自己的演说，国家检察长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来为我一生中的一个时期——一个黑暗的时期奠定基础。

这里有一些错误。首先，我不曾是一个召回派，尽管国家检察

长说我是。

国家检察长指控我曾与托洛茨基一起当过《新世界》杂志的编辑，而且我与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我否认这一点。

国家检察长指控我在1924年反对过斯大林同志。我不记得有任何这样的事。对于国家检察长在这次审判过程中对我提出的指控，我现在就要结束我的申辩了。我愿意回过头来再谈一下我的的确确犯过的罪行。这些罪行我已经列举过两次了。这些罪行是非常严重的。我想无需重复说这些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事情本身就够清楚的了。

我只想说一下：托派分部曾不止一次地单独行动，联盟中的一些个别成员如亚哥达等人很可能也曾单独行动，因为正如布拉诺夫所供认的那样，亚哥达认为李可夫和我是他的书记，而且他自己在这个法庭上曾把我称之为一个多嘴的人，此人组织了无知的群众的暴动，而这就是一个政变的问题。我既然同“右派和托派联盟”有关系，那么，完完全全理所当然，我在政治上应对每一件事情绝对负责。

罪行的极端严重性是一清二楚的，政治上的责任是巨大的，法律上的责任就是理应受到最严厉的判决。其所以应当实行最严厉的判决，是因为此人由于这样的罪行该枪毙十次。我完全绝对地和丝毫没有任何犹疑地承认这一点。

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关于我的罪恶活动的事实以及我对于自己的罪过的忏悔。

当我在审讯时提供我的主要口供时，我就说过，驱使我们这些反革命阴谋家去进行被这次审判彻底揭露了的这种卑鄙的地下活动的，并不是斗争的赤裸裸的逻辑。除了斗争的赤裸裸的逻辑之外，还有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历

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这种堕落的例子。只要提一下白里安、墨索里尼等人就够了。我们也堕落了，这就使我们掉进了一个营垒，这个营垒就其观点和特征来说，与富农的帮凶的法西斯主义极为相似。在阶级斗争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这个过程时时刻刻都在非常迅速地进行，而这种斗争、它的速度、它的存在，对于迅速进行的这个堕落过程就起了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发生这种堕落的过程，其条件与西欧一些国际劳工领导人的堕落过程的条件完全不同。我们的堕落过程是在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具有巨大的规模、任务、胜利、困难、英雄主义——中发生的……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坐在这个被告席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由于自己的心情具有一种特殊的两重性、由于对自己的反革命事业没有充分的信心而感到痛苦。我不是说我们搞反革命是不自觉的，而是说这种自觉性是不完全的。因此，这是一种意志的半麻痹状态，是一种反应迟钝。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些反应迟钝的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思想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的伟大。我们一方面迅速堕落，另一方面又反应迟钝，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说一个发展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一种双重的心理状况出现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里都认识到这一点，不过我不打算作深刻的心理分析了。

即使有时候我由于写了一些颂扬社会主义建设的東西而忘乎所以，可是第二天我就由于干了罪恶性的实际活动而把这些东西否定得一干二净。这里就产生了黑格尔哲学中所谓的最不愉快的心情。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同普通的不愉快的心情的区别，仅仅在

于它又是一种罪恶的心情。

无产阶级国家的威力表现在，它不仅肃清了种种反革命匪帮，而且消灭了内部的敌人，瓦解了自己的敌人的意志。这种情况是任何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而且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不可能有的。

我认为，西欧和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开始对苏联进行的几次审判心存疑虑，这首先是由于这些人不了解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在我们国家里，敌对分子，敌人，同时具有一颗分裂的，双重的心。我想这是应该被理解的第一件事情。

我之所以斗胆来详细讲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与国外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科学家当中有过相当多的接触，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苏联的每一个少先队员都懂得的这个道理。

有人总以为我们之所以忏悔，是由于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和极为离奇古怪的东西，如西藏药粉之类。我必须讲一下我在狱中的情况。我被关押了一年多，我在狱中工作、学习，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就可以用事实驳斥一切无稽之谈和一些荒谬的反革命神话。

有人想到使用了催眠术。可是我还在法庭上从法律的观点为自己进行辩护，当场随机应变，同国家检察长争论；任何人，哪怕是对这门医学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也一定会承认，这种催眠术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人往往把这种忏悔归结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心灵，归结为灵魂的特性（所谓的“斯拉夫灵魂”）。只有关于象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之类的典型人物，《白痴》中的主人公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其他人物，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准备站在大庭广众之中高呼：“打我吧，正统的基督教徒们，我是一个坏蛋！”

而我们这里的事情根本不是那样。“斯拉夫灵魂”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的心理,在我国已经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已经是过去完成时态了。现在,在我国,这种典型人物已不存在,或者,如果说他们还存在的话,也许仅仅存在于边远省份的小城镇中。反之,这种心理在西欧倒是可以找到。

现在我要讲一下我自己,讲一下我忏悔的原因。当然,必须承认,揭露我有罪的证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如果说你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呢?”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不经忏悔就死去,那么他就是白白地死去。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一件积极的事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当你问自己:“假使你不至于死去,那很好;假使由于某种奇迹你仍然活着,那么你又为什么而活着呢?你被同任何人隔绝开来,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处于非人的地位,被彻底同构成生活的本质的一切东西隔绝开来……”——那时候立即就出现了同样的回答。法官公民们,在这样的时刻,个人的任何东西,个人的一切身外之物,一切深仇积怨、毁誉荣辱以及许多其他的東西,全都灰飞烟灭了。此外,当广泛的国际斗争的回响传到你的耳鼓时,这一切全都发生作用,而结果就是苏联对于屈膝投降的反对派的内在的道德上的彻底胜利。我偶然从监狱图书馆里弄到了福伊希特万格爾的一本书。他在那本书中谈到了对托派的几次审判。那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必须说,福伊希特万格爾并没有深入到事情的本质;他走到半路上停止了,没有搞清楚所有的事情;而事实上所有

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世界的历史就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世界的法庭：一批托派领导人破产了，被扔进了地狱。这是事实。但是对待托洛茨基你不能采取福伊希特万格尔的那种做法——特别是他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相提并论。在这里他的论据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全国都支持斯大林；斯大林是世界的希望；斯大林是一位造物主。拿破仑曾经说，命运就是政治。托洛茨基的命运就是反革命的政治。

我马上就要讲完了。也许一生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讲话。

我说明我是怎样认识到必须向调查当局和向你们诸位法官公民们投降的。我们曾以极其罪恶的斗争方法反对新生活的欢乐。我否认曾企图谋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之罪名，但是我所领导的我的反革命同伙妄图谋杀列宁的事业——由斯大林所进行的正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事业。这一斗争的逻辑就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了最黑暗的深渊。这就再一次证明，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立场就意味着与政治上的反革命匪帮为伍。现在，反革命匪帮已被肃清，我们已被肃清，我们对自己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表示忏悔。

当然，问题不在于这种忏悔，或者，特别是我个人的忏悔。没有这种忏悔法庭也可以作出它的判决。被告是否认罪，这无关紧要。被告认罪，这是一条中世纪的法学原则。而且在我们这里，我们也已使反革命势力从内心里被摧毁了。只有象托洛茨基那样的人才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武器。

我觉得我有责任在此说明，在导致炮制出反革命策略的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中，托洛茨基是主要的原动力。而且那些最激烈的方法——恐怖主义、间谍活动、肢解苏联和进行破坏——首先都出自这个源泉。

我可以先验地推断：托洛茨基和我的其他同伙，以及第二国际——尤其是在我同尼古拉也夫斯基讨论过这个问题之后会企图保卫我们，特别是保卫我。我拒绝这种保卫，因为我正在向祖国、向党、向全体人民屈膝投降。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也许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个严肃的教训，也许苏联的强大的力量会为一切人所知。让人人都清楚地看到吧，所谓的苏联的民族局限性的反革命论点，结果就象一块肮脏的破布一样悬挂在空中。每一个人都看到斯大林保证了对国家的英明领导。

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等待着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个人感情，而是苏联的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

译自《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1938年莫斯科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英文版第767—779页。

（杨彦君译）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摘录)*

[南]普·弗兰尼茨基

尼古拉·伊·布哈林

(1888—1938)

俄国马克思主义直至二十年代末这一时期尚充满革命的气息，并且，尽管革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历史性变革的缔造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优越性的信念并无丝毫动摇。当时，在各个领域都是问题成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当时运动的优秀思想家们的自由努力和创见。列宁在革命中采取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及他对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的清醒认识，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而要对那些决定着革命成败的问题作出切近的回答，并不只取决于某人是否被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是才华横溢，常常还需要有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不只是推测假设，而是实际积极参与革命和历史行动的结果。如何估计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战后

* 这是南斯拉夫的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78年第4版第2卷第4章中关于布哈林的一节。《马克思主义史》一书196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内部发行。鉴于中译本发行量极少，1978年第4版又有所增订修改，现重新译校出来，供研究参考。——编者注

的欧洲形势；如何根据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估计它今后的发展；怎样扭转俄国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如何估计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情况；如何在居民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国度，确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路线；怎样针对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取消商品货币经济的同义语这一情况，从理论上正确表述这些关系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还有国家和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我们列举的这些问题只是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统统需要努力解决，需要探讨摸索；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结论。然而，当时所有的理论家，正如每一个了解科学工作的性质的人一样，认为这是极其正常的事。当时的气氛，占上风的还不是自以为绝对真理在手的斯大林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命不凡，还不是党的上层的观点神圣不可侵犯，还不是把同党的上层的立场不一致的一切，简单地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党的。

除了列宁以外，俄国的革命时代还产生了几个当时在理论方面也具有国际意义的人物。首先要说到的是尼古拉·伊·布哈林，他是除了列宁以外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他从未掌握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但由于自己的理论活动，也很快就成了“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语）。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他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参加的是它的布尔什维克派。他被监禁过，1913年侨居国外时写了一本对柏姆-巴维克的经济观点以及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本海默的观点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极好的著作^①。

^① 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1913年德文版。

在战争期间，他写了论述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论述帝国主义国家的著作也问世了。^①

1917年他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国际中工作。在这个时期内，他还写了一些使他在国际范围内也成为极其著名的人物的著作：《共产主义者纲领》（1918年）、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1918年）、《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年）。

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的哲学和历史观点，他把这本书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读本。布哈林是第一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部分的人之一（虽然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过这种观点）。“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著名。”^②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社会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同时也看作是各种专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科学，即社会学。第二，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学的方法这一情况无论如何并不取消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一门比较抽象的科学常常会向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即方法）”^③。

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布哈林那里，正如在他的整个理论观念中一样，在他对无阶级社会的性质和职能的设想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8年德文版和《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全书到1925年才出版，其中他不同意列宁的某些观点）。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比较详细地介绍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到彼得·克尼尔施的《尼古拉·伊·布哈林的经济观点》1959年柏林德文版和斯蒂芬·科恩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73年纽约英文版。

②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7页。

③ 同上，第8页。

中,强烈的机械论因素和空想主义因素占优势。一方面,布哈林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存在着“现象的客观因果规律性”,^①这种规律性在“没有组织的社会”中和在“有组织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表现不同。在前一种社会中,在布哈林看来,社会现象是从各个人的意志、感觉和行动的交错中产生的,而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这个过程“不是自发地,而是在决定性领域有组织地进行的”^②。在前一种社会中,社会现象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通常是与他们相矛盾并主宰着他们的,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社会现象反映着人们的意志,并且一般是不与这一意志对立的;人们是自己的决定的主人,并且感觉不到社会中的自发势力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被合理的社会组织所取代”^③。

他的这些观点也表现在他的纲领性著作中,在这些观点中,机械论和空想主义的因素明显地胜过了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所作的比较深刻辩证的分析,历史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中都这样有规律性,以致可以根据理性完全掌握它,也不是这样无矛盾,以致在任何历史阶段不仅可以排除小的冲突,而且可以排除比较尖锐的冲突。如果我们辩证地理解事物,那么,即使这些冲突将来会用别的手段和方式加以解决,这并不证明它们就不存在。^④

固然,布哈林接受了辩证法的某些基本的方法论的提法:各种现象具有相互联系性;在现象的对立中,在内部变化的过程中,在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22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同上,第36—37页。

④ 布哈林的这种机械论在他关于偶然性的观点中表现得最突出,他关于偶然性的观点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相同的。因此他才会作出结论说:“所以我们认为,严格说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存在任何偶然现象”(同上,第41页)。

产生与消失、量变与质变中研究现象。但是，在辩证矛盾的基本问题上，他提出了他那有名的平衡论，而这个理论实际上又是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产物。^①

在这些观点中，最明显地表现出列宁所评定的布哈林的特点：布哈林从来没有扎实地学过辩证法，因此他的观点里面必然浸透着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布哈林的确力图把辩证法引入平衡论。“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不动的平衡，而是动的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平衡一确定，便立即被破坏，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又重新被破坏，并这样继续下去。”^②

由此布哈林作出结论说，在平衡与不平衡的动荡中，在这种“斗争”与“矛盾”，即各种力量的对抗中，产生了运动的条件。而这些矛盾首先是环境（自然界）与体系（社会）之间以及体系本身内部的动的对抗。“我们至今只谈到环境和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只谈到外部的矛盾。但是在体系本身之内也有内部的矛盾。任何一个体系都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互相结合起来的各个部分（要素）组成……而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矛盾、不协调、不适应。这里没有绝对的平衡。”^③

布哈林如果把平衡理解为任何过程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必然的因素，把内部的矛盾理解为对任何一种发展来说是主要的、

① 虽然平衡论是一种陈旧的机械论的观点，但实际上布哈林却是从过去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波格丹诺夫那里接受这个观点的。波格丹诺夫在1910年以后，尤其是在《生动经验的哲学》（1920年）一书中和稍后在《组织形态学》（1922年）一书中特别发挥了这个观点。

②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74页。

③ 同上，第79页。

但不是唯一的矛盾，那他的观点里面就不会有任何不辩证的东西了。但他强调的首先是平衡和外部的对抗。他在叙述中作出结论说：“因为非常清楚，体系的内部结构（内部平衡）必定会随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发生变化。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体系的整个状况，它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衰落、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①最后，“内部的（结构的）平衡是依赖外部平衡的因素（是这种外部平衡的‘函数’）”^②。

他认为，社会是人的相互关系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不是人的一般总和，正如精神生活不是思想的一般总和一样，而是某种特殊的和新的东西，与此同时，他又把基本问题转向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方面，他区分了稳定的平衡（当生产力没有发展的时候）、正向的动的平衡和负向的动的平衡（当生产力衰退的时候）。

可见，他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中看到社会的整个动态。“因而事情归结到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的性质。由于生产力是平衡的确切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力来评定这一性质本身。”^③

布哈林从根本上把革命问题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们之间、阶级之间的冲突。他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划分为：第一，思想革命，即意识的革命化；第二阶段是打破国家机器的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第三阶段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经济革命；最后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技术革命。

正如在平衡论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占统治地位一样，在这种关于革命阶段的观点中，机械论的公式主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80—81页。

② 同上，第81页。

③ 同上，第131页。

义也很明显,因为那些阶段只有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而且只有在经济落后国家才有价值。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阶段完全分开,则是思想上的抽象。况且,从发达国家目前已有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有与此完全不同的革命阶段。

布哈林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作了分析和分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都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分析和分类。例如,他从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区分出:两个基本阶级、中间阶级、过渡阶级、混合阶级类型和丧失阶级性的集团。^①

布哈林作为帝国主义问题和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理论家和研究者,是特别突出的。布哈林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时在某些点上和列宁不同(他写这方面的书的时间与列宁写自己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的时间大致相同)。首先,他没有那么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而是有时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有时又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组成要素等等。^②

然而,从对于在帝国主义中国国民经济的垄断结构、金融资本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331—333页。我上面已经指出过,乔·卢卡奇和安·葛兰西曾对布哈林的许多观点作过相当尖锐的批判性评述,阿·德波林也驳斥过他。这些反驳意见,参看阿尔达·扎纳尔达的扎实的研究著作《根据德国共产党人和葛兰西的观点来看布哈林的〈教科书〉》,葛兰西研究》1958年罗马意大利文版。

② 例如,他在《共产主义ABC》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定义:“金融资本在争取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入地的斗争中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叫做帝国主义。”(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共产主义ABC》1921年汉堡德文版第99页)我要说明,所有从该书引用的段落都是布哈林写的。他在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也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这种资本主义以生产组织的一定的极大的成熟性为前提。”(《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149页)

的巨大势力和超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看法来看，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点上和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影响，他清楚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是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金融资本本身已可以“在某个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互进行斗争的个别企业家联合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①。布哈林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得到加强，资产阶级受到国家的计划和组织的约束，许多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转移到国家机构本身，这无非是加强大资本，因为大资本通过这些交易去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大大加强大资产阶级。正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苏维埃政权、工会、共产党等愈是紧密地合作，工人阶级就愈强大一样，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相互间联系得愈牢固，资产阶级也就愈强大。当国家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集中起来，并把它们变成一个统一的、唯一的组织时，它就有助于资本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资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里欢呼自己的胜利。”^②

布哈林认为，这种国家化的后果首先是资本主义竞争在一国范围内或多或少的减少、工资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缓和。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就解决了自己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基本问题，因为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强。“事实上，各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或多或少地停止下来，因为最大的企业家组织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然而，**国家资本主**

①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1921年汉堡德文版第90页。

② 同上，第109页。并见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131页。

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却愈演愈烈……现在作为竞争者而出现的是巨大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同难以置信的浪费和破坏相联系的，为任何其他竞争所不及，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军备竞赛，而最终发展成毁灭性的战争。

这样，金融资本消灭各国内部的竞争，却导致各国之间巨大的、残酷的相互竞争。”^①布哈林从这些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必然性。

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这一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所特有的发展来看，布哈林的分析 and 列宁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梯。自然，当时也还不可能谈国家的某种超脱，不可能谈这种发展的某些不一定要与个别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规律等等，因为这样的过程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事实上首先是为大金融资本争夺新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范围的斗争服务的。

但是，布哈林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上，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特别是他认为，在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下，交换价值本身也在被消灭，从而货币的性质本身也在发生变化^②。大危机极其明显地否定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

^①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91—92 页。又见《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 133 页。

^② 在论过渡时期的著作中，布哈林写道：“金融资本消灭了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过渡时期经济学》1922 年汉堡德文版第 5 页）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同时消灭无组织的商品制度，“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的改组，沿着通向建立无所不包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道路进行，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在国家范围内实行有组织的生产，使整个‘国民经济的’体制服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服从战争的目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37 页）

某些问题上接近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国家在这种资本主义下可以起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作用的改良主义观点，布哈林从来没有赞同过。在布哈林看来，从根本上说，帝国主义大国间的均势受到破坏，结果引起战争灾祸，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前提。^①

在过渡时期问题方面，布哈林几乎是除了列宁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外唯一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理论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以及上面指出过的他的一般理论思想，后来在反布哈林的宣传中曾受到尖锐的攻击，并且在许多方面被歪曲了。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资料不属于全社会，“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它的国家组织”^②。因而，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社会、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国家力量。然而，在资产阶级的反抗被打垮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不必经过任何革命而过渡到共产主义”^③。马克思和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组织的观点和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观念的尖锐论战中，布哈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民主。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就是这种新的民主的形式。“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劳动者，并从而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在这种民主中，以前的被压迫群众和他们的组织变成了统治的机关…… 实行苏维埃民主，工人的组织不仅不会从政权中被排挤

① 除了在上述著作中谈到这些问题以外，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特别说明了这个观点。

②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69 页。

③ 同上，第 70 页。

掉，而且反而会成为这个政权的机关。”^①

这样，广大阶层的人民第一次参加政权，苏维埃政权实现着劳动人民在各个领域内的最广泛的自治，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种管理。为了使这种组织和人民政权得到保障并充分发挥作用，主要的监督在农村中必须交给贫苦农民的组织，在工业中必须交给工人的组织及其机构。为了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监督上，尤其是不至于在国有化企业中停留在监督上，布哈林早在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纲领》一书中，就根据列宁的观点写道：“这里很清楚，靠监督是走不了多远的，不仅需要工人进行监督，而且需要工人对工业进行管理；需要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经济委员会以及工农政权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等）进行管理。这是不仅进行监督，而且进行管理的组织。”^②

为了使某个工厂的工人们不至于把工厂视为己有，为了使他们不至于开始相互竞争和在经济上损害对方，“在每个工厂和每个车间中都必须有工人管理委员会，但是，工人管理委员会应当这样来组织：大多数成员不是由本厂工人担任，而是由该行业的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区的人民经济委员会所派的工人担任”^③。

布哈林也是早在1919年与列宁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指出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加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危险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而尤其是农村的发达程度不够和文化水平不高；管理工作的经验不足；带有资产阶级旧作风的专家和习惯势力；最优秀的人员参了军和上了前线。“所有这些情况都令人可怕地加重我们的工作困难，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僚主

①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第162—163页。

② 布哈林《共产主义者纲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54—55页。

③ 同上，第55页。

又在苏维埃机构内部可能部分地产生。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无产阶级还没有彻底打碎旧的官僚国家，因为官僚国家又从下面复活起来。共产党必须预防这种危险。这可以通过吸引群众参加管理来做到。当然，最重要的是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启发他们的觉悟和普及基本教育。除此而外，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①布哈林以党的名义建议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苏维埃的每个成员必须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不断地调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不至于官僚化；最后，“党建议逐渐吸引全体劳动居民毫无例外地参加国家管理，以此为总方向。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政策的基础所在”^②。

鉴于过渡时期社会结构的改变，布哈林认为，首先“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在无产阶级的生产国有化的条件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范畴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已不再存在”^③。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正在变为创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的过程。

由于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苏维埃、工会、党等）是政权的基础，于是就产生一个它们同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即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的关系问题。布哈林用国家主义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同列宁的观点发生冲突。“工会国家化和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组织的实际国家化，是从过渡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中产生出来的。工人机构的最小的细胞必定变为总的组织过程的承担者，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有计划地引导和领导这一过程，而工人阶级则在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中，在自己的国家机关中找到自己的

①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第 183—184 页。

② 同上，第 184 页。

③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1922 年汉堡德文版第 79 页。

物质体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辩证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变为工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①

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和在资本统治下的生产过程的国家化。因此，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谈不上有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排斥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把社会主义专政加上引号又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专政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的否定。^②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集体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这里不是生产剩余价值，而是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③。

因此，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导致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则导致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④。

在过渡过程中，各个基本的经济范畴也发生变化。例如，商品正在失去商品的性质，而变成产品，因为自觉的社会调节者正在代替自发势力。又例如，“处于平衡之中的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价值范围极少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在消失，这里不存在平衡”^⑤。同样，工人的工资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表面上的数量，因为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地方，“雇佣劳动将会消失。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中，不存在任何雇佣劳动”^⑥。

①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86页。

② 同上，第129—131页。

③ 同上，第131页。我们看到，斯大林在1952年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的东西，在这里已有表述了。另一段话说得更为明显：“在资本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同上，第138页）

④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136页。

⑤ 同上，第166页。

⑥ 同上，第167页。

当人们指责他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很多和他的论断不一致的新东西时，他在1921年德文版的后记中回答说，这些批评家不懂得对问题的抽象研究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区别，抽象的研究在过程中、在事物的“理想的剖面”中说明事物，而经验的现实则比抽象的说明要复杂得无可比拟。

然而，应当立即指出，布哈林的努力，作为从理论上解释极其复杂和困难的过渡时期问题的最初尝试之一，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对一幅理想图画的情景的描绘，多于对现实过程的说明，而在现实过程中，旧制度的传统和结构必然与新的结构和规律性交织在一起，而且，正是揭露所有这些矛盾、对立的趋势、困难、消极现象等等，对于理解和掌握这个复杂的过程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

从各方面看，布哈林虽然有其种种迷误和理论缺陷，他仍然是一位光辉的和有修养的人物；是一位独立大胆地分析了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的和困难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列宁生前，布哈林就在民族问题上，在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布哈林代表激进的极左派，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列宁同样有根据地、尖锐地斥责过这一派人。^①

布哈林不止一次承认过自己的错误观点。但是，尽管如此，他

^① 例如，布哈林在《共产主义者纲领》中写道：“这里说的不是民族（即工人和资产阶级一起）的自决权，而是说的工人阶级的权利，就是说，所谓民族意志对我们来说决不是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谈民族自决权，而只谈每个民族的劳动阶级分离的权利。”（《共产主义者纲领》第97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正确地批判了这个观点，同样也不得不尖锐地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工会国家化的观点。布哈林在《共产主义ABC》一书中把自己关于工会的思想说得最清楚不过：“这样，工会和联合会同样必然会朝着变为国家力量的经济部门和机构的方向发展，即朝着它们‘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共产主义ABC》第281页）

仍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已经讲过的东西，而且也依据自己本身的分析。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进行不断的争论，不怕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过去和现在达到的积极成果。

在1926年和1927年期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的最积极的论敌之一，他维护斯大林的路线和他自己的关于照顾农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布哈林当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发财吧！）。

布哈林担心反对派的政策会造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和发生冲突的不良后果。如果说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谨慎行事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布哈林极其短视地支持斯大林在清算反对派时表现出来的当时已经十分明显的官僚主义行为和手法，就根本不可理解了。他在政治上盲目了，因而成了斯大林派别的主要支柱之一，并尖锐地批判反对派认为党可能由于内部民主日益减少而蜕化变质的论点，虽然党当时已经处于蜕化变质的边缘了。^①因此，他对于当时的事件也负有很大的历史责任，而这一事件很快也把他卷进一场灾难之中。

斯大林面对农民，特别是富农由于粮食收购引起的反抗，以他特有的蛮横粗暴和肆无忌惮态度作出反应，宣布强制实行集体化。

^① 布哈林在这一时期写了若干篇论战性文章维护他自己和斯大林的立场而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的观点。其中我们可以举出：《过渡时期的规律问题》（1926）、《经济生活的调节者问题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根本错误》（1926）、《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或为什么不应该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代替列宁》（1926）、《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26）、《评不断革命论》（1925）。这些文章，还有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文章均发表在布哈林《一国社会主义》一书1974年巴黎法文版中。

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起维护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而成了反对派，很快被谴责为“右倾”（1929年），逐渐被撤销领导职务，在对“托洛茨基派总部”的审讯中受到尖锐的谴责，193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监禁起来，并于1938年经制造出来的审讯后同阿·李可夫、格·亚哥达、尼·克列斯廷斯基、格·格林柯等人一起被枪决。斯大林就这样地把国内没有忘记十月革命某些主要教训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处决了。

译自普·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78年萨格勒布塞尔维亚文第4版第2卷第197—210页。

（胡文建译）

尼古拉也夫斯基谈布哈林*

访问者：您说过，《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主要是以您 1936 年同布哈林的谈话为根据。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您可否先给我们谈谈，当时您是怎样见到他的？

尼古拉也夫斯基：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不过很有意思就是了。我想尽可能简单地讲一下。我和布哈林的会见同某些德国档案有关，那些档案是 1933 年 5 月我离开柏林的时候从德国带出来的，同时带出的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我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托·威尔斯的请求而带走这批归他们所有的资料的。这批德国档案连同俄国档案一起，被装上船运到了巴黎，由我负责保管。

布尔什维克很想得到这批德国档案，以便充实他们在莫斯科

-
- * 本文原题为《尼古拉也夫斯基访问记》。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扎戈里亚和西韦林·比阿勒于 1964 年 1 月 30 日在纽约访问了尼古拉也夫斯基。本文是他们之间的谈话。整个谈话内容都是关于布哈林的，对于研究布哈林及其思想、著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波·伊·尼古拉也夫斯基生于 1887 年，是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学者，十月革命后曾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22 年他被驱逐出境后，先在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后任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长。1942 年移居美国。他出版过六卷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文献以及多种著作。本文是扎戈里亚编辑的尼古拉也夫斯基文选《权力和苏联的精华》的开卷篇。——编者注

的收藏库。这批档案除了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档案之外，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1935年，他们曾派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一个代表来问我是否同意进行谈判：把这批档案卖给俄国人。我说我只能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转达他们的要求。我这样做了，于是开始了谈判。

谈判的主要阶段是在向巴黎派去了一个代表团的时候进行的。这个代表团包括：布哈林（他当时是中央委员）、弗·维·阿多拉茨基（他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和一位著名的苏联作家阿罗谢夫（他当时是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布哈林是作为研究马克思的专家、而且显然是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而去的。

谈判从1936年2月开始，持续到4月末。布尔什维克出的价钱是一千万法郎，但是这个巨大的数目被拒绝了，因为德国人不愿意放弃关于马克思的资料。

正是为了这件事情，布哈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到达巴黎的当天曾去看过我。

访问者：那么谈话纯粹是公务性质的了？

尼古拉也夫斯基：不，我和布哈林的谈话还有非公务的一面。布哈林和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的年岁几乎和我相同，他和我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我于1904年1月第一次被捕；他于1908年第一次被捕。他和我都在同一个地方流放过，即阿尔汉格尔省的奥涅加。我们有一些彼此都认识的人，所以我们有机会回忆关于他们的往事。

此外，布哈林企图使我们的接触具有更多的私人性质。例如，他在第一天傍晚到我的住处去的时候，他说的头几个字就是：“弗拉基米尔（我的兄弟）向您问候”。后来，当布哈林和我有机会单独

谈话时，他说：“阿列克塞(李可夫)向您问候”。^① 我的兄弟娶了李可夫的妹妹，他们跟李可夫住在一起，布哈林常常去他们家作客。当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场时，布哈林只代表我的兄弟向我问候，我的兄弟原来是孟什维克，尽管在政治上并不积极。只有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才转达了李可夫的问候。这样他就为我们后来的谈话定下了调子。

访问者：您为什么认为布哈林很愿意赋予您同他的谈话以这种非公务的气氛呢？

尼古拉也夫斯基：我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他想把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告诉外部世界的某一个他认为信得过的人。例如，关于1922年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的审判，他问我：“您知道我在这次审判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吗？”我回答说，我知道他在幕后曾反对处决那些被告。对于那次审判，在要不要处决那些被告的问题上，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布哈林表示了他反对处决的意见，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承认，他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公开发表了一些非常激烈地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言论。

我有一种印象，布哈林小心翼翼地想要纠正对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报导，以便使他的真正观点能为苏联以外的人所知道。但是，很显然，他既想谈又怕谈得过多。

我记得，曾在国外住过多年的阿罗谢夫参加过我们的一次谈话。他打断了我们的话，他向我说了一句话，实际上把布哈林的话

^① 李可夫曾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参加了反对斯大林的右倾集团，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布哈林访问尼古拉也夫斯基时，李可夫仍然是中央委员，但是与斯大林的关系很坏。——孔戈里亚注

岔开了，他说：“好啦，我们快走了，您将来会要写点有趣的回忆吧。”当时我感觉到他心神不安。所以我回答说：“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由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来写关于我们的会见吧。”而事实上，这个最后的人是我。

访问者：在你们进行谈话的那个时期，布哈林看起来怎么样？他的心情如何？

尼古拉也夫斯基：布哈林明显地表现出想要休息一下，以便消除莫斯科生活的那种紧张情绪。他疲倦了。他想休息几个月，或者去海滨游泳，既不想问题，也不进行争论。我看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因为有一天他曾对我说：“波里斯·伊万诺维奇，我们干吗在讨价还价中花费掉全部时间呢？让我们到地中海的某个地方去吧。您可以给你们的人写信说我不同意。我可以写信说您不同意。我们去休息一两个月。”当然，这话是开玩笑地说的，但是其中有一种严肃的低沉的调子。正在那个时候，他的年青的妻子走过来了。她是一个即将生第一个孩子的大学生。布哈林把我向她作了介绍。她也很需要一个假期，所以当她的丈夫谈到要去作一次海上旅行时，她会心地微笑了。

同时，看起来布哈林不愿意永远离开俄国。他在同一位女共产党员法尼·叶捷尔斯卡娅的一次谈话当中，也谈了许多事情，她到巴黎去看望过布哈林，后来她告诉了我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她是罗·卢森堡原来的秘书，在共产国际中在布哈林手下工作过，与布哈林的关系非常好。她曾企图劝他留在国外。她说需要在国外办一个反对派报纸，这个报纸要真正了解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可能在那里发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布哈林是唯一能担当这一任务的人。可是，她告诉我，布哈林回答她说：“我不认为没有俄国我

能生活得下去。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于那里的事情，已经习惯于紧张的生活。”

他往往说出这样一些事情来。当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布哈林想起托洛茨基住得比较近，就在奥斯陆。他使了一个眼色说：“让我们带着这个箱子〔装着马克思的手稿〕去看望托洛茨基一天吧。”他又接着说：“我和他之间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怀有根大的敬意。”

他能够这样谈话，谈到国内的艰苦生活，谈到对托洛茨基的敬意。这就是他当时走得多远的情况。

访问者：他坦率地谈当时苏联的情况和党内斗争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因为我知道共产党禁止党员向非党人士谈党内关系的决议，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多次谈到了党内情况。布哈林显然很愿意谈这个问题。我了解他的心情。

另一个布尔什维克——虽然不如布哈林那样重要，但也很重要——刚刚来到外国的时候就曾对我说过：“一回到那里，我们就忘记了怎样做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只有来到国外，同一个象您这样的人——我们从秘密档案中知道他的情况，我们可以信赖他——谈话时，我们才可以坦率地谈。”在我看来，这也是布哈林的感受，不过他企图对自己加以克制罢了。

我和布哈林往往从回忆往事和谈论一些彼此都认识的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而转到一般政治问题。把话题从过去转到现在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的谈话是海阔天空的。他没有直接谈关于苏联的情况；他倒是常常提出自己的问题来把困难的问题挡回来。为什么如此，我至今还弄不明白。难道是他不愿意充分信赖

一个并非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吗？或者，难道是即使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也害怕作出某些结论吗？但是，从他的某些话、从他的沉默或者他提出的问题中，我多少可以了解到他对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态度，——即使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访问者：我知道，在对布哈林的审判中，你们的这些谈话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方面，对他提出的指控是什么呢？

尼古拉也夫斯基：布哈林在受审时对于我们的谈话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们的谈话的具体的和新的的一点就是，一旦右派总部或联络总部或整个阴谋的上层组织被揭露，就将通过尼古拉也夫斯基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达成一项谅解，即他们将在报刊上发动一个适当的运动……”

我忘记说了，我同尼古拉也夫斯基的会见对我来说是容易的，而且是伪装起来的，因为当时由于公务我必须会见这个尼古拉也夫斯基。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件完全合法的外衣，我可以在它的掩护下进行反革命的谈话，并且达成这种或那种协议。”^①

换句话说，布哈林被控告曾与我达成一个协议，一旦他被捕我就向社会党的第二国际发出警报，以便它可以出面来保卫他。

我必须附带说一下，对布哈林的起诉书中的这些论断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当然，布哈林和我之间没有达成过任何协议。我们甚至没有讨论过这样一个协议。不过，我回想起在1938年的审判的时候，我在布哈林的供词中发现，他想在西方的社会党的舆论面前表白自己，就是说表明他和他的朋友们现在主张同民主社会

^① 《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1938年莫斯科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英文版第426—427页。

主义和解。不过我相信，这种情绪是在我们在巴黎会见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访问者：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在我们开始谈《信》的实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以怎样的手法写那封《信》的？

尼古拉也夫斯基：我写《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时没有任何关于我和布哈林谈话的笔记。我曾作了一些笔记，但是在1936年8月契卡分子袭击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当时我担任所长）巴黎分所的所在地之后，我认为必须把它们销毁。在这次袭击时，大约有三十或四十个包裹被盗。这些包裹装有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一些材料，那是他的儿子刚刚交给分所保管的。毫无疑问，当时契卡分子正在为以后的审判搜集材料，他们认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判是最重要的审判之一，而且他们正在调查布哈林在国外与人会见的情况。因为托洛茨基档案被盗的情况说明内部有人暗通情报——现已查明，托洛茨基的儿子的机要秘书兹巴罗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密探——，我就决定销毁我关于布哈林的政治性谈话的全部笔记。不过我还记得这些谈话的内容，某些部分在《信》中公布出来了。

我要解释一下，那封《信》最初不是作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而是作为我和布哈林谈话的说明而写的。当时担任《社会主义通报》编辑的费·伊·唐恩要求我把已经写好的东西加以重写，因为他感到由一位布尔什维克自己来作一个简单说明可能更好。所以那个文件发表时没有注解，似乎它是一个逐字逐句的报导。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布哈林的说明只讲到1936年。我们的会见是在那一年春天进行的。关于那一年后来的一些事情，我所依

据的是来自其他方面的情报，首先是沙尔·拉波波特的情报，此人是一个加入了俄共的法国人，他因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而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很乐意把他所知道的许多情报告诉我。

现在重读那封《信》，我发现我略去了布哈林给我讲的许多事情，特别是那些涉及他个人的事情。我当时之所以那样做有许多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透露任何可以看出是谁向我提供情报的线索。但是，布哈林向我讲的一切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折光的色彩。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沉浸在政治中的人，而他在谈政治的时候又离不开他个人生活的细节。相反地，布哈林通过他的个人经验的三棱镜描绘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内部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我当时感觉到他在给我讲每一件事情，以便将来有人能正确地解释他的行为后面的动机。现在，在过了三十年之后，根据已经发生的一切，我确信我的猜想是正确的。有许多事情布哈林根本没有谈到，有许多事情他没有作充分的解释，但是他向我谈的事情，他都是在自己的心中怀着自己的死亡讣告跟我说的。

事实上，写这封《信》的困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一方面，我必须把他涉及政治事件的谈话的本质抽出来；另一方面，我必须保持他所传达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的普遍的心情，——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的环境中，而且正在那种环境中死去。

访问者：现在已经把话题转到您与布哈林谈话的内容了，您说，他谈到了1922年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的审判。关于他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他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1922年3—4月间，共产国际曾派遣过一个代表团同社会党国际谈判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当时布哈林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时三个国际，即第二国

际，所谓的维也纳联合会和第三即共产国际曾经在柏林举行过会议。布哈林告诉我说，在他、拉狄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他一些团员与社会党人举行的谈判中，后者声称：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其条件是要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最低限度的民主制。他们要求，作为第一步，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案件（当时莫斯科正在准备对他们进行审判）中不采用死刑。

社会革命党人曾经为争取重新召集被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的立宪会议而斗争，结果遭到了逮捕。1922年夏他们将作为苏维埃制度的敌人而受到审判。外国的社会党人希望担保不处决社会革命党人。布哈林向我说，他和代表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赞同这个意见，并且以他们的个人的保证给予支持。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在俄国开始了一个运动：要无情地判决一切“反革命分子”。苏联共产党中央支持这个运动，拒绝承认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柏林所作出的保证，结果，在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的审判中，所有的主要被告都被判处了死刑。

布哈林在同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曾两次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他说：“是的，应当承认，你们社会党人在二十年代初期有能力把整个欧洲发动起来，使得实行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判决成为不可能。”

访问者：据说，《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包含有对所谓柳亭政纲的第一次报导。您是从布哈林那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当然，我原来就听说过柳亭的政纲，1918年我在伊尔库茨克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我知道，1928年他是被斯大林解散了的莫斯科委员会中的右倾反对派的骨干人物之一；他被解除了《红星报》主编的任务之后，写了一个很长的纲

领，该纲领的大部分是用来分析斯大林在共产党内生活中的作用的。

但是，布哈林使我多少了解到了柳亭对斯大林的攻击的一些特点。他说：柳亭认为，这个苏联领导人乃是“俄国革命的大灾星，他在个人权力和报复欲望的驱使下，把革命引导到了毁灭的边缘”；而且柳亭还争辩说，“如果不搞掉斯大林，就不可能使党和国家恢复健康”。斯大林说，这个政纲是呼吁对他进行暗杀。但是，实际上，这个政纲中并不包含有这样的直接呼吁，虽然它的确认为必须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访问者：您同布哈林讨论过任何人，如列宁、斯大林或其他人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是的，讨论过。他谈的一些关于列宁的话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布哈林是非常忠于列宁的。例如，他即使在谈到他们之间的争吵——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事件^①——时，他也

^①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事件是列宁传记中最不光彩的篇章之一。马林诺夫斯基曾多年充当沙皇警察局的密探，出卖过数以百计的党的工作人员。但是，从派别的理由来看，他的活动对列宁有利，因为沙皇警察局为了保护自己的密探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支持列宁关于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队伍中提倡分裂的政策。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问题，有些人，其中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向列宁提出过警告。1911年，布哈林曾经在莫斯科和马林诺夫斯基打过交道，当时他就认定马林诺夫斯基是警察局的密探。他第一个把已知的事实告诉了列宁，但是列宁不但不听信他的警告，甚至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布哈林进行威胁，说如果不停止“诽谤”马林诺夫斯基，就要把他开除出党。

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在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上的斗争，我从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那里曾听到过，他在1913—1914年间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但是布哈林补充了某些细节，其中包括他同列宁的争论，列宁的立场是他当时所不能理解的。1936年，布哈林解释说，当时列宁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其原因就是他的“固执”。——尼古拉也夫斯基注

是用一种热情和友善的语调谈的。

他告诉了我关于列宁生病的后期的情况。从布哈林的谈话的各种细节中，我理解到他指的是1922年的初秋。布哈林说：“列宁常常让人叫我去看望他。医生们禁止他说话，以便使他不致激动。但是当我去了的时候，他总是立即抓住我的手，把我领到花园里去。他总是一开始就说：‘他们不让我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会使我激动。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了解我一生都是这样生活的呢？如果我不能谈这个问题，我就变得比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加激动。当我能够同像你这样的人谈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平静下来了。’”

我问过布哈林，那些谈话涉及些什么问题。他回答说，他和列宁所谈的主要就是我们所谓的“领袖学”，即继承问题——列宁逝世以后谁适合于当党的领袖的问题。布哈林说：“这就是最使列宁放心不下、心烦意乱的问题。”

与此有关的是，他告诉我说，列宁的最后几篇论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制》等等，仅仅是列宁计划要写的东西的一部分。他打算发表另一组大约同等数量的文章，提供一幅将来应当实行的政策的完整的图景。这是他的主要目的。

列宁的遗嘱包括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关于领导人的，大部分是关于政策的。我问过布哈林，列宁的政策的主旨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写了两篇东西来阐述这个政策。这两篇东西是：《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以及《列宁的政治遗嘱》。前者是一本小册子，1925年出版，后者发表于1929年。”布哈林问我：“您记得那两本小册子吗？”我回答说：“老实说，我现在不记得《到社会主义之路》了。”

他说：“这篇东西更有意思。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把列宁跟我

谈到的关于已经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和尚未发表的几篇文章中的东西写进去了。我试图在那本小册子中仅仅阐述列宁所想的和跟我谈的东西。当然，那不是一些引证；我所写的东西反映了我对列宁的意思的理解。不过，那只是我写的列宁向我阐述的列宁思想的大纲。他的遗嘱中的重要之点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待占俄国居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态度。根据列宁和所有的一般共产党人的看法，在特定的时刻对农民使用暴力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方法不应被作为一种经常的处置方法。这就是《到社会主义之路》的主旨。

布哈林说，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所以我只能写关于列宁已经发表过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那是同一回事。不过，头一本小册子走得更远一些，其中的思想更具体化一些；它没有停留在列宁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上面。”

我重新读了这两本小册子，我认为布哈林用这种办法来阐述列宁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列宁的想法。当时列宁认为布哈林是最能传达他的思想的人。他跟布哈林谈话是为了让布哈林把他自己还没有说的东西写出来。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当布哈林跟我谈到列宁向他讲了些什么话时，我曾回答说：“您知道，列宁在向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实质上是回到司徒卢威去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司徒卢威曾写过一篇长文章，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使用暴力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不应当建立在作为经常因素的暴力之上。布哈林对这篇文章感兴趣。他说他一定要找来看看。

访问者：斯大林呢？他评论过斯大林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如果您说的是他们之间的私人会见的话，那只是以极其匆忙的方式进行的。有一天，他在我的住处看到了一本《虎皮武士》——鲁斯塔威写的伟大的格鲁吉亚民族史诗。那是由格鲁吉亚政府出版的一种精美的纪念版本，附有插图。当布哈林看到了那本书时，他说：“当我最近一次去看望斯大林时，我在他家里看到了。是他拿给我看的。”仅此而已。

不过，法尼·叶捷尔斯卡娅告诉我说，她曾直接问过布哈林：“您同斯大林的关系怎么样？”布哈林回答说：“三减”……最低的分。

在大部分谈话中，布哈林几乎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且几乎根本没有谈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获得的印象是：他了解斯大林的那种“高加索人的报复性”，对这一点甚至在革命前的时期人们就有议论，因此他已经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由于这个原因在同我的谈话中他很克制。

访问者：他谈到过任何其他的人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是的，他向我说过关于他第一次会见俄国的著名科学家伊·巴甫洛夫的有趣的故事。布哈林已被选举为科学院院士。当他的名字被提出来进行选举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1926—1927年间的事，也许甚至更早一点——；布哈林说，巴甫洛夫曾发言反对选举他，称他是一个“沾满鲜血的人”。当时布哈林不在场。布哈林了解到巴甫洛夫的这个发言以后，决定要去开诚布公地跟他谈一谈。他告诉我说：“我非常尊敬他。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是作为一个人，我尊敬他。于是我去见他，并且对他说：‘我想跟您谈一谈。’巴甫洛夫十分冷淡地接待了我。但是，

既然他把我领进了他的寓所，他就得谈话。我们谈了几个钟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当时巴甫洛夫已经感到有点儿窘迫了，他说：“好啦，毫无办法。咱们走吧。我请您跟我一起吃午饭。”我们就一起走进餐厅，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挂着一些装着蝴蝶的盒子。巴甫洛夫跟我一样，是一个爱好搜集蝴蝶的人。^①我已经在桌子跟前坐下了，我看见正好在我的对门的门上面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种十分罕见的蝴蝶。我不禁向巴甫洛夫惊呼了一声：“什么呀？您有这个？”巴甫洛夫回答说：“噢……他甚至懂得这个哩。”我问他这是在什么地方抓到的等等，他这才相信我真的懂得蝴蝶。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访问者：布哈林是怎样影响巴甫洛夫的？是什么东西使巴甫洛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尼古拉也夫斯基：这与布哈林的人道主义思想有关。布哈林同巴甫洛夫讨论过他的信念：知识分子应当——象高尔基后来所做的那样——协助布尔什维克改变俄国的总的气氛。正如布哈林向我解释的那样：“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如果说现在他们的表现坏，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处境坏。应当使他们相信：国家并不反对他们；但是必须改变政策。”

有一次他曾要我给他搞到托洛茨基的公报，以便他能看到最

^① 布哈林非常喜欢蝴蝶。当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简直非去自然史博物馆不可，因为该馆有许多关于全荷兰的殖民地的人种学和自然史方面的展品。这个博物馆特别出色的一点——也许在这一点上它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是搜集了许许多多的蝴蝶。布哈林如饥似渴地欣赏蝴蝶，连拖都拖他不开。我让他在那儿忙乎着和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地仔细看，我自己就去看别的东西了。我们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这是我儿童时代的爱好。”——尼古拉也夫斯基注

新的几期。我不仅给他搞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公报》，而且搞到了社会党的一些出版物，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通报》。他对《通报》持比较批判的态度，但是，有一件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到达巴黎以前的最新的一期——即1936年2月的那一期——上登了一篇文章，讨论高尔基提出的一个计划：把知识分子联合为一个单独的政党来参加选举。关于这个问题，布哈林说：“某个第二党是需要的。如果只有一个选举名单，没有竞赛，这就跟纳粹主义一样。为了在俄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心目中能使我们独树一帜，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有两个选举名单的制度来同一党制相对抗。”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二个党将不是一个在原则上反对现行制度的力量，而是一个提出建议来进行改革和补救的力量。

访问者：巴甫洛夫赞同他的这个意见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是的，巴甫洛夫以及其他几个杰出的学者都赞同。这就是布哈林与巴甫洛夫的友谊的基础。巴甫洛夫恰恰在我同布哈林谈话之前不久已经逝世，所以，有一天布哈林曾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巴甫洛夫已经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支援他。

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想，因为国家刚刚经历了集体化，而且正处在大清洗方兴未艾之时。可是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当时显然相信他们的计划能够实现。

访问者：是的。为什么布哈林认为人道主义可以被用来反对纳粹呢？

尼古拉也夫斯基：当布哈林经过德国到巴黎去的时候，他在柏林停留了一天，他跑遍了所有的书店，买了一大堆关于法西斯主义

的理论性小册子。那些小册子摆在他的旅馆房间的桌子上，他经常研究它们。

他觉得希特勒已经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迅速的退化？布哈林得出结论说，不仅必须防止在苏联出现这种退化，而且必须提出一个口号，使国际运动可以在这个口号下在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他对我说：“如果不提出我们自己的某种思想去反对他们的思想，我们就不可能对付他们。他们的思想是暴力。您记得，他们广泛使用的一句所谓的哲学格言是：‘杀人就表明一个人有力量’。归根到底，这种思想是把暴力、强制作为社会、对个人、对人格实行统治的永恒的方法。必须反对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包含着对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压迫。”

布哈林接着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许多坏事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干的。我们必须坚决同这种弊病决裂。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不同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在这种新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反对反人道主义的纳粹主义的斗争。”

我记得，布哈林是用一些非常浅显的语汇来说明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但是他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当时他总是强调这种态度的重要性，后来我很快就明白了，在他看来，用人道主义反对“永恒的压制”的斗争，不仅是反对外部的敌人即纳粹主义的一场斗争，而且是反对内部的敌人，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修正共产主义理论使之失去人性的企图的一场斗争。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而且因为我想了解布哈林的结论，所以我就对他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现在所说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回到十戒。这不是什

么新东西。”他回答说：“您以为摩西十戒已经过时了吗？”我说：“我没有说它们已经过时。我是说它们已经存在了五千年。难道我们已经达到了要把摩西的戒律当作新的真理来重新发现的地步吗？”布哈林没有回答。

在巴黎的另一个场合，他要去作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的报告。在这个从来没有用俄文发表过的报告中，他甚至更加强烈地强调了人道主义。当他刚刚准备完这个报告的稿子时，我正好去看望他。他说：如果您喜欢的话，我把我刚刚写完的东西念给您听。这跟我们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我说，我当然想听。于是他给我念了几段。当他念完之后，我就对他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就是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人道主义，回到人道主义去。”他回答说，早先他们反对过人道主义。的确，如果我们看看1917—1920年的文献的话，是有人造过人道主义的反，那些反对者不仅有布哈林、高尔基，而且还有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布哈林又说，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些困难的阶段。早先，破坏是必要的，反对人道主义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另一个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建设。这些任务要求改变我们的全部观点。他接着说，我们的共产主义和你们的社会主义，都必须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根植在这种人道主义的基础上。

对这些看法我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过去，在希特勒向德国的民主制进攻时，我自己就得出了这样的看法。1933年2月，在希特勒上台的前夕，我和一个朋友出版了一本论述青年马克思的书，那本书的基本看法就是：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布哈林读过我的那本小书，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赞同我的观点。这就是他能够和巴甫洛夫接近的原因。

访问者：您讲到了布哈林所反对的一个内部敌人。您能否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

尼古拉也夫斯基：布哈林的人道主义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强迫集体化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一次我曾提醒布哈林，说关于集体化的恐怖行为国外知道得很多。他都生我的气了，并且尖锐地反驳说，所写的每一件事情都仅仅提供了当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极其模糊的画面。他的确充满了那些直接参加集体化运动的人所获得的印象，那些人都对他们所看到的事情感到震惊。有些共产党员自杀了，有些人发疯了，许多人承认失败了，并且坚决不干了。

布哈林告诉我说：“在集体化以前我就了解了许多情况。1919年，当我提议不给肃反委员会以杀人的权力时，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而通过了一个决议：任命我为政治局驻肃反委员会的拥有否决权的代表。列宁说：‘让他自己到那里去吧，如果可能的话，让他去设法对恐怖行动加以约束。如果他取得了成功，我们将非常高兴。’而且实际上，我了解到了一些我根本不愿意让我的敌人知道的事情。但是1919年的情况根本不能与1930至1932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相比拟。在1919年，我们是为挽救自己的生命而斗争。我们杀了一些人，但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可是，在以后的时期，我们杀了一大批毫无自卫能力的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然而，在布哈林看来，最坏的事情还不是集体化当中的恐怖行动，而是那些参加了集体化运动的共产党员的心理上的深刻变化，他们不是发疯了，而是变成了一批职业的官僚分子，从此以后，对他们来说，恐怖行动已成了进行行政管理的方法，服从来自上面的任何命令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美德。布哈林在谈及他们时说：“他们的确是某种可怕的机器上的齿

轮的轮牙。”他又说，正在发生在苏维埃机构中工作的人的真正的非人性化，正在发生把苏维埃政权变为“铁蹄”^①统治的过程。这个过程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加使布哈林感到忐忑不安，唤起了他要恢复某些基本的人类的真理的欲望。在他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头一个字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这个短语的关键是“人道主义”，是为人、为人能否作为人而活下去而担心。

访问者：斯大林是否了解布哈林的观点？如果了解的话，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反对他？

尼古拉也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内，布哈林在肉体上没有受到摧残。他只是在报刊上，在各种会议上被整了一通。共产主义学院甚至被迫举行了一次专门的讨论来揭露他离经叛道，而政治局又不让他本人参加讨论。在这种场合下，布哈林的真正的观点被诽谤性地歪曲了。例如，人们指责他主张进行战争。不过没有采取反对他的行动。

布哈林的学生和助手们的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布哈林在十多年中辛辛苦苦物色到的，其中有许多人很有才华。斯大林给了他们以打击。后来被斯大林称之为布哈林“青年学派”的这个集团中的几乎每一个人，如艾亨瓦尔德、奥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斯列普科夫等等，都被送到外省去了，接着就被逮捕，最后被杀掉了。忍受这些打击——尤其是搞掉他的那些青年学生——，这对布哈林来说是痛苦的，因为他感到自己对他们的未来的命运负有责任。

^① 这是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的名称，布哈林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尼古拉也夫斯基注

访问者：您在前面提到过，您曾经同布哈林一道去过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这是为了去看看马克思的一些资料，是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是的。有一批德国资料——多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手稿——曾通过丹麦使馆零散地从德国运出去了。它们被保存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馆中。代表团的成员们想亲自去看看，于是我们就同意去那里一趟。

我们一到达哥本哈根就跑到党的档案馆去，档案馆的人员给我们取出了装着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的那个箱子。布哈林仔细地——看了那一大堆笔记本——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企图系统地对建筑在私有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纷繁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着的人类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成果。接着，他就开始翻阅手稿，企图找出他的目光将倾注其上的个别词句。这件工作毫无结果，于是，他就转过脸来对我说：“您一定能找出马克思写关于阶级的那个地方^①”。

我非常熟悉那一段话，很快就给他找出来了。布哈林小心翼翼地从我手中接过了马克思的那几页手稿，双手捧着头，开始阅读马克思第一次企图表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那些行众所周知的文字。那些文字写得参差不齐，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写得很匆忙的字体，似乎马克思的笔简直跟不上他的迅速展开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没有被表达完全，而被打断了，很象是当时有什么人走进了马克思的房间，把他的工作打断了。

布哈林从头到尾谈完了那一段话，接着又翻转了稿子，看了看这面，又看了看那一面。显然他想找找看草稿中是否包含有被省略了的地方的某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说明马克思的思想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0—1001页。——译者注

过程……可是他没有找到。他又把那段话重读了一遍，彻底查明确实找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就不再看下去了，叹着气说：“啊！卡尔卢沙^①，卡尔卢沙，你为什么没有写完呢？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困难的，你要是解决了它，对我们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啊！”

我记得我和跟我们一道去的阿多拉茨基互相使了使眼色。他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的专家，不过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专家。布哈林在青年时代就喜欢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对他来说，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仍然活着，布哈林可以与它们交谈，甚至同它们辩论。而阿多拉茨基却是一个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喀山大学研究班的产物，丝毫没有布哈林那种浪漫的气味。在阿多拉茨基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分散在那些笔记本中，已被分门别类加以整理，而且已装在书架上了。他熟悉一切必要的和甚至不必要的引证，他知道如何对待它们以及在什么地方找到它们。但是，他对于把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日新月异的时代不感兴趣。而布哈林恰恰是为了把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现在而活着，因此他设法弄清楚马克思的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思想，并且解决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阿多拉茨基又坐了两个来小时去研究那批手稿，他编出了手稿的目录，读了许多尚未发表的东西。布哈林不再看丹麦的档案，而就这些档案以及丹麦工人运动提出一些问题。后来，在那一天的剩下的时间里，他拉了我们去参观一些博物馆，买了整整一大包古典名画的照片，又领我们去殖民地博物馆参观了几个钟头，研究那里独家搜集到的一些蝴蝶。任何东西他都要亲眼看一看。在那一天当中他好几次一再提到马克思论述阶级的那些话。

布哈林是俄国的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① 俄语中对马克思的名字“卡尔”的昵称。——译者注

1893年，普列汉诺夫曾经断言，俄国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布哈林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可能发生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深刻得足以容许直接跃进到社会主义。布哈林不仅必须同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老的论点打交道，而且还必须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论点打交道。波格丹诺夫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早期曾预见到会产生一种由经济管理人员组成的一个新阶级的专政。波格丹诺夫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在1905年革命时，他作为第二位最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在对布哈林的教育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波格丹诺夫的观点给了布哈林非常深刻的印象。布哈林不同意波格丹诺夫的结论，但是他懂得，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在搞的那种“飞快的社会主义”的严重的危险就在于：它很可能产生出一个独裁者的新阶级。

布哈林和我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后来，我找到了他的许多文章。那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他非常担心布尔什维克党蜕化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访问者：据说，1936年的宪法主要是布哈林主持搞的。关于这个问题他谈过什么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各种迹象都已表明，在制订这部宪法当中布哈林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书记。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过一个主张实行普选权的方案，而且为取消共产党的一切特权而斗争，而这两点都在宪法中反映出来了。此外，他在同我谈及高尔基、巴甫洛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那个团体时，他给了我一个印象，就是宪法的思想是同他们一起搞出来的。

后来，有一天，当我们讨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时，布哈林从他口袋里掏出他的那支自来水笔给我看，他说：“请仔细看看。整个

苏维埃新宪法，从头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用这支笔写的。我独自承担了这件工作；只有卡尔卢沙[拉狄克]^①帮了一点小忙。我之所以能够到巴黎来，就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一切重要的决定都已经作出了。现在他们正在印那个文稿。在这部宪法中人民将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不再被推到一边了！”

布哈林对于这部宪法感到非常自豪。它不仅采取了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而且规定了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之，这是一幅精心设计出来的蓝图，它可以使国家由一党专政和平过渡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布哈林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甚至提出过要有几个候选人进行竞选的问题。

但是，布哈林低估了他的对手，根本没有预见到斯大林会狡猾地应用这些原则——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歪曲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在斯大林的绝对专制面前一律平等。斯大林不仅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杀掉了这部宪法的起草者本人，而且还残酷无情地对待党内其他的一切赞同布哈林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人。

访问者：您认为布哈林当时对他后来的命运——即他会由于反对斯大林的统治而受到审判——有任何预感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在1938年进行审判的时候，我曾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当我们在巴黎会面时，布哈林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有疑虑的。

例如，他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斯大林清洗了集合在布哈林周围的集团之后，布哈林曾经到苏联的中亚细亚作过一次旅行。这次旅行在布哈林的一生中留了一个重要的界碑。

^① 卡尔·拉狄克也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扎戈里亚注

当时我在他的谈话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当我有机会谈到他的传记材料时，对此就深信不疑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几次反复谈到这次旅行，同时表现出了心情复杂和有深刻保留的迹象。他谈到，他乘的一架飞机掉进了空中陷阱，他们死里逃生……又遇上了土匪^①，他幸运地逃脱了，等等。这许许多多细节仅仅揭开了布哈林在其面前犹疑不决的一块幕布的边缘。

布哈林那次去中亚细亚旅行时到达了“举世无双的”帕米尔山脉；他说，他到过“世界的屋脊”，即苏联、中国、印度、阿富汗四国交界的地方。人们曾企图坚决劝阻他，叫他不要去；他们说：道路被冲毁了，天气捉摸不定，一帮帮的匪徒出没其间，总之，帕米尔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这些话倒促使我非去不可，”布哈林说，“我向来喜欢山^中的人迹罕至的道路，正如我喜爱科学中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样。”在这件事情上他自有主意，自行其是。

人们给了他一位向导——一个熟悉那些地方的边防战士，一个刻苦耐劳而又勇敢的人。“您一定看过描写他的那只叫做‘狼’的狗的影片，”布哈林说，“那部片子不久以前在巴黎上演过。”我看过那部描写那个边防战士、他的那只聪明的狗、特别是巍巍群山的影片。“我们俩穿过群山，通过一些最险峻的地方，漫游了几天。那只‘狼’总是走在前头，表现出一幅我以前在狗的身上从未见过的威风凛凛的神气。我们走到一个分叉路口。我的向导牵着他的马稍微走在前面一点。他指着一条路说：‘这条路近一点，但是，现在如果走这条路，肯定等于自取灭亡。雨水冲坏了几段，而且发生过几处山崩。甚至连山羊也走不了。’他就走上另一条路。可是我呢，”布哈林接着说，“把我的马牵到了那条被冲毁了的路上，走了

^① 指西斯马赤分子，集体化时期中亚细亚的一伙反革命匪徒。——尼古拉也夫斯基注

这种信心就是：发展总是前进的。发展就象向岸边流去的河流。一个人如果稍微离开这个河流，他就会被彻底抛出来。”这时布哈林伸出两个指头，做了一个剪刀形的手势，“河流要穿过一些最困难的地方。但是它毕竟朝着它应该去的地方滚滚向前。人们在成长，在发展中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定能建设一个新社会。”

所以我说，当时布哈林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有疑虑的。他一定已经知道，他与斯大林的那种关系对于他来说是凶多吉少的。但是他感到他必须留在俄国，他相信，一个较好的未来未尝不在等待他。

有一件事可以作为对这个悲剧式的时期的脚注。著名的俄国的文学史家尔·弗·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自己的回忆录^①中谈到他在狱中会见过布哈林的那个帕米尔的警卫员。后者之所以被关押，无疑是由于他同布哈林的关系。但是，在审判中，当人们控告他曾为外国情报机关工作时，他把那个审讯人以及急急忙忙赶去帮助那个审讯人的契卡分子搞得狼狈不堪。只是经过了一场真正的战斗之后，他们才搞到了一些什么可以加在他身上的东西。为了进行报复，他们作了这样的处理：他再也看不见他所热爱的群山了。

译自《权力和苏联的精华》1965年纽约
英文版第3—25页。

（杨彦君译）

① 尔·弗·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监狱与流放》1953年纽约俄文版。——尾古拉也夫斯基注

让历史来裁判(摘录)

[苏]罗·麦德维杰夫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

六

布哈林 1906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他年仅十八岁。所以他在党的领袖中间属于最年轻的一个。他从早年起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有浓厚兴趣,写过不少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受到过列宁的批评。但布哈林并没有坚持错误。1917 年,他从流亡国外回到俄国,站在列宁一边,成为莫斯科党委会和莫斯科区域局的成员,并于 1917 年 7 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他才二十九岁。1918 年以他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曾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称他们为“革命空谈家”。不过,应当指出,党的许多领袖,包括伏龙芝、捷尔任斯基、洛莫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波克罗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古比雪夫等,都曾先后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后来全都承认列宁是正确的,因此,到 1918 年底,“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没有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布哈林提出过所谓的“缓冲纲领”。后来列宁的“遗嘱”简单地说明了布哈林所以犯错误的基本原因:在布哈林身上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

而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但在同一封信里列宁也指出，布哈林是党的最大的和最可贵的理论家，他“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在晚年对布哈林的态度是很友好的。

列宁去世以后，布哈林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事实上，同这些反对派的理论斗争大部分是由布哈林负责的。在制定中央委员会 1925 年至 1927 年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以及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面，布哈林起了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的作用。这些政策，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布哈林的知识分子学究气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只要分析一下布哈林关于经济、政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哲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著作，可以立即发现一种公式化的东西。对他来说，首要的是找出某种图式或公式，虽然这些公式有时并不能包括事物的最本质的方面。不过，斯大林的公式化和烦琐哲学要比布哈林严重得多。

在列宁逝世后的一个时期内，斯大林曾经公开奉承布哈林，并竭力利用布哈林多方面的才能。党的大多数干部都继续把布哈林当做全党宠爱的人物；他在共青团员中间也享有极高的威信。1925 年 12 月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布哈林曾号召农民发财致富这一点对他进行非难。奥尔忠尼启泽却叙述了列宁曾经怎样赞扬布哈林，并强调指出，布哈林既勇于发表意见，又勇于承认错误。奥尔忠尼启泽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莫洛托夫赞扬了布哈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加里宁、日丹诺夫和斯大林也都同样地为布哈林进行了辩护。

.....

对于 1927—1928 年的粮食危机以及因此采取的没收粮食的

措施,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那些在1925—1927年间受到斯大林及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支持的经济政策是有责任的。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至少可以说是值得争论的。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富农是积极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在1924—1927年的情况下,布哈林和李可夫认为可以超过党在当时所能够 and 应该做的限度对城乡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做出更大的让步。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试图把布哈林等人的农业政策说成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用它来和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作对比。我不大赞成这样一种观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固然根本违背了列宁的发展农民合作社的计划,但布哈林的政策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虽然,在1929—1933年的条件下,它们对工农联盟的威胁比斯大林的那些冒险主义的过火行为要小一些。近几十年来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同农村的合作社和小农农业的结合,可以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在保持总的社会主义前提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同农民打交道,而不存在什么“投降”或“背叛”的问题。

在布哈林的著作中,没有清楚明确地回答如何使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例如,他认为买卖合作社同生产合作社是绝然不同的。他强调可以通过买卖过程而不是通过生产过程达到社会主义。在解释这个主张时,布哈林对合作社的发展作了如下的预测:“农村将有哪些成分呢?贫农的合作社将是集体农庄。中农的合作社将是买者和卖者的合作社以及信贷合作社。在某些地方甚至还会有富农的合作社。所有这一系列合作社都将隶属于我们的〔国家〕银行”^①。

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这种混乱的学究式的论述是错

^①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版第305、352页。

误的。

尽管如此，当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历史上的争论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右倾”反对派的批评意见很多被证明是对的。在1927年底，它的领袖们曾经支持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没收粮食），但是后来他们正确地反对把这些措施变成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右倾分子反对强制地、匆忙地实现集体化，因为这种集体化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没有足够的准备的。右倾分子反对工业建设中的“好大喜功”和往往不顾经济意义而滥行投资的现象，也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建议调整国家购买农民粮食的价格是有道理的。1927年的粮食价格很低，比生产成本还低，这显然不能从经济上刺激农民把更多的粮食卖给国家。

接下去我们将会看到，原来同意布哈林的观点的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突然来了一个大幅度的向“左”转。他所宣布的对富农实行非常措施的政策，大大超过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提出的各种最激烈的政策。他出人意外地借用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各种概念，并且大大加以发挥。尤有甚者，斯大林还启用一些知名的托洛茨基分子来把这些概念付诸实施。在1929年春天，他的这一转变甚至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引起了分裂。当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如斯米尔加和拉狄克）决定支持斯大林，其理由是斯大林采纳了他们对富农发动进攻和实行高速度工业化的纲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新政策，宣布这些政策同他这一派早先提出的方针毫无共同之点。的确，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确实借用了托洛茨基早先提出过的一些口号，但他对农民的暴力行为，他那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以及他对城乡的横暴统治，其背离列宁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反对派曾经提出过的任何主张。所以毫不奇怪，许多公正地反对斯大林的这种突如其来的

大转变的共产党员，都被不公正地扣上了“右倾分子”的罪名。

斯大林还从“极左”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立场批判了布哈林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他坚持要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发动猛烈进攻。斯大林不是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反对法西斯主义、垄断组织和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统一战线，而是号召共产党人集中打击当时同工人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左派。苏联党内和西方的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仅仅因为反对这种错误政策，就被无理地扣上了“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的帽子。

事实上，在攻击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时候，斯大林给其他许多同布哈林派没有什么组织或思想联系的派别和集团也都贴上了“右倾”的标签。这些派别除了对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持某种异议之外，彼此并无共同之点，把这各不相同的许多政治派别混为一谈，只是大大有利于斯大林对布哈林及其同情者的攻击。他把许许多多同他们的观点毫无联系的罪名全都加在他们身上。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尽管他们有种种错误，他们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我们的一些历史著作中还保留着斯大林当年所做的这些判决。例如特拉佩兹尼科夫写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1928年反对党。当时粮食危机愈来愈严重，富农在粮食供应方面实行怠工，他们把粮食藏起来，不愿意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在这种严重的时刻，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公然站在富农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一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反党集团把所有的不满分子、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纠集起来，公开攻击党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①

如果是在1937年，这样的评价并不令人惊讶，但在1967年还

^① 斯·普·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和农民问题》莫斯科1967年版第2卷第187—188页。

看到这样的说法，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来没有在党内建立一个明确的派别组织，这一点，连斯大林自己也承认。“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这样问道。“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①

因此，“右倾分子”并没有正式破坏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著名决议。斯大林对他们采用压制手段，采取组织措施，宣布维护“右倾”观点与党籍不能相容，事实上是践踏了每个党员可以自由讨论党的政策问题的权利，而这是党章所保证的权利。

.....

* * *

斯大林摧毁了所有的反对派，这并不象某些教条主义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伟大的胜利”。在所有的反对派都缴械投降之后，党内的状况也就开始更加恶化了。正是在这个“空前统一”的时期，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犯罪的政策，它使党遭到极其严重的损伤，直至现在还没有能完全恢复元气。因此，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绝不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派本身自然也有很大的责任。党的悲剧不仅在于斯大林这样一个人在二十年代领导了中央委员会，而且在于领导反对派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这样一些人，他们也不能提供另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领导来取代斯大林的领导。

译自《让历史来裁判》1972年英文版第61—70页。

（张启荣译）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6页。——译者注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 逮捕和杀害列宁的问题

杨彦君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否曾企图逮捕和杀害列宁？下面把个人看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资料整理出来，供参考。

1938年3月2—13日，在对“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审判中，布哈林、李可夫等十八人以犯有充当外国间谍、进行恐怖暗害活动、企图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等罪行，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极刑，执行枪决。判决书中说：

“业已查明：1918年，布哈林及其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曾策划过反苏维埃政府的阴谋。

布哈林及其阴谋同伙曾打算破坏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推翻苏维埃政府，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由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新政府。

为了实现这个阴谋计划，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哈林知悉和同意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发动了叛乱，以期推翻苏维埃政府；业已进一步查明：1918年8月30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杀害列宁的企图，乃是布哈林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及其同伙‘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罪恶计划的直接结果。”（《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出版，1938年莫斯科英文版第798页）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中详细地援引了上述判决书中的话（见1975年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241、247页）。

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揭露出来是在1923年底和1924年初。当时布哈林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那场党内斗争中，当时的托洛茨基派、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等人，美化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党内派别斗争激烈、几乎使党陷于分裂的那种状况，鼓吹党内应有派别和派别活动的自由。为了驳斥他们的这种谬论，布哈林于1923年12月初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讲话。这个讲话没有发表。根据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转述，布哈林说：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由于党内派别斗争十分尖锐，“左派共产主义者”派性十分强烈，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一个正式的建议——逮捕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左派共产主义者”曾认真地讨论过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的组成人员的问题，而且他们打算任命皮达可夫为主席。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和斯大林的文章分别发表在1923年12月15和16日的《真理报》上（见附录一、二）。他们用布哈林提供的材料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为此，皮达可夫等九人于12月20日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声称要澄清事实，“驳斥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歪曲”。当时作为《真理报》主编的布哈林，针对皮达可夫等九人的信也写了一封信，二者被冠以《致编辑部的两封信》的标题发表在1924年1月3

日的《真理报》上(见附录三)。

布哈林在这封信中说,他之所以揭露上述事实,“其目的是要驳斥反对派中一些同志对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种种事件所进行的田园诗般的美化。他们把党内的布列斯特和约时代描绘成‘超民主’的时代。但我清楚地知道,那是党处于分裂的边缘、国家濒临毁灭的时期。如果我们愿意吸取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不能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布哈林总结这件事情的政治教训说:“……派别斗争如此尖锐,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敢于向我们提出这一类建议。”

当时,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九人互相进行驳斥,双方对事实的叙述、分析和认识都不尽相同。布哈林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在斯莫尔尼学院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建议;皮达可夫等人则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跟“左派共产主义者”谈这个问题有两次,一次在塔夫利达宫,另一次在邮电人民委员部。布哈林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是“正式的建议”,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左派共产主义者”对此进行过讨论,但拒绝了;皮达可夫等人则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话是“半开玩笑地”讲的,不是什么建议,并不具有“任何严重的意义”,没有被讨论过,因而也没有被拒绝。

有一点是争论双方都肯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主动跟“左派共产主义者”谈过,企图逮捕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成立新政府。

此外,皮达可夫等人说,1918年,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前,担任邮电人民委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死后,拉狄克曾顺便向列宁谈及过上述的事情,列宁对此“置之一笑”。他们在这封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上的信中谈出这件事情时列宁还在世。

在1938年的审判中,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被控告还犯

有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罪行。就这个问题法庭对布哈林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雅柯夫列娃、奥新斯基、曼采夫、卡姆柯夫、卡烈林等五个证人相继被带到法庭进行对质。在审讯中，布哈林承认他1923—24年间交待和揭发过的事实，但坚决否认曾企图杀害列宁等人，并且说，当时曾说过无论如何要保证列宁的绝对安全。在最后陈述中，布哈林又对这个罪名作了进一步的反驳。

据外国一些书刊报道，迄今为止，1938年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并未撤销。但苏联的一些书籍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已明显地改变了。

1959年出版的由波诺马辽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八章在描述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党内斗争时说：“……‘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反党的分裂活动鼓舞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使他们产生了改组苏维埃政府的希望。他们向布哈林建议撤销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成立一个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在1979年出版的该书增订第五版中，以上的文字未作丝毫改动。该书1959年版本在第十四章第二节中对1937—1938年间的审判作了否定的评价。其中说，斯大林提出的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的“这个论点成了对那些在政治上已被粉碎的、党的思想上的敌人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根据。许多没有任何罪过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也遭到了镇压”。该书1979年增订第五版在相应的地方作了如下修改：“……这个论点成了对党和国家的一些著名活动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苏联的高级将领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任何罪过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根据。”

1964年出版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这一条目(该书第8卷第515—516页)中说:“‘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和派别活动同小资产阶级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是相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卡姆柯夫和普罗相曾向布哈林、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提出过一个罪恶的建议:‘逮捕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成立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这不是偶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勾结起来,但提出建议这件事情本身说明,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曾企图把‘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可能的同盟者。”

以上两书对事实本身的叙述以及对事实的评价,都与布哈林本人交待和揭发的基本相同。

苏联的某些著作,例如1964年出版的卡·伊·瓦尔拉莫夫等人合著的《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的揭露》,几乎直接否定了1938年对布哈林的判决。该书的引言中说:“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期,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文献,其态度是不客观的,对事实的阐述是不正确的。把‘左派共产主义者’说成是外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等等这样一些违背历史真实的评价,使人们不能客观地分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的思想内容,不能彻底揭示左倾空谈对革命运动的命运的真正危险。”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1918年初,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逮捕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的建议,这一事实被肯定了。关于布哈林等人当时曾企图杀害列宁(以及后来充当外国间谍)的罪名,实际上被否定了。

现将几个有关的资料附录如下。

附 录 一

斯大林《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摘录)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爱把 1917 年至 1918 年的党内生活状况描绘成一种合乎愿望的理想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党内生活有许多黑暗面，引起了党的极大震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似乎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样激烈。例如，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

摘自《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310 页。

附 录 二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摘录)(1923 年 12 月 11 日)

在十至十五年以前，关于派别的问题跟现在大不相同。那时我们党的活动十分之九是从事宣传鼓动，而现在我们是一个管理着国家的党。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范围内被提上了日程，而在我们俄国，它已成为事实。现在，容许在我们党内存在派性和派

别集团,就意味着容许两个政府的萌芽,也就是容许无产阶级专政分裂,也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陷于灭亡。

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在报刊上有人常常说,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是容许派别自由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布列斯特和约时代,布哈林同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首领。前几天,布哈林同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会议上谈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应当为全党所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布哈林同志在描述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我们发生了内部斗争的那个时期时说,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家知道,他们也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曾经向他们,即“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提出过一个正式的建议,这个建议不是别的,而恰恰是要逮捕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左派”共产主义者曾经认真地讨论过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的组成人员的问题,而且他们打算任命皮达可夫同志为主席。同志们,这不是海外奇谈。当时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疯狂的小资产者,可以怀着某种成功的希望来向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当时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工作人员中,毕竟还有象布哈林同志以及已故的乌里茨基等这样一些优秀的活动家。所以,正如布哈林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志愤怒地拒绝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志当时并没有向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汇报这件事情,而党直到现在,在过了六年之后,才了解到这件并非不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彰明较著的历史性的实例,它证明:在一个管理着国家的党内的两个派别,这无非是两个政府的萌芽。难道我们还需要别的什么实例吗?在国内战争的烽火中,当党管理着国家的时候,派别斗争按

照自己的逻辑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且设想一下如果在红军中发生了两派斗争。同志们，红军中的两派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会没有任何红军。

译自《真理报》1923年12月16日。

附 录 三

致编辑部的两封信

—

尊敬的同志们：

由布哈林同志带头，党内正在流传着一个神话，说1918年左派共产主义者曾经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过关于推翻和逮捕列宁同志并选出一个新的人民委员会的问题。关于这件事情，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是这样说的：

“前几天，布哈林同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会议上谈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应该为全党所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布哈林同志在描述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我们发生了内部斗争的那个时期时说：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向他们，即‘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提出过一个正式的建议，这个建议不是别的，而恰恰是要逮捕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左派’共产主义者曾经认真地讨论过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的组成人员的问题，而且他们打算任命皮达可夫同志为主席。同志们，这不是海外奇谈。当时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疯狂的小资产者，可以怀着某种成功的希望来向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正如布哈林同志

所说的，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志愤怒地拒绝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志当时并没有向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汇报这件事情，而党直到现在，在过了六年之后，才了解到这件并非不太重要的事情。”（见《真理报》1923年12月16日第286号）

斯大林同志在发表于12月15日《真理报》第285号上的文章中写道：

“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的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

由于事情被描述得面目全非，为了恢复历史真相，为了驳斥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歪曲，我们，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积极参加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对下列两个**根本无关紧要的事件**加以说明。大概就是这两个事件使得布哈林同志，而继他之后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产生了一种想法：似乎曾经进行过关于推翻人民委员会和逮捕列宁同志的谈判。

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确实存在过。这个派别曾经为争取改变党在对外问题（布列斯特和约）和国内问题（特别是关于经济政策问题）上的政策而斗争。大家都知道，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占多数。列宁同志曾经在中央会议上威胁说：如果中央通过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他就要辞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当事情已发展到要坚决进行表决时，一部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人弃权了，结果赞成布列斯特和

约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作出了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党内派别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一部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在塔夫利达宫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当列宁正在作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报告之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走到了皮达可夫和布哈林的跟前。在谈话时——这次谈话不仅不是什么正式的谈判，而且甚至不是事先认真进行互相试探的谈话——，卡姆柯夫只不过是半开玩笑地说：

“喂，如果你们在党内取得了多数，你们打算怎么办呀？列宁准会离开，那时就只好由我们和你们来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我认为，那时我们可以选皮达可夫同志当人民委员会主席。”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卡姆柯夫的原话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记忆尽可能真实地追述的，况且当时参加谈话的人并不认为这些话具有任何严重的意义。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不仅没有被愤怒地拒绝，而且根本就没有被拒绝，因为没有被讨论过，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是头一桩事情。这一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没有提到什么逮捕或推翻人民委员会的事。

后来，已经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了，当皮达可夫、布勃诺夫和卡西奥尔已经到乌克兰去了的时候，发生了第二桩事情，这桩事情也绝对没有任何意义。拉狄克同志曾经到当时的邮电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那里去用无线电拍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什么决议案。普罗相笑着对拉狄克同志说：“你们还在写决议案。要是把列宁逮捕一昼夜，对德国人宣战，然后再一致选举列宁同志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岂不更省事。”当时普罗相还说，不言而喻，列宁是革命家，如果他被置于不得不进行反对进攻

的德国人的自卫战争的地位，尽管他把我们和你们（你们——指左派共产主义者）骂得不亦乐乎，他毕竟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领导这场自卫战争。这个“建议”仍旧不仅没有被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没有被讨论过，只不过是普罗相的一个十分离奇古怪和滑稽可笑的幻想而已。指出下面的事实是很有意思的：还在1918年，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之前，当普罗相死后列宁同志写关于悼词的事时，拉狄克同志曾经向列宁同志谈及过这件事，当时列宁同志对这个“计划”置之一笑。

必须指出：下列签名人中的许多人在此以前并不知道这两回事，尽管他们当中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局，而且全部是该派别的积极的活动家。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些“事实”究竟有什么意义。

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格·皮达可夫、
英·斯土柯夫、卡·拉狄克、瓦·雅柯夫
列娃、弗·斯米尔诺夫、米·波克罗夫斯
基、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舍维尔金、
弗·马克西莫夫斯基**

1923年12月20日。

二

对于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同志的信，我认为应作如下的声明：

1. 在派别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我认为说明一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这是我对党应尽的义务，其目的是要驳斥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对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种种事件所进行的田园诗般的美化。他们把党内的布列斯特和约时代描绘成“超民主”的时代。

但我清楚地知道，那是党处于分裂的边缘、国家濒临毁灭的时期。如果我们愿意吸取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不能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

2. 同志们的信实质上证实了我所说的东西。至于说列宁同志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计划“置之一笑”，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和列宁同志对于其他一些更严肃的事情，如果置之一笑是适当的，都往往置之一笑。

3. 我个人记得不是同志们所说的那两回事，而是——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在斯莫尔尼学院向我们提出的建议。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讲过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任何联盟。我说的是派别斗争如此尖锐，以致左派革命党人敢于向我们提出这一类建议。

4. 在以上的信件上签名的同志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这一建议，这恰恰证明全部事情不是“滑稽可笑的”（因为否则他们当时就会把它当作笑料传播），而是严肃的。

5. 不过，这一事实（即“签名人中的许多人在此以前并不知道这两回事”）倒是使得他们的信“滑稽可笑”。因为，如果他们在此以前对此毫无所知，那么他们干吗要签署一个文件来说明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公正的证明人呢？这不恰好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一个例子吗？关于被派性迷了心窍的社会内幕问题，我就不谈了。

尼·布哈林

译自《真理报》1924年1月3日。

传记资料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

布哈林自传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88年9月27日（俄历）生于莫斯科。父母亲当时都是小学教员。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用通常的知识分子精神教育我：四岁半我就会读能写，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热衷于自然史的书籍：凯戈罗多夫、季米里亚捷夫、布雷姆是我喜爱的人物。狂热地搜集甲虫、蝴蝶的标本；经常养着小鸟。还爱好绘画。同时逐渐对宗教抱嘲讽的态度。我五岁前后父亲任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督察员。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左右。这段时间的生活在“精神”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贫乏的，无书可读，但总的气氛是迷人的外省边区城市生活的气氛。我和弟弟现在“自由”得多了，摆脱了合理化的教育，“走上了街头”；生活在花园、田野之中，熟悉花园里毒蜘蛛的每一个小洞，培育“人面蛾”，捕捉黄鼠等等。当时生活中的主要梦想就是获得《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其他类似著作。然后我们又回到莫斯科，父亲约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贫困。我时常搜集骨头和瓶子，卖两三戈比的钱；抱着旧报纸到小

铺去换半个铜戈比。这时候我进入市立小学二年级学习。还需要指出，我父亲生活得毫无条理，却很懂得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中，他最欣赏的是海涅。这个时期我简直什么书都读。海涅的诗我能倒背如流。背熟了科齐马·普鲁特科夫的作品。还在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遍读了古典作家的作品。作为趣事我可以说一下，在这个年纪我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以及科尔什的《古代文学史》。这种无系统的阅读（“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时造成了一些怪事。例如我记得，读了一些很不高明的西班牙骑士小说之后，我在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成了西班牙人的热烈拥护者。在科尔什的影响下热衷于古代生活，不免抱着某种鄙视的态度看待现代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经常同所谓“市井少年”交往，然而我决不为此感到遗憾。玩“羊拐子”、击木棒、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大约就在这时候或稍晚些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同宗教彻底分手了。顺便说说，表面上这是以相当淘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同那些崇敬圣物的孩子们打赌，从教堂偷来了“圣体”，胜利地把它吐在桌子上。这里也有些趣事。这时候我偶然地看到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这时候我对自已是不是反基督者，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因为我从启示录中知道（顺便说一下，我因读启示录被学校的神父处以严重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必定是个荡妇，所以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不是个荡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异常贞洁、热爱劳动、极端爱孩子、有高尚美德的妇女，这自然使得她非常难堪，因为她怎么也无法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小学毕业时我是“第一名优等生”，有一年时间没能入中学，然后预习了拉丁语，经过考试，上二年级学习。在中学（莫斯科第一中学）期间几乎全拿五分，虽然从来没花什么力气，从来没用过字

典，总是匆匆忙忙地“抄”同学们的“话”，在老师上课前五到十分钟才“准备”功课。在中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组织“小组”、出版“杂志”等等，起先完全是天真无邪的。象常有的那样，我们也经历了写作活动的阶段。然后开始阅读非法著作，接着是组织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组“学生组织”，最后终于决定归属马克思主义阵营。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那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应当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熟人使我产生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这时1905年革命到来了，到处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积极参加了。1906年我正式加入党，开始地下工作。在毕业考试期间我同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拉得科夫壁纸工厂发动了罢工。考入大学以后，主要是利用大学作为秘密接头地点，或者是在课堂讨论上对某一可敬的自由派教授进行某种理论“袭击”。

1908年我被遴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1909年我被选入其下一届委员会。这时候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端的偏爱，并且遍读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然后获释，接着又被捕。然后我被保释，但是1910年当整个党的莫斯科组织被破获时，我也被捕（这时我在合法机构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好几个月，被驱逐到奥涅加，为避免被法庭判处苦役（用于我身上的是第一〇二条），于是逃往国外。我在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期间一直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即不曾是“召回派”，也不曾是“调和派”）。在国外开始了我的生活中的新阶段。最初一段时间，我通常是住在工人家中，而整天都在图

书馆度过。如果说我在俄国获得了一般知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相当专门的知识，那么，毫无疑问国外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固定资本。其次，我认识了列宁，他自然给了我巨大的影响。第三，我掌握了数种语言，并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在国外也真正开始了我的著述活动（《真理报》上的通讯，《启蒙》杂志上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我到处都竭力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听了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的课，于战争前夕被捕，被驱逐到瑞士；然后历尽艰辛到达瑞典（中途曾在纽卡斯尔被捕），在这里同亲密的朋友皮达可夫一道紧张地在图书馆研读，直到被捕（所谓霍格伦案件）。接着有一段时间住在挪威（直接参加了“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但不久被迫秘密赴美。在美国任《新世界报》编辑，参加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等等。革命后取道日本回俄，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在车里雅宾斯克被孟什维克逮捕。抵达莫斯科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编辑。一直站在左翼（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仍任此职。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别的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一点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而我有幸能站在他的身边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目前我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真理报》编辑以及作家、讲师、党的鼓动员、宣传员等等。

主要理论著作有：1.《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2.《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的批判）；3.《过渡时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瓦解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改组的基本规律作理论分析的尝试）；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理论论文集《进攻》（反对柏姆-巴维克、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弗兰茨·奥本海默等人）；6.《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为批判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而对再生产过程、市场和危机理论所作的分析）。通俗小册子中流传得特别广的有：《共产主义 AB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纲领》等等。另外，还有历史著作《从沙皇制度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后一著作把苏维埃制度条件下经济政策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同城乡关系问题联系起来作了理论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具有次要意义的小册子、杂志文章等等。许多著作，主要是通俗小册子，被译成欧洲和亚洲各国文字。

译自《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 41 卷第 1 分册第 52—56 页。

（郑异凡译）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

“布哈林”条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布哈林 1888 年 9 月 27 日(旧历)生于城市小学教员伊万·加夫里罗维奇·布哈林家里。

布哈林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运动。1905 年参加中学生的革命组织，不久这个组织成了社会民主党组织。1906 年下半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作宣传员工作。在毕业考试期间(1907 年春)，布哈林第一次组织了斯拉得科夫工厂的工人罢工。1907—1908 年为哈莫夫尼基区多罗果米洛夫斯基分区的宣传员、组织员、鼓动员。1908 年布哈林被选入布尔什维克组织莫斯科委员会并被任命为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负责组织者。不久，布哈林被选入莫斯科委员会。同“召回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07 年秋布哈林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专业。但是，由于做党的工作和只在家里学习，布哈林没有在大学里系统学过“学科”。在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大学生组织中进行积极工作。1909 年春布哈林在布

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被捕，随即获释。1909年秋，以同案再度被捕，但是根据第一〇二条条款保释至法庭起诉。1910年，布哈林暂时在合法机关做党的工作，同取消派和取消主义进行了斗争。参加工会报刊（纺织工会机关刊物）工作。1910年底，因莫斯科党组织被破获，布哈林再次被捕。1911年6月以前关在苏舍夫克和布特尔克，之后，在审讯前行政流放于奥涅加，随即从该地逃脱。1911年10月布哈林侨居德国（汉诺威）。

1912年秋，布哈林初次会见列宁（在克拉柯夫）。列宁推荐布哈林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此后，布哈林开始系统地从事写作活动，同时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党选派布哈林作为中央机关报代表出席在开姆尼斯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912—1913年冬布哈林移居维也纳，在那里写作《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并听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讲课。布哈林大部分论战性的经济理论著作（反对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姆、柏姆-巴维克的），在《启蒙》和《真理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通讯都是在维也纳这一时期写成的（1912—1913年和1913—1914年）。布哈林与列宁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和来往，密切参与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服务的工作（准备发言稿、报告等等），同时还在维也纳俄国社会民主党小组工作并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

1914年宣战前几天，奥地利警察在卢涅茨把布哈林作为“间谍”逮捕，监禁在麦尔克军事要塞，在认识布哈林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作证之后，布哈林才得以获释，他在宪兵押送下，被驱逐到瑞士。在瑞士，主要是在苏黎世和洛桑，布哈林一直逗留到1915年7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同护国派进行了斗争，出席了党的伯尔尼代表会议。就在这时候，布哈林写了《世界经济和帝

国主义》一书，以摘要形式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国外杂志《共产党人》上。1915年布哈林用署名多尔哥列夫斯基的护照经法国和英国，移居瑞典，途中曾被英国警察短期拘留在纽卡斯尔。

在瑞典，布哈林与“青年派”，即以后聚集在霍格伦（当时的革命作家）周围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建立了联系，为其机关报《警钟报》撰稿。参加因出现瑞典参战危险（1916年夏）而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青年派”半合法的代表大会。瑞典当局因布哈林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把他（还有霍格伦）作为似乎打算“爆炸桥梁”，“扔炸弹”等等的“列宁的间谍”予以逮捕，布哈林在斯德哥尔摩监狱关了一个半月和强迫劳动后，被驱逐到挪威，在那里他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青年派”的机关报《阶级斗争》上。在斯堪的那维亚时期，布哈林和列宁在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上（后一问题下面还要谈到）发生了理论分歧。瑞士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文集没有发表布哈林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在此以后，他在为当时一些急进社会主义机关报写的许多文章里发挥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这些机关报有荷兰的《论坛报》，挪威的《阶级斗争报》，不来梅的《工人政治》杂志，《青年国际》杂志和以后纽约的《新世界报》。布哈林从挪威到丹麦以后，过了两个月，于1916年10月秘密抵达美国。

在纽约布哈林编辑《新世界报》，此报自他来到以后，采取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布哈林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他在美国各城市进行宣传“旅行”；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左派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形成过程中，与当时的托洛茨基立场进行了斗争。在美国时期，布哈林锻炼成一个成熟的演说家和宣传家。经过近六年的侨居生活，在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布哈林即取道日本回到俄国。（顺便提一下，途中，布哈林由于在士兵中间进行宣传在车雅

宾斯克曾被孟什维克逮捕。)回国后,布哈林定居莫斯科。他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直连任至今。参加过国务会议和民主会议(在国务会议时期为总罢工参加过总工会的会议)。他是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号法令的起草者,是莫斯科市杜马代表,总的说来,当时在莫斯科组织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夕反科尔尼洛夫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坚决反对党内的动摇倾向(在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上),为克服这些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是领导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立宪会议解散之前,以布尔什维克党团名义在会上发表过重要的宣言性的演说。从1917年12月底起主编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直到党内在同德国帝国主义单独媾和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分歧时为止。在反对缔结和约和列宁立场的时候,布哈林领导了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并且是《共产主义者报》的编辑之一。以后布哈林公开承认自己在布列斯特阶段的政治活动中犯了最大的政治错误。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之后,布哈林恢复了《真理报》的工作,同时成为中央委员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

1917—1918年期间,以及后来,布哈林受党和共产国际的委托曾多次在国外工作。

1918年,布哈林在德国认识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与“斯巴达克”派取得了联系,使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之间建立了思想联系,成为俄国共产党对正在形成的德国布尔什维主义派别影响的传播者。在十一月革命开始前几天,布哈林与俄国大使一起被驱

逐出境。在回苏维埃俄国途中，他受党的委托，参加了出席革命后在德国成立的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但是，根据霍夫曼将军的命令，布哈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马尔赫列夫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一起在途中被扣留，并落入狂暴的德国军官手中，他们用机关枪包围了“布尔什维克车厢”，显然是在挑起事端，进行迫害。代表团成功地进行宣传鼓动并“激发”押送他们的德国士兵起来反对他们的长官。（众所周知，德国“社会主义”政府终究没有让代表团进入德国）。1922年布哈林曾任出席所谓柏林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代表。1923年到了挪威，同特兰麦利集团进行了斗争。

布哈林从共产国际成立的最初时期起就参加了领导工作。布哈林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大会的工作，是苏联代表团成员，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在以后的历届大会上也都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作了关于议会主义的报告，论证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原则性立场，附带反对了共产国际拥护者当中的“反议会主义的倾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参加了关于策略问题的辩论，与列维、果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了斗争，反击了俄国共产党队伍中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胆怯的反对派”（就列宁的报告所作的发言）。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就“纲领问题”作了长篇政治理论报告，分析所提出的草案，总结第二国际在理论上的破产（国家理论，崩溃、危机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为其他国家提出新经济政策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所谓“民族类型”问题。（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收在布哈林的《进攻》文集里）。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又作了纲领问题的报告（因个别集团中间暴露出的理论倾向而作）；在讨论1923年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时，发言反对该党领导（布兰德勒、拉狄克、塔尔海默）的右倾；同博尔迪加进行了

斗争。1925年(5月)他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性提纲,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德国极左派的信。以后还起草了关于英国罢工教训的提纲,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提纲,等等。同时他积极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日常领导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1926—1927年)他在执行委员会中的作用增长了。

布哈林在党内,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也是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在革命后的十年期间,布哈林在党和工人会议上作过大量报告,起草过大量党的文件,宣讲过一些讲座,发表了许多小册子、通俗书籍、杂志文章和一些理论巨著。《真理报》上刊登了布哈林写的数以百计的社论和文章。

布哈林世界观形成和思想发展的过程有如下述:还在儿童时代就已“战胜”宗教偶像,之后,布哈林在中学时代接受过皮萨列夫主义。十七岁时布哈林从皮萨列夫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布哈林在其自传里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是使他思想上自我觉悟的决定性因素。1905年的革命,参加示威和集会,使布哈林完成了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自我觉悟过程。从积累学术“资本”观点来说,布哈林收获最大的是大学时期,监禁以及侨居国外时期。布哈林特别爱好经济理论。从青年时代起布哈林就极其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在青年时代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农业问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布哈林写了第一篇理论文章,批判彼·马斯洛夫的《国民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刊登在大学学报上)。布哈林还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作了许多研究,相当熟悉资产阶级社会学著作和有关工人问题的现代著作。他也没有忽视哲学,并且有一个时期还醉心于阿芬那留斯。从童年起,布哈林就爱好绘画,此后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有着强烈的兴趣。与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前一代不同,由于同

民粹派斗争，他们的重点是研究市场问题，考察土地问题，而布哈林的理论兴趣则集中在与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的类科学的、心理学的和折中主义的体系进行斗争这一不大著名的领域上。还在H·沙波什尼柯夫教授的讲习班上，布哈林做了批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社会分配理论的学术报告。以后，在维也纳，他把这个学术报告改写成论文《没有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此文起先发表在1913—14年的《新时代》上，后收入《进攻》文集。在维也纳图书馆，布哈林研究奥地利学派，准备《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写作批判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本海默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在瑞士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学派和洛桑图书馆收藏丰富的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研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瑞士—斯堪的那维亚时期应当认为是评价布哈林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布哈林发表了国家和革命理论问题的文章。

对经济理论这个相对说来最为抽象的领域的研究促使布哈林在分析金融资本主义经济时，着重指出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最大，或多或少完备的趋势。布哈林著作的有力之处在于他能够非常清楚地分析这些趋势，在所谓“化学的纯粹”状态中去考察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此类似，布哈林还能够非常清楚地阐明帝国主义的国家政权，把它看作是阶级强制的高度综合化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集中化的暴力。虽然有一定的缺点，但是与布哈林极左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这种以“极限”的方式进行的特殊思维，毫无疑问使得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家机构的分析更其尖锐了。布哈林探索到许多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问题的确切提法。比如，他当时第一次把在革命过程中炸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必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论点提上了日程（见转载在1925年《法的革命》文集上的没有全文保存下来的布哈林的文章《论帝国主义国

家理论》)。他还坚持了当时使许多人感到震惊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可能性的论点。但是,正如布哈林自己后来也承认的,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及相近的问题时存在着薄弱的地方。布哈林是在现代发展趋势的最完备的图式中考察这些趋势的,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应有的程度上掌握现象的经验具体性。因此产生了当时他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论点的辩论(关于民族问题布哈林接近皮达可夫-基辅斯基同志的立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现代资本主义实现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速度。因此在解决国家问题上也出现某种公式化。布哈林以毁灭性打击批判了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没有相应地充分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性质,当然指责布哈林不了解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过渡时期的必要性显然是不公平的。(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保存着国家政权的形式,因为这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在这里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或者:“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引自布哈林《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关于与弗·伊·列宁在国家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布哈林在《法的革命》文集中写道:

“弗·伊·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13卷)。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关于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的原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

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您，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您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见《法的革命》第1集，共产主义科学院1925年版第5页）。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布哈林的著作促使弗·伊·列宁从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有重大价值的深入研究（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列宁文集》第2卷第284页）。

但是，必须承认，布哈林以后所犯的政治错误，首先是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立场，是布哈林在上述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所持观点的逻辑继续。布哈林还在国外时（1915—1916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个革命的全部特殊性，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相互交错，局势的极端复杂的图景，农民的重大作用，列宁主义战略辩证法的微妙之处：“在空间上让步，以赢得时间”。这表现了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列·达·托洛茨基的思想有某种思想上的共同性。以形式逻辑代替辩证法；超乎内容的“空泛的”和“左的”词句；不了解农民的作用——这些特点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为布哈林所克服和消除了。在这个时期，列宁对布哈林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私人友谊也促进了这种影响。在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又复发了一次“左倾”和倒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旧病之后，在托洛茨基发动新的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时，布哈林无情地抨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错误。在理论

和政治实践领域,布哈林用正面阐述和辩论的形式论述了“农民问题”,结合问题,以及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布哈林的积极参加下以及由于他的理论论证,党采取了一定的转变措施(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等等)。最近几年是布哈林在政治上特别迅速成长的几年。

布哈林大多数理论著作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布哈林是一位最有才能的经济学家—理论家。布哈林是一位卓越的通晓马克思主义的人,用出人意外和博学多才的批判性论据进行攻击的出色的辩论家,他无情地攻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撕去他们那臭名远扬的“客观性”外衣,不仅从逻辑上驳倒他们,并且使人产生对他们的仇恨,把他们作为阶级敌人予以揭露。与具有丰富理论的想象力结合起来的思考的系统性和革命性使布哈林成为不是象考茨基那样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注释者,而是一个创造性地接受《资本论》作者遗产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布哈林使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旧论点更准确更明确了,提出了某些新论点,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布哈林非常熟悉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当有时触及经济理论的最抽象领域时,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揭露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学者诡辩的“社会学的”等价物。

布哈林早就想继马克思之后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是,如果说政治工作耗费了布哈林的绝大部分时间,使他直到现在还没能实现这个想法,那么,无论如何,布哈林已经打下了底子,为这一重要的批判性的著作准备了可能性;这就是,大量分散在布哈林的全部,特别是以往经济学著作里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引文、方法论的设想和注释。

《**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

一书是布哈林在二十四岁时写成的，理应被看作是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一本杰出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布哈林这本著作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采取了个别的方法论上的考察来反对主观主义（例如，以前鲁·希法亭的文章）。在《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对心理学派的体系进行了广泛的“逻辑”批判。布哈林一步一步地考察，柏姆-巴维克之流基本的方法论上的争论——从主观的估计得出客观的经济范畴的不可能性——怎样使奥地利学派注定成为毫无成果的“决疑论”的练习，造成一整套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成了食利者——“最大的资产者”的经济思想。但是，“边际效用”理论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能用以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对抗的唯一彻底而完备的意识形态。布哈林在批判柏姆-巴维克时还作了大量的批判性和资料性注释，在这些注释里“简要地包含了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的另一些分支所作的类似的和系统的批判”（见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序言）。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于1915—1916年，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作主的原因直到1918年才出版）是发表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国外文集《共产党人》上的文章改写而成的。该书所研究的思想范围基本上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文中所包含的相同，即对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布哈林的著作的不同点在于，在这之前首先分析了世界经济的“形成”。对这一范畴作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尤为必要，因为资产阶级经济著作建立了一整套世界经济理论，用极端错误的辩护士观点来充填它（比如，出现了世界经济以“代替资本主义”，或者世界在走向所谓“超帝国主义”的乐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看作是在新的组织形式下资本的国际化 and 民族化趋势的结合和斗争（垄断组织、银行资本与工业相结合，康采恩化过程）。布哈林断定帝国主义是一种与金融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相适应的，从世界经济观点看来是“资本主义竞争扩大再生产”的特殊政策。

《过渡时期经济学》（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第一部分）写于苏维埃俄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时期。《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揭示革命经济的特点，指出社会阶级联系解体和生产暂时衰退的必然性，以及随后他们新的基础和新的结合上重新恢复的必然性，展示城乡关系的根本改变，考察国家政权的特殊作用和不断改变的职能，最后，确定转化过程的“阶段”。在列宁研究院保存着一本《过渡时期经济学》，在书的边页和书末，列宁作了许多有意思的批注。不妨举出弗·伊·在边页写的某些批注和弗·伊·对全书的主要评语。下面就是几个片段：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第8页上，布哈林写道：“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坚固的经济关系束缚着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每一部分”，列宁在“全世界”三字下加了着重号并在边页批道：“不是全世界。”在第10页上，布哈林写道：“金融资本消灭了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弗·伊·在“消灭”两字下加了着重号并在旁边写道：“没有消灭。”

第21页上，布哈林给国家下了个定义：“国家组织是最广泛的阶级组织，它积聚了全部阶级力量，集中了各种机械的镇压工具和迫害工具，使统治阶级组织成一个阶级，而不是组织成阶级的一小部分或小小的阶级集团。”列宁写道：“非常好！”

在第46页上，布哈林写道：“1918—1920年欧洲经济的具体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个崩溃时期已经到来，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旧的生产关系制度将要复活。”列宁写道：“有点过分”和“谁证明得过多……”。

在第 58 页上,布哈林写道:“社会主义必须建设。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是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列宁在边页写道:“非常对!”

在第 71 页上,布哈林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首先看到工人组织作用的辩证改变。非常清楚,随着统治关系的重新配置,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一种生产组织者的力量。”列宁写道:“非常好。”

在第 150 页上,布哈林写道:“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从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制度开始的。”列宁写道:“不对:是从‘比较弱的’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第 11 章^①:《过渡时期‘超经济的’强制》看来是弗·伊·最喜欢的一章,全章写满批注:“对!”,“对!”,“非常好”,“说得很好!”,“正是如此!”,在这章的末尾,弗·伊·写道:“这一章很出色!”。

为了取笑,列宁模仿《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不通俗的术语,对全书作了如下评价:“这本出色的书的出色的质量,有某些不足之处,因为它们受到了下述情况的限制:第一,作者的假定没有以足够坚实的、即令是简短的实际材料为基础,虽然他掌握的材料是很全的。更多的实际基础会消除该书在‘社会学’容貌上,更确切些说是在哲学容貌上的缺陷。第二,作者对动的经济过程的观察是不够具体的,常常落入名称(‘专门术语’),‘玩弄概念’的陷阱。没有了解到,许多不成功的表述和术语都渊源于哲学,它们在‘深奥’的幌子下走上了哲学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常常是不作考虑,不

^① 应是第 10 章。——译者注

加批判地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而绝不是唯物主义。我希望，以后重版时能消除这些不大的缺点。重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很必要的，并能为科学院带来更大的荣誉。我们对科学院表示祝贺，祝贺它的院士写了一部辉煌的作品。1920年5月31日。”

以后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揭露了《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主要缺点。作者和我们全党（也许弗·伊·列宁除外）当时没有预见到新经济政策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就这种意义上说，《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其时代的真正产儿，具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标记。由于这缘故，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里，没有正确地和准确地估计到业已瓦解的关系的恢复过程的规律性和“沿着新经济政策轨道”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但是，生活本身给《过渡时期经济学》所作的重大修正，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驳倒布哈林分析社会阶级联系瓦解过程转化的基本规律的正确性，没有驳倒暂时降低社会生产水平的必然性的提法以及运用再生产的观点分析范畴的特别重要性，等等，等等。

布哈林经济方面其他理论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写这本著作是由于有一种认为在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似乎是不可能的民粹主义—卢森堡主义观点有一个时期在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定的影响，以及出现一种修正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而倒向宿命论的崩溃论的企图。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并捍卫它免受卢森堡主义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义的歪曲。除了这些主要经济著作外，布哈林还写了许多有关国际经济和苏联经济问题，以及一系列个别问题的报刊文章和小册子。

在布哈林的社会学著作中，除上述论国家的文章外，最重要的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这本

书写得生动,引人入胜,通俗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抽象的领域(布哈林是通俗化的能手,他的风格有如极其灵活的“键盘”:“渊源[于哲学]的”^①《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作者同时也是最通俗的《共产主义 ABC》和《共产主义者纲领》的作者)。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某些新的表述并且进一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在《简略的札记》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布哈林列举了他的著作中最主要的新的定义和问题,并且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受到较多批评的是一些相当重要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布哈林“离开了对对象的通常解释”:他对“机械的”和“有机的”的理解;他根据平衡论得出的对辩证法的表述;他的关于自然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社会一切运动本原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影响的提法。布哈林的另一一些原理乃是完全不明显或几乎不明显的批评和“批判”。其中有:(1)对生产关系是“人们(被视为‘活机器的’) 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劳动配合这一唯物主义的表述”;——需要这种表述是为了反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亚·波格丹诺夫等的大合唱——使生产关系“唯灵化”,企图把它们说成是“心理上的互相影响”;(2)“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两个概念的准确区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粗率地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3)关于上层建筑依靠基础问题的更准确的提法,这种提法要求对此上层建筑的各种成分作特别具体的描绘并排除舒利亚蒂科夫粗暴的简单化;(4)作为“分类劳动”的上层建筑的定义;(5)马克思关于由“生产方式”形成的“观

^① 这里借用了列宁评论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一个用语,列宁的原话是:布哈林“没有了解到,许多不好的意义和术语都渊源于哲学,它们在‘深奥’的幌子下走上了哲学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译者注

念方式”原理的研究；（6）社会现象物质化的理论，“文化积累”，使之日益固定劳动的独特过程的必然性，——这是任何发展中社会的基本规律之一；（7）过渡时期的规律性和衰落的规律性的研究，对马克思关于“相互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和关于“文化毁灭”的可能性，社会暂时或长期退化等等原理的解释和研究。书中含有许多也许有争论，但是不管怎样是有意思的布哈林的“新东西”的思想，这是他在马克思的正统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半社会学性质的专门文章中最重要的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篇文章里，布哈林在1921年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蜕化的问题）；《延奇缅主义》；反对巴甫洛夫院士的政论性抨击文章《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它》；许多论“干部”、文化、文学的文章；论领袖、党和群众的文章，等等。

从1924年起，布哈林非常注意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在许多文章和报告里，他详细地研究土地和农民问题；就列宁的《论合作制》一文对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作了理论性的说明；分析由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许多问题的提法怎样得到辩证的改变；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和平”；关于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关于城乡关系；关于价格政策；关于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关于国内市场状况等等；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论文《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尖锐的党内斗争形势使布哈林主要是在同反对派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提出这些问题。在这方面，布哈林写了许多小册子，《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文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论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题为《论过渡时期的某些规律性问题》的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展开的没有结束的论战，

等等。

布哈林的一些专题文章有：《俄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和《从帝国主义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两篇抨击性历史文章），《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批判乌斯特里雅洛夫），《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信徒”卡尔·考茨基》。

作为政论家和理论家，布哈林拥有国际声望。他的主要著作，特别是通俗读物都被译成欧洲语和亚洲语等外文。全集至今未出。

（Л·马列茨基）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1927年莫斯科俄文
第1版第8卷第271—284页。

（杨蓬译）

1930--1975年苏联几种《百科全书》 有关布哈林词条选译

“布哈林”条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1888年），联共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联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真理报》编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布哈林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市立中学校教师的家里。先在中学学习，后进入莫斯科大学。1905年，当布哈林还是一个中学生的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学生革命组织。1906年布哈林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在莫斯科各区任宣传员、组织员和鼓动员；1908年任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曾多次被捕，获释出狱后又从事革命工作。1910年底布哈林被捕，流放奥涅加，从此地逃往国外。在国外布哈林认识并接近了列宁，列宁很快就十分赏识布哈林巨大的才能和天赋了。从这时起布哈林开始了系统的著述工作：他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反对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企图推翻和歪曲马克思学说的人们（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了《进攻》文集）。1912—1913年冬天布哈林住在维也纳，他听了柏姆-巴维克的课并同时准备自己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此书对柏姆-巴维克的学说进行了最成功的、毁灭性的批判。帝国主义战争开始时布哈林在奥地利。奥地利警署逮捕了布哈林，他被控从事“间谍活

动”，但是这一控告过于荒唐无稽，所以警署不久就释放了布哈林，把他驱逐到瑞士。在瑞士，布哈林在一小批布尔什维克行列里进行了反对护国派的坚决斗争。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这部著作。1915年7月布哈林秘密进入瑞典，在那儿他遇到了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派”，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并为他们的报纸工作。瑞典警察把布哈林当作列宁的奸细予以逮捕，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然后驱逐出瑞典。布哈林来到了挪威，参加了挪威工人运动，然后前往丹麦，于1916年10月秘密前往美国。在纽约他编辑俄国报纸《新世界报》，在他编辑下，该报具有鲜明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

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后，布哈林取道日本和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他被选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编辑《斯巴达克》杂志，这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机关刊物，他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之一。同一时期，布哈林全力参加党的宣传运动，出席了各种各样的会议和群众大会，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当中持革命的左派立场。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莫斯科，他在这期间逐渐被提到领导岗位，是十月发动的热烈的拥护者。1917年秋，布哈林当选为代表莫斯科的立宪会议成员，在立宪会议开幕时他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了宣言式的长篇讲话。从1917年11月起他担任《真理报》编辑，仅在1918年退出编辑部，当时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意见分歧尖锐化，他反对列宁而主张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布哈林很快就公开承认这种立场是极大的政治错误。

布哈林是联共(布)的最高级的工作人员之一，同时也是共产国际中最有声望的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从共产国际成立之日

起，他积极参加历次代表大会、全会以及共产国际的其他工作，就极其重要的问题做报告和发言。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就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发言。在他的参预下制订了提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

在联共(布)队伍中布哈林居于一个首要的显著地位，是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他象水银一样灵活好动，他酷爱生命的一切表现，从极其抽象的新思想直到打棒游戏。他的谈吐和文章“顽皮淘气”，对自己的私生活极端严格，而对同志们的小缺点却态度宽容。他是个尖锐的、无可反驳的雄辩家，而在同志关系上却温情随和。此外还应加上极端真诚，诙谐机智，在多种多样的知识领域博闻强志，善于迅速领会别人的思想，并且永远乐天愉快。所有这些品质使布哈林成为俄国革命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布哈林的头脑具有得到鲜明表现的抽象思维能力。布哈林是从考察经济的理论问题开始自己的著作活动的。在这一领域布哈林是罕见的巨匠。布哈林能对他所接触的任何理论问题提出有趣的新见解。他反对柏姆-巴维克的著作被认为是揭示所谓奥地利学派的实质和错误的优秀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布哈林着重指出了被考茨基和其他改良主义者所掩盖了的马克思这一学说的真正革命性质。虽然《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基础有很大错误(没有预见到新经济政策)，但这本逻辑严谨的出色著作，直到今天仍有巨大的意义。布哈林思想的抽象性质一方面是他的巨大长处，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他的弱点。布哈林专心致志于思想的抽象发挥，而对具体的现实却常常不给以应有的注意。这有时使得布哈林缺乏灵活的策略，作出过分直接的决定。布哈林之所以出现一系列左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思想的抽象性质。布哈林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

长期错误立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重大错误，以及他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上的立场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布哈林善于吸取列宁给他指出的教训。在这一方面实际生活的教训也起了作用。布哈林后来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左倾”错误，摆脱了自己从前对具体实际的某种简单化态度。

书目：至今未出全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进攻》理论论文集，莫斯科1924年版；《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莫斯科1919年版；《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彼得格勒1918年版；《过渡时期经济学》莫斯科1920年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莫斯科1921年版；《共产主义ABC》（理论部分）莫斯科1920年版；《俄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莫斯科1917年版；《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莫斯科1925年版；《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信徒卡尔·考茨基》莫斯科1925年版；《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为干部而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等等。此外，还有《真理报》、《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报纸杂志上的大量文章。

关于布哈林的传记见刊载在《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上的他的自传（第41卷第1分册）和刊载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8卷上的贝·马列茨基的文章。

（H·麦谢里亚可夫）

译自《苏联小百科全书》193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①
第912—915页。

（郑简译）

① 本卷于1923年8月15日出版。——译者注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1888年),老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全苏科学院院士。教师的儿子。1905年布哈林在莫斯科参加追随社会民主党的中学学生地下组织。1906年布哈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担任宣传员和鼓动员的工作。1908年任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和1910年布哈林曾多次被捕,流放奥涅加之后逃往德国。1912年迁到维也纳。在维也纳时期(1912—1914年)布哈林发表了第一批著作。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不免有一些错误),反对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柏姆-巴维克,还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刊《真理报》和《启蒙》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世界大战开始时奥地利警察把布哈林作为“俄国间谍”逮捕,把他驱逐到瑞士。1915年春,布哈林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伯尔尼代表会议,会上,他反对“使本国政府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提出了和平口号。也就在这一时期布哈林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分歧。1915年秋布哈林迁到了瑞典。由于参预以霍格伦为首的所谓“青年派”的活动,布哈林被驱逐到挪威,1916年10月又从那儿到了美国。在纽约布哈林编辑了《新世界报》。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布哈林取道日本回到莫斯科。在这里他全力投身于党的工作,任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编辑《斯巴达克》杂志,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3年,布哈林任党的中央委员。1934年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布哈林与列宁发生分歧,成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首领。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党纲的一系列问题上又一次与列宁发生分歧。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布哈林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后不久他就担任了政治局委

员(到1929年)。1920—1921年,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布哈林持所谓“缓冲立场”,实际上支持了托洛茨基的“纲领”。以后,布哈林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与党的总路线发生了分歧。布哈林犯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成了联共(布)内右倾的主要思想家和理论家。目前(1934年)布哈林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

列宁在评价布哈林的时候写道,虽然他是一个理论家,“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引自1926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上的讲话)①。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布哈林分析问题缺乏辩证法。例如,在评论布哈林在1920—1921年工会争论中所持的“缓冲立场”时,列宁写道:“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②斯大林在评价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时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他指出:“是的,布哈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问题领域,缺乏辩证思想和过去对阿芬那留斯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的热衷使布哈林得出一系列非马克思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观点。例如,他在谈到辩证法时写道:“我们认为把马克思称之为‘神秘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翻译成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71页。——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1页。——译者注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1页。——译者注

现代力学的语言,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不能把现代力学同辩证法对立起来。”这样,布哈林就用力学偷换了辩证法,同时也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这种形式逻辑也使布哈林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价值规律看做商品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看做商品生产内部矛盾的表现,而布哈林却把价值看做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平衡规律”(见布哈林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过渡时期经济学》)。由此得出了布哈林的“平衡论”,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这种理论“当然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①。

也是这种机械论观点使布哈林“发现了”完全错误的“劳动消耗规律”。布哈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主要错误是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看做垂死的资本主义,而布哈林却把帝国主义看做是能支配并改造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完备体系。在布哈林看来,帝国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它消灭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布哈林在其1914—1915年的早期著作中早已发挥过这一“理论”。他在《斯巴达克》杂志(1917年)上,在《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中,在《真理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直到1929年)继续发挥这一“理论”。在《论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1915年)中,布哈林在说明现代帝国主义时写道:“单个的资本家同自己的同乡竞争,而要与同乡们合作,因为竞争的重心转到了世界市场,国内竞争在逐渐消失。”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再次断言:“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反对在党纲中加进对资本主义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译者注

分析，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的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资本主义”。列宁在反驳布哈林时指出，在具体的现实中存在的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而是与垄断以前时期的资本主义并存的帝国主义。从这一理论出发，布哈林否定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革命性，他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因为照布哈林看来，这个口号是“散布幻想的口号”，是“空想的”和“有害的”。布哈林提议用“劳动人民的自决”来代替这个口号，也就是反对列宁的下述原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已吞没帝国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的“纯帝国主义”理论出发，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面临的任务不仅是推翻帝国主义者，而且还要消灭一般国家，也就是说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历史必然性和利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布哈林不把农民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例如，他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阐述过这种观点，宣称“农民，作为私有者，必不可免地向协约国帝国主义伸出援助之手”，即怀有护国主义情绪。在党的批评下克服了自己的这种“左倾”之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又不理解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与中农联盟的方针，在这一联盟中无产阶级应当起领导作用，并且联盟的内容包括与农民的小私有者本能做斗争。关于布哈林的错误斯大林写道：“在他说明农民的特征的时候，农民分化的事实不见了，存在着几个社会集团的事实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叫做农村的灰色斑点。……很明显，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根本错误的看法。”（《列宁主义问题》第102页）^①布哈林不懂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37页。——译者注

得，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与最小的个体经济中所原有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通过克服农村中的富农分子的抵抗，然后还要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予以消灭的途径才能达到。布哈林提出富农和“富农的合作社窝巢”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农村阶级斗争停息的论点，他宣称“不能断言这（集体农庄）是推动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康庄大道，我们应当用使农民关心私人经济利益的办法，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来”；他向个体农民提出口号：“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布哈林提出了关于通过“信用合作社和销售合作社”建立“农民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计划”来对抗党的总路线。“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理论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上布哈林要求降低工业化的速度，为发展轻工业而改变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相互关系，向“薄弱环节”看齐；他建议放弃无产阶级国家对市场关系的调节，等等。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支持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及对右倾的调和主义，并且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完全是由他的不正确的理论和政治方针引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已确认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观点整个来说客观上是“富农在联共（布）队伍中的代理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造时期，以布哈林为首的右倾是主要危险。

布哈林在1929年11月25日致政治局的声明中，以及其他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页。——译者注

发言中，特别是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承认并批判了自己的政治错误。

布哈林的著作除了本文指出的以外还应指出下列著作：《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9 年第 4 版；《俄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基辅 1925 年版；《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信徒卡尔·考茨基》1926 年第 4 版；《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莫斯科 1925 年版；《进攻》（理论论文集）莫斯科 1924 年第 2 版；《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版；《为干部而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6 年版；《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版。此外，布哈林还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和《真理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

（B·扎列日斯基）

译自《苏联小百科全书》1934 年莫斯科第 2 版
第 173—176 页。

（郑简译）

“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条

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种机会主义倾向，是社会主义开展全线进攻时期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分子企图使党和国家背离列宁的道路，转而走上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道路，走上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右倾首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同伙象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一样，是孟什维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它的走狗、它的继承者，是外国间谍机关的奸细。

右倾分子的首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领袖弗·伊·列宁。从在国内

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日起，他们就开始反对共产党、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斗争。1922年弗·伊·列宁把布哈林斥之为耐普曼、投机商和富农的理论家。

党内右倾的形成是与国内1928—1929年出现的新的阶级变动联系着的。当党采取了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时，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开始加剧并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在1926—1927年共产党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进行斗争的时期，右倾分子积蓄自己的力量，没有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分子，期望争取时间。从共产党转向对富农实行坚决进攻时起，布哈林—季可夫集团抛弃了伪装，开始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熄灭的“理论”，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理论”。他们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总路线。在1928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要求放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象托洛茨基分子一样，布哈林—季可夫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维护国内资本主义分子的利益，实行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有时用“左的”词句来掩盖这条路线，那么因党和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实行进攻而活跃起来的布哈林分子则是公开地保护国内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保护富农。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反映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对富农实行非常措施，而这些富农企图破坏粮食的收购，从而使工人阶级、城市居民和红军的粮食供应受到威胁。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要求降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缩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放弃国家对商业领域的调节作用。他们主张自由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共产党坚决粉碎并抛弃了右倾

投降主义分子的计划。1929年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认为宣传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的观点是和党籍不相容的,并且撤销了布哈林这一右倾理论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这次全会上右倾分子的领导人玩弄两面手法,宣称他们放弃自己的反党观点,但是实际上他们更为加紧了反党的斗争。正象后来查明的那样,右倾分子策划了富农的反革命暴动,布哈林曾与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谈判组织谋杀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遵照国外谍报机关的直接指示,右倾分子在国内进行了破坏活动。1930年党揭发并粉碎了“右派和‘左派’集团”——赞同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政纲的司尔佐夫—洛米纳泽—沙茨金反革命集团。

失去了国内的一切社会支持之后,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在1932—1933年加入了反苏联合组织——“右派和托派联盟”。1937年联共(布)中央二月——三月全会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党。1938年对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审讯彻底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的骇人听闻的全部罪行。这伙间谍和杀人匪帮被彻底粉碎了。

共产党也挫败了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把共产国际的政策纳入社会民主主义轨道、瓦解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企图。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右倾也是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是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紧密相联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在工人运动中贯彻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路线。揭露布哈林旨在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并在其他国家拯救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伪科学的“理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等等),对于把各国共产党团结在列宁主义基础上,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尔什维克化有着重大意义。苏联共产党粉碎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分子,捍卫了列宁主义,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1955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
第34卷第365—366页。

(郑简译)

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是1928—1930年间以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集团为首的机会主义倾向。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进行的。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苏联向社会主义进军。国内资本主义分子——耐普曼和富农疯狂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措施。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建立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加剧了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的动摇，他们的情绪渗入工人阶级之中，而通过工人阶级又渗入到党内。因此在党内就形成了右倾，这种倾向表现在“企图降低大工业的建设速度并阻止它的进展，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抱着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富农的斗争估计不足并企图抹杀这种斗争……”^①。右倾分子首领的机会主义立场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过去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时期就有过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动摇，他们多次反对弗·伊·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基本原理。右倾分子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包括富农结成联盟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在苏联只能建立落后类型的社会主义，而且它的建成要经过很长的时期，而速度则将是非常缓慢的。右倾分子歪曲弗·伊·列宁的合作制计划，断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477—478页。

言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供销合作社。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归结为调整似乎和平共处的现存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其中包括敌视社会主义的集团的相互关系，提出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主义成份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右倾分子的这些理论观点是他们政治立场的基础。他们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要求为此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并削减基本建设的投资。他们认为消灭农业落后状态的可能性不在于技术改造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于全力发展和加强个体经济，首先是富农经济；他们对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任务估计不足并公然贬低这一任务，抗拒这一任务的实际解决；他们主张停止在粮食收购上对富农的压制，取消向他们征收的个人税，主张尽量提高粮食价格，使市场关系自由化。右倾分子的政纲客观上意味着在小资产阶级势力的逼迫下放弃社会主义阵地，破坏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1928年初右倾分子展开了反对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制定的党的路线的公开斗争。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致联共（布）中央的信（1928年6月）表述了他们的政治观点。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提出了加强同正在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作斗争的任务。右倾分子无视中央全会的决议，转而采取派别斗争的方式。1928年7月布哈林与已被粉碎的“新反对派”的首领列·波·加米涅夫举行关于把力量联合起来以进行反对中央和党的政策的斗争的谈判。1928年9月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文章企图败坏党的政治路线的威信。右倾分子的首领们企图用以他们的同伙尼·亚·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委员会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抗。1928年10月18日联共（布）中央在《致联共（布）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的文告中谴责了右倾分子的活动。在十月召开的联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全会表示坚决支持党的政治路线。布哈林和李可夫参加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制定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提纲的委员会,他们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同中央的路线对抗,但是遭到了回击。为了表示抗议并企图迫使中央改变它的政策,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可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提出了辞职的集体声明。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委员认为他们的辞职理由不能成立。右倾分子的首领们收回声明之后,多次坚持要党停止与右倾分子的斗争,让他们有可能自由传播自己的观点。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8年)上右倾分子继续把反对列宁的方针强加于党。全会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指出右倾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1928年12月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右倾分子企图把工会与党对立起来并取得代表大会对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支持(他们在工会中灌输工联主义,公然无视党对工会的领导)。但是代表大会拒绝了右倾分子的要求,表示支持联共(布)的政治方针。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发表了新的声明,正式提出反对派政纲来对抗中央的路线。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1929年)认为右倾分子的观点是与党的总路线对抗的,要求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停止派别斗争。联共(布)第十六次全苏代表会议(1929年4月)批准了全会的决议。布哈林被撤销了《真理报》主编职务,托姆斯基被撤销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后来李可夫被撤销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共产国际中右倾分子支持外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再次发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列宁早在1916年就批判过这种理论,认为是站不住脚

的理论和反革命的理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谴责了右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1929年7月解除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并撤销了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但是右倾分子继续进行斗争。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年)宣布右倾拥护者的观点是同党籍不相容的。布哈林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严重警告。右倾分子的首领向中央提交了承认自己错误的声明。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批准了中央全会关于右倾的决议并警告右倾分子的首领们说,只有为党的路线进行积极的斗争,他们才能证明是真诚地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和共产国际中右倾分子被认为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约·维·斯大林(当时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安·安·安德列也夫、米·伊·加里宁、谢·米·基洛夫、斯·维·柯秀尔、瓦·弗·古比雪夫、阿·伊·米高扬、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巴·彼·波斯特舍夫、扬·厄·鲁祖塔克等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次全会上的发言,在与右倾的理论和组织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粉碎右倾对于胜利地实现列宁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Ф·М·瓦加诺夫)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1975年莫斯科俄文第3版
第20卷第486—487页。

(郑简译)

的理论和反革命的理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谴责了右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1929年7月解除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并撤销了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但是右倾分子继续进行斗争。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年)宣布右倾拥护者的观点是同党籍不相容的。布哈林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严重警告。右倾分子的首领向中央提交了承认自己错误的声明。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批准了中央全会关于右倾的决议并警告右倾分子的首领们说,只有为党的路线进行积极的斗争,他们才能证明是真诚地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和共产国际中右倾分子被认为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约·维·斯大林(当时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安·安·安德列也夫、米·伊·加里宁、谢·米·基洛夫、斯·维·柯秀尔、瓦·弗·古比雪夫、阿·伊·米高扬、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巴·彼·波斯特舍夫、扬·厄·鲁祖塔克等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次全会上的发言,在与右倾的理论和组织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粉碎右倾对于胜利地实现列宁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Ф·М·瓦加诺夫)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1975年莫斯科俄文第3版
第20卷第486—487页。

(郑简译)